

畢英特哥夫斯基 (S. A. Piontkovsky) 著

萬武之譯

俄羅斯大革命史

俄羅大革命史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初版

定價一元二角

版 權	所 有
--------	--------

編譯者 萬武之

發行者 新社會書局

印刷者 新社會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新社會書局

目錄

第一章

俄國革命之條件：正在發展中之俄國資本主義與西歐資本主義以及羅曼諾夫的封建貴族的君主政體之關係；無產階級之集中；農村中反對貴族之革命力量；革命危機之表徵。

第二章

俄國各社會階級與戰爭：由私人壟斷的資本主義過渡到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及固定資本之破壞；農業危機；階級對抗之發展；革命前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與農民（小資產階級）。

第三章

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革命之爆發及其內部矛盾。

第四章

二月——三月革命的內部矛盾之顯露；各社會階級及為政權之鬥爭。

第五章

十月革命之前夜；工農羣衆自動地集合於多數黨旗幟之下；多數黨為適合革命之準備與組織；事變前夜之資產階級。

第六章

十月革命的緊急形勢之鬥爭；彼得格拉駐軍之防禦。蘇維埃第二次大會問題。——十月；革命軍事委員會之活動；與臨時政府之鬥爭，彼得格拉暴動。

第七章

十月革命。蘇維埃第二次大會。

第八章

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之態度；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

第九章

莫斯科之十月。多數黨之組織。爲政權之戰爭。

第十章

十月間在各省，大本營及前敵之情形。

第十一章

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企圖破壞無產階級專政。

第十二章

無產階級專政之勝利。蘇維埃第三次大會。

第一章

俄國革命之條件：正在發展中之俄國資本主義與西歐資本主義以及羅曼諾夫（Romanov）的封建貴族的君主政體之關係；無產階級之集中；農村中反對貴族之革命力量；革命危機之表徵。

當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資本主義之發展非常迅速。資本主義由這一國發展到那一國，擴張他的勢力於全世界。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各國建立許多彼此抵抗，競爭並敵對的組織，常常預備攫取世界之統治權。俄國也參與了這種鬥爭。

世界的資本——主要是法國與英國之資本——以最完全的與銀行的形式輸入到俄國，與國家資本混合起來而成爲一種可驚的勢力。於是銀行的主人變成廣大的國

家中指導內政外交之主人翁。

外國資本在俄國銀行中佔有優越的勢力。例如：道勝銀行 (La Banque Russo-Asiatique) 有資本五千五百萬盧布，其中三千六百萬盧布為法國資本；彼得格拉私立商業銀行 (La Banque Commercial Privée de Pétergrad) 之四千萬盧布資本中，法國佔二千二百八十萬盧布。法國與英國的資本同樣侵入到俄國工業中，并且日見增加，壟斷生產之全部；因此使俄國工業得着最新式的技術，而達到最高度的進化。在頓 (Don) 高原·巴庫 (Bakou)·彼得堡 (Petersbourg) 陡然都發生廣大的工廠。有些數目字可以判斷外國資本在俄國所佔的勢力：法國資本占生鐵生產百分之六〇，七，石炭生產百分之五〇，九；一九一三年俄國有六〇九個火車頭，其中有五二七個，即百分之八六，五是由法國企業製造的；投入煤油工業中的資本，英國即佔百分之五六·一。據研究俄國工業之歷史家·如伊里 (V. Il'ine 即 N. Lévine 列甯)，方爾諾

達夫斯基 (Finn-Enorasvsky)，巴哥舍夫 (Pogolev) 等都指明俄國資本主義之如此迅發
迅展，使資本與生產都有很大的集中與集合。

生產集中，就是俄國最近幾十年中資本主義發展之主要特徵。大生產顯然勝過
中等的與小的生產，而更迅速。更強烈地發展了。列寧在他的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en Russie*) 一書中，指出了這種情形。例如：一八
六六年，俄國收容一千以上的工人之企業只有四十二個，佔全國三一九，七三九工
人中之六二，八九一人，即百分之二五；反之，到一八九〇年，這種大企業有九九
個，僱用全國五八七，九六五工人中之二五三，一三〇人，約佔其半數(列寧)。據
巴哥舍夫說：『在工業發展比較落後的俄國，照德意志的分類，以佔有一千多工人
之很大的企業占優勝，照比利時的分類，有五百多工人就占優勝的。俄國大工業吸
收中小工業之過程，已經表現很明白而特別厲害』(見巴哥舍夫：俄國工人的統計。

）他曾說明俄國勞動之集中，比德國與比國都厲害些。據一九一二年之正式統計，僱用五百至一千工人的企業，占工人全數百分之一五；一，僱用千人以上的企業之百分之三七，五；不滿四百工人的企業，只占百分之二〇（見莫斯科工廠主與製造業主協會年鑑第一號一三二頁）。

西歐的資本以最完善的手續大批輸入到俄國而發生重大的影響，如無產階級集中便是證明。起初正在發展中的資本主義，需要便宜的勞動與官僚的警察機關，以保證剝削之安全。在封建制度壓榨機中掙扎之飢餓的農民供給賤價的勞力。因此，工業資本主義得以利用農村中半封建制度——廉價勞力的源泉——之保存；但是這種半封建制度即刻給他剝奪了農村的市場，因為貧困的農民是不好的顧主呢。為保存農村中高利的關係以及貴族的財產，于是全俄國資本主義必須尋求國外市場，以補贖國內市場之貧困與不足。

因爲英法資本對各部門工業之壟斷，及其在銀行中之統治作用與金融交易中之影響，使俄國資本主義與西歐資本主義密切結合，而以英法方面爲主腦。俄國資本主義已經變成英法資本主義之附庸而捲入世界鬥爭之漩渦。所以牠繼續一種進攻的對外政策，而要求一個堅固而馴順的國家機關……。爲要平安地剝削勞動，而在國外市場得到利益，必須有一個國家機關，於必要時，能夠將經濟關係轉移到別的管轄範圍。從此保存俄國現存的制度，是爲外國與俄國的資本之單純的經濟利益同所需要的。在大戰前不久的時候，俄國政府常常需要金錢；法國操證券交易的人也常常允許供給他，但有以下條件：『1. 立即着手建築爲法國參謀部所預定的軍用鐵道；2. 在和平時期，大大增加軍隊的兵額。』當財政總長加哥夫澤夫(M. K. Okovtsev)將這些條件通知外交大臣薩左諾夫(M. Sazonov)時還說：『法國政府担保我們每年可以得到大批款項之承諾，對於我們有不可否認的重要關係，那末，我們不能不加以

考慮……。并且法國政府所提出爲實現借款之條件，或許造成許多的困難也未可知（見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法俄國關係之材料）。

法國證券交易所 (La Bourse française) 不僅按照決定的條件給錢，他還要求這種款要消費在法國市場上。當他允許借款給羅曼諾夫政府時，要求俄國軍隊到法國去定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日，波里法諾夫 (Polyvanov) 在他的報紙上說過：『斯托力賓 (Stolypin) 告訴我，法國公使杜奢 (Touchard) 今天來見他，向他要求：陸軍部不要忘記到史乃德 (Schneider) 工廠去定貨……；他曾聽得到克魯伯廠 (Krupp) 定貨之說；爲得向法國借款之成功，最好是與法國工業發生關係云』（見波里法諾夫：備忘錄）。這段記載揭破沙皇與法國財政之關係是再好不過的。沙皇與俄國封建制度，顯然是用俄國農民與工人的血汗做他們的生命之代價。從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俄羅斯帝國之海陸軍預算案增加百分之五六，近一九一四年，則達到預算案總數

的百分之二八——（見巴夫洛維治 (Pavlovich)：海軍主義 (Marinisme)，軍國主義 (Militarisme) 等）。

財政資本一面維持俄國的沙皇制度，因此並抑制俄國農村生產力之發展。沙皇制度因為財政資本的發展而參與歐洲的陰謀與競爭。

財政資本生長在一個未墾殖的地方，同時引起他的更有害的仇敵——他的權力之掘墓者——無產階級。俄國無產階級突然出現於舞台上。他們原來被半奴隸的條件壓服在農村中，自己沒有土地，不得不依賴別人的土地；現在他們跑到保存原始兼封建性質的勞動剝削之製造廠中去了。於是無產階級開始與資本主義鬥爭，不僅是為他本身的權利，而且是為消滅封建的殘餘而鬥爭。列寧曾經解釋俄國無產階級的狀況之特點即說過，『在各國中，如同俄國，工人階級感受資本主義的痛苦，不及感受資本主義未充分發展的痛苦那樣多』（見列寧全集第六卷三二九頁）。

工人階級爲消滅封建遺跡得到本身解放而鬥爭之狀況，使農村爲反對奴隸制度而鬥爭之農民，爲事實的逼迫，即變爲無產階級之天然的同盟者。資產階級的民主的（農民的）革命與無產階級的革命之高潮混合起來；而鬥爭的成功則繫乎他們團結的力量。從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以來，列寧考察這種社會力量之結合以及他們的目的之差別，曾說過：社會民主黨想與農民全體一致起來攻擊地主與官僚，并與農村無產階級一致起來反對資本呢。爲土地與自由的鬥爭乃民主主義的鬥爭；爲廢除資本統治的鬥爭乃社會主義的鬥爭（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二九頁）。這些話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所寫的；農民行動的目標與工人一樣，漸漸都顯明了。但是俄國社會民主黨自從出現於政治舞台以來，已經了解這兩種社會潮流的混合之不可避免，以及無產階級在將來革命中之領導作用。普列哈諾夫（Plekhanov）在他開始活動的時候，即已認定無產階級在俄國革命中之領導作用；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之觀

念成爲俄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之主要定理。

無產階級——能够破壞沙皇制度之主要力量——差不多突然表現出來了。從一八八五年以來，他已表示能够有組織地，有思想地，作長期的鬥爭。在這種情形之下，羣衆已經知道有組織地，堅決地，保護他們的經濟要求。這就是表現他們的力量，使普列哈諾夫能够說，俄國革命運動只有依靠工人運動才能够勝利。當第一次最重要的罷工之時，資本主義與沙皇制度，即是在互相幫助與共同防禦之中密切聯合之同盟者。亞力山大第三(Alexandre III.)曾經劇烈地注意壓迫馬羅左夫(Marozov)紡織工業之罷工。

因爲君主政體與製造廠聯絡的關係，於是製造廠的内部管理法與工資問題都變成國家的問題了。反對製造廠内部管理法的鬥爭，爲工資的鬥爭，于是都成爲一種反對國家的罪惡了。無產階級鑒于馬羅左夫紡織工業的罷工，于是由經濟的鬥爭迅

速地變成政治的示威運動；並且當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又遇着沙皇與資產階級聯合反對他的時候，他即勇敢地提出政權問題，這是毫不足奇的。俄國無產階級不只是提出問題，却要從實際上得到解決：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Moscow）暴動的時候，在其他的方面也爆發了暴動；當時無產階級實際是為權力為專政而鬥爭。從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暴動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聯成了一條直道。

如此，播種在俄國地面的資本主義發生了壯麗的新芽。因為俄國財政資本主義之偉大的發展仍然保存着封建制度，於是使無產階級為本身解放之鬥爭，首先必須攻擊君主政體。一九〇五年，俄國無產階級為農民的軍隊所戰敗，但是不久，土地革命，因無產階級的暴動而猝起了。那末在城市與農村一樣，都足致沙皇制度於死

農民運動的根株埋伏在封建的君主政體之本來的根性中。考察列寧在他的著作

——俄國第一次革命時之土地綱領 (Le programme agraire pendant la première révolution russe) 中所引用關於指示土地分配之數字，即可知道在農村中鬥爭之原因與性質。那些數字指示我們，一千多萬佔有七千五百萬德西雅丁 (la déciatine 詳見附註) 土地的小地主與三萬佔有大約相等的土地之地主相對立！

【附註】得西雅丁 (la déciatine) 地積度量。一得西雅丁合一，〇九赫克打 (la hecctare 或譯為類，合一〇〇阿爾，即一萬平方米突)，即一萬〇九百平方米突。

試看列寧所寫的表：

歐洲俄羅斯土地的分配 (見列寧：俄國第一次革命時之土地綱領)

	農戶數	德西雅丁	每戶占有地的平均數
	(以百萬為單位)	(以百萬為單位)	
被大地主剝削的貧農	10.5	75	7
中農	1	15	15

俄羅斯大革命史

富農與資本案	1.5	70	46
封建的領地	0.03	70	2,333
總計	13.03	230	17.6
不分類的	13.03	50.1	—
總計	—	280.1	21.4

大地主建立在農民勞動之上，而農民則按照一定的條件借貸土地或耕種土地，倚賴土地而為租稅與各種預徵所迫制的農民不能充分使用他們的勞力，只有借貸片段的土地；因此危害了他們的經濟狀況，而維持封建的大的財產(les latifundia 封建的領地)。土地的需要——占有土地以適合耕種者生產力為必要的條件——與農村中間的勞力之增加，使一般農民依附於大的土地，如同佃農或農業工人便是，也有變成叛徒，劫掠者或暴動者的。列寧說：「鬥爭的樞紐在封建的領地中，因為他是奴

隸的原因，即俄國封建制度的遺跡之化身與主要的支柱。商業經濟與資本主義之發展，絕對要廢除這種封建領地的（見列寧：俄國第一次革命時之土地綱領）。

一九〇五年農民的行動沒有與工人運動相混合，農民降服了。但是封建的大土地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的進化之道路；統治的貴族與執政者儘他們所有的力量以保存貴族與公家的大財產，這種政策決不能消滅土地的危機，只有延長當前勢力之衝突。

斯托力賓之土地改良與『對於富農的限制』，沒有消滅這種社會的抵抗，并沒有減少貧農反對封建的領地之鬥爭，而是工業資本主義得到了勝利。斯托力賓的土地政策催促農村中有產階級分子之出現，而使農民羣衆分化為許多經濟的階層。按照各地方的經濟構造，這種政策發生許多不同的結果，但當農村中形成社會的分化與封建領土相對立之時，這種分化是極端遲緩的，而新的有產階級分子還沒有形

成一種進步而正在發展的農村資產階級。土地的危機只是延長着；到一九〇五年革命後之五年，還是如此。我們一個秘密的宣傳者敘述一九〇九或一九一〇年列寧會見的情形說：『我看見列寧研究省議會（Zemstvos）所發行的統計書。他對我說，必須及時預備土地的綱領。一九〇五年發生土地運動，我們沒有綱領。到一九〇六年，我們有了一個綱領，但是不會有土地運動。我們應當準備一個新的農民的行動』（見無產階級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第五號二三七——二三八頁）。

當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數年間，俄國資本主義迅速進化，由私人壟斷的資本主義進步到國家資本主義，總之漸漸與國家結合起來了。國家與資本主義的組織，有時混合起來；到一九一二年四月勒納（Lena）事變時，這種新的事實已經明白告訴俄國無產階級了。罷工與槍斃罷工者，在俄國無產階級歷史中已不是奇特的事情；但是勒納罷工使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相處於一種特別情形中，即表現國家與生產

步步有顯而易見的聯絡，而為政府代表所承認的。在議會(La Douma)被質問的代
表曾經說過：『是聯絡的，并且將來也是如此』。這種宣言引起工人中激烈的抗議。
因為政府預備在一切情況之下槍斃罷工者，于是工人可以并應當明白提出推翻這個
政府的問題，那是用不着其他選擇的。

鬥爭又開始了，如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形勢一樣。無產階級進行奪取政權，農
民繼工人而奮起。至於俄國資本主義，在他尋找市場的時候，努力參與各國政府的
鬥爭，而遷就英法資產階級之意旨。那末，俄國工業資本主義之迅速發展，結果是
保存鄉村中封建的財產，而削弱捲入帝國主義的政策中之資產階級。同時，因為工
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成城市中之集中的，有力而善戰的無產階級，以及鄉村中廣
大的農民革命軍。於是農民為土地的鬥爭——實際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鬥爭——成為
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而與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的鬥爭混合起來了。因為沙皇制度

，俄國資產階級與世界資本主義之密切的聯絡所給封建制度與俄國工業之每次打擊，于是都影響到英法的銀行了。俄國的階級鬥爭帶有一種國際的性質，實在包含并牽涉到歐洲資本主義的利益。許多爆發力都聚集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組織中；但是在一切世界經濟中，都在醞釀并發展這種爆發力。世界經濟分化成許多彼此密切結合的，然而彼此對抗的組織，因此引起用武器以解決危機了。當衝突期間，私人壟斷的資本主義迅速進化到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於是革命同樣接近了。列寧說：「帝國主義的戰爭乃社會主義革命之序幕。這不僅是戰爭的仇怨引起無產階級的暴動——假若是經濟上不成熟，任何暴動不會建立社會主義的——而是因為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給社會主義預備了一種物質的基礎；因為牠是社會主義的先驅，因為這是歷史階段的等級，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再沒有中間的等級了」（見列寧全集一四卷第二部分一〇八頁。）無產階級為戰爭所吸引，同時并改變了本身的成分，

即引入許多小資產階級的分分子到他裏面來了。革命雖不免因此延遲；但是也增加了革命的潛勢力。

俄國革命之條件

第二章

俄國各社：階級與戰爭：由私人壟斷的資本主義過渡到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及固定資本之破壞；農業危機：階級對抗之發展；革命前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與農氏（小資產階級）。

俄國資本主義因為干與世界的政治而損失了生命。

戰爭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中——包括俄國的經濟——留了深刻的痕跡。戰爭變更了資本主義原來的構造，因為摧促了私人壟斷的資本主義到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之轉變。國家與生產之結合已經迅速形成了。戰爭竟加緊了資本主義制度之社會抵抗，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到處受着戰爭的破壞，特別激起了俄國的社會衝突，使俄國無產階級運動，農民運動與世界無產階級運動親密地連結起來。俄國

農民參加反對世界資本主義的鬥爭，果然暴動起來以反對戰爭。於是俄國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革命勢力混合起來了。

進入新的發展現象之資本主義社會構造之變動，突然到處表現。工業，第一是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勢力之軍事工業，當戰爭的時候，已有驚人的發展。

投入軍事工業中的資本已經增加。下面的表即指示俄國增加在軍事工業中的資本之情形。

企業	1913—1914 1914—1915 1915—1916				1913—1914	%
					相對立增加	
哈特曼(Hartmann) 機械建築公司	1.04	1.74	2.06	1.02	+193	
尼哥普(Nikop)	4.08	5.36	6.60	2.52	+67	
俄國火車頭製造所	0.64	1.05	2.80	1.66	+259	

(以百萬盧布為單位)

杜拉(Toula)工廠(皮革 及彈藥製造所)	2.88	8.39	15.51	12.63	+4.8
南俄德尼也普(Deniper) 機器建築公司	9.64	8.14	77.77	+2.47	+25

當大戰時，好些有限公司的資本有鉅大的增加。特別是投在日見擴大的五金與化學工業中之資本是如此。這些企業的資本從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增加兩三倍或四倍。在各礦業中，股份公司的資本由一九一五年之二〇·八六二·〇〇〇盧布，至一九一六年增加至六二·六六二·五〇〇盧布。西歐各國，交戰國與中立國一樣，關於軍事工業與資本都有些擴張并增加。在歐洲，資本的利益增加了；一九一四年英國折扣的利率為四，〇四，到一九一六年則增加到五，四七；德國折扣的利率，一九一四年為四，八九，一九一六年則為五，五；大戰期間常保持這種水平綫（見公德拉節夫(Kondratiev)：世界經濟六七頁）。

資本家的利息與資本主義社會活動之發展平行增加，英國與德國一樣。據公德

拉節夫教授說，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英國鑛業中股東的利息，每噸煤可得一·五五仙令；一九一五年為二·二仙令，至一九一六年則有三·五仙令。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德國電氣總公司的利息分配額為百分之二一；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則為百分之八八。大戰第一年以後，俄國工業的利息有鉅大的增加。當大戰的頭一年，德密多夫 (Demidov) 製造所的利息增加百分之八八；高加索 (Caucase) 煤油公司的利息增加七倍，即百分之九九。據工商報 (La Gazette Commerciale et Industrielle) 說，銀行發行的股票之利息額配分增加百分之五。一九一五年俄國工商銀行分配利息，每張利息券付二〇個盧布，一九一六年則付給三〇個盧布。一九一五年阿佐夫——頓銀行 (Banque d'Azov et du Don) 分配二〇個盧布的利息，一九一六年則有五〇個盧布。

充分發達的工業使資產階級得到許多金錢，但是這種幸運却包含着很深的矛盾

。當資本匯集到工業中而利息高漲之時，勞動的生產却是低落了。可以說，同時完成了兩種過程：一方面在沒有參加戰爭的國家，如日本與北美合衆國等生產并不見得減少；另一方面在各交戰國中，工業與農業却是不斷地衰落。例如鐵的生產指示了這兩種過程；看下面的表即可以明白。

鐵的生產

年份	英	法	美	德	意	比
1913	869	434	2,623	1,674	36	207
1914	755	928	7,976	843	32	121
1915	739	49	2,534	638	31	3
1916	755	109	3,340	772	39	11
1917	790	117	3,271	799	39	1

1918	768	108	3,308	765	26	—
------	-----	-----	-------	-----	----	---

(右表見蘇哈諾夫(N. Soukhanov)：大戰前後之世界經濟三二頁)

這個表很明白地告訴我們，世界經濟有兩種相反的過程：生產力之減少與增加。生產減少，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中更是明顯。鑛業與五金生產——軍事工業與一般工業的工具所最不可少的——一年一年低落，有如下表所指示的（數量以蒲得(Le Poud)為單位)：

	金	銅	鑄鐵
1913	3,714,6	1,972,500	287,960,000
1914	4,056	1,838,000	264,250,000
1915	2,936	1,536,500	225,291,000
1916	1,858	1,269,000	231,865,000

	鐵與鋼	煤	石油
1917	1,385,5	—	190,548,000
1913	246,557,000	2,500,052,000	563,400,000
1911	240,037,000	2,175,425,000	556,900,000
1915	199,433,000	1,905,496,000	56,810,000
1916	205,862,000	1,954,688,000	492,000
1917	157,587,000	174,692,700	422,600

俄國工業中操作的工人數量與生產之繼續低落並行增加。假設以一〇〇〇指示一九一〇年在三十二個區域中操作的工人數目，到一九一四年，則增加到一一八（一·三五二·五〇〇個工人），一九一五年爲一二五（一·四四〇·九〇〇個工人），到一九一六年則爲一二九（一·四七七，〇〇〇個工人）。在鑛業與冶金工業中，特別表現

勞動的增加。冶金工業中的工人數目，由一九一三年之二九九·七七八人增加到一九一四年之四五二·三七四人當時勞動之個人的出息却是縮減了。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一個工人每月生產一一九蒲得的鑄鐵；在革命之前夜，每人只生產一一九蒲得而已。『在一切工業部門中都是同樣的情形。』下面的表是關係於多乃次(Donez)煤礦者。

年份	每月在煤礦操作的工人之平均數	每個礦工每年的生產(以蒲得為單位)
1913	168000	9.185
1914	186000	9.054
1915	181000	8.989
1916	235000	7.451
1917	280000	5.398

這些數目字指出無論表面如何漂亮，用金子來裝飾東家的工業狀況是不太昌盛的。生產不斷地減少，而勞動力却是增加，即此可證明是一個嚴重的危機；爲戰爭需要所刺激的工業極力維持生產，而再行徵集勞動力以補贖工具之損害，戰爭引起工業中之劇烈的失調，使工業消耗於無用；於是工業各部門的比例失其原態了。再生產的過程已經停止；要想維持工業生產之同樣的水平綫，勢必使牠的工具受強烈而破壞的影響。與戰爭多少有關係的工業部門都是如此。在冶金工業中，因爲由新機器的數目之漸漸減少，即表現了這種過程。下面的表(包括冶金業)即可估計工具的損壞。

工具	南方(Sud)	烏拉爾(Ural)	莫斯科(Moscou)	窩爾加(Volga)	北方(North)					
	1912	1913	1912	1916	1912	1916	1912	1916		
鐵解爐	95	97	83	75	43	50	4	4	49	17

鋼鐵爐	32	28	7	3	1	„	„	4	4	4
馬丹爐 (Martin)	82	88	67	75	18	28	15	18	29	28

在一九〇八與一九一二年之間，俄國南部增加十六個鎔解爐；從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只增加兩個而已（見薩拉比雅諾夫 (Sarabianov)：俄國之冶金工業四三——四四頁）。

因為戰爭放肆的消耗而發生之基本資本的損傷以及生產的不平衡，在非直接的軍事工業部門中表現得更明顯，並且對於全國經濟有嚴重的影響。

俄國農業中也發生類似的現象，用舊了的農業機器都消滅了，當時差不多停止了生產農業機器。據伊思邁樂夫斯加雅 (Ismailovskaja) 說（見伊氏：俄國農業機器的構造四七頁），一九一四年製造之農業機器只有戰前經常的生產百分之九〇，一九一五年只有百分之五〇，一九一六年只有百分之二〇，至一九一七年只有百分之一

五了。凡屬農業所需要的東西都移到軍事工業方面去了。但是農業機器的需要是非常大的。戰爭給農村以明顯的打擊，因為他使大批農民脫離了生產的勞動。俄國有些地方被動員的壯丁之比例達到百分之五三還多。在一九一六年，沒有那一個地方不是很感覺勞動力之缺乏（見克尼波威治（Книпович）：農村經濟（一九一六年之國民經濟））。

因為戰爭，使俄國的農業開闢了廣大的前途；資產階級的原則之貫輸於農業中，是很迅速的；但是，因為農業工具與機器之缺乏，農業仍然是不能抵抗危機的，並且有一部分全為適合戰時市場的條件而衰敗了。俄國南部的農業是最遭殃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為缺乏機器與勞力而迅速衰敗了。在中部各地方大的資本主義的耕地尚能維持。而農民的經濟却早已衰退，有如下表所指示的（見公德拉節夫：穀物交易四〇頁）。

克爾遜 (Kherson)

德西雅丁(以千為單位)

%

年份	農民	地主	農民	地主
1900/13	2,602	1,567	100	100
1914	2,692	1,591	103,6	101,4
1915	2,607	1,432	100,3	94,7
1916	2,655	672	102,1	42,8
1914/16	2,651	1,248	101,9	79,7
薩拉多夫 (Saradov)				
1900/13	2,173	188	100	100
1914	2,181	233	100,3	128,9

1915	2,199	223	101,2	118,9
1916	2,011	197	92,7	110,6
1914/16	2,131	217	98,2	115,8

【附註】：德西雅丁(La declaine)合1·0九赫克打(Hectare，即合10·九00平方米)。

農民經濟的衰敗，大抵全國如此，不過衰敗的程度或大或小，各地不同罷了。在封建領地所掠奪之不甚肥沃的地方，農民的經濟衰敗是很快的；在農民頗有土地而農業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之肥沃的地方却是慢些。為市場的生產，因為農業中缺乏生產工具所引起之恐慌影響而低落了。為個人消費的生產更是遲滯。播種穀物的面積顯然減少；在南方，為市場的穀類生產比較為地方消費的穀類生產更加減少；在北方，農業更與市場接近，並且得到政府好的保獲以抵制勞力的缺乏（俘虜在工業區之大農莊工作者，占勞力百分之二七，在普通農民中工作者僅有百分之〇，三

(見克力雅轍夫(Kriachev)：戰爭與革命期間之農民二五頁)，貴族的大的墾殖更能抵制危機并維持在市場的地位。下面的表指示每德西雅丁之播種面積，即可證明剛才所說的情形：

年份	黑芬士		欠肥沃的士	
	裸麥	最上等小麥	裸麥	最上等小麥
1913	10.821.8	7.409.8	5.983.7	7.103.3
			738.9	4.679.0
1916	10.051.8	6.245.0	6.098.6	5.797.7
			750.6	4.342.7

(這些數字是蘇維埃第九次全俄大會土地委員會所指出的)

農業危機在農村各種社會分子中發生各種不同的結果。假若農業有發旺的商業前途，則使資產階級分子有進步之可能，反之，被剝奪了生產工具與勞力的——

他們的勞動者被動員了——小農則屈服於軍事負擔之下，雖欲維持生產，結果只是消耗他們的工具。社會的對抗日見發展而嚴重。在人與工具兩缺的農村中之階級分化發展起來了。

無家畜與種子的農民已經增加。克力雅轍夫在其戰爭與革命期中之農民一書中有關於當時農村人民分化之數字。在諾夫哥羅得(Novgorod)區，有幾縣未播種的地畝之數目非常增加。在伯樂則爾斯克(Balozetsk)縣未播種的土地之百分比，一九一八年只是一，至一九一四年則增加到四·七；無論家畜的企業由百分之一九·五增加到百分之三一·七了。如此，戰爭給資本家以發揚的希望而保證他們有逐漸增高的利息，同時，却破壞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即於生產的時候破壞了他的基本的資本——機器。一種可怕的危機逼迫起來了。當資本主義為維持以前的水平綫并表示在戰場上的威權而努力之時，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之破壞，使他集中大批工人到

製造所去以圖補足因徵集動力所致之工具的損失。但是，戰爭已經動員并武裝幾百萬的勞動者，在一切資本主義的組織中，徹頭徹尾都感覺消費物品之缺乏，於是必須提出生產品的分配問題了。

資本主義已經動員并武裝農民羣衆，并使他們形成一種社會分化的過程。與國家聯合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即催促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之實現。資本主義既增加無產階級的數量，同時即變更了他的質量：革命的軍隊之實額已經擴大，而他們的戰鬥力却是減少了。資本主義招集許多小資產階級心理的農民到製造廠去，并且普遍地僱用婦女勞動。至於無產階級的質量，由他的數量擴大而增加的革命潛勢力之爆發，因他的質量薄弱而延遲了。一九一三年在工業中作工的婦女之比例只是百分之二六；一九一七年則已加到百分之四三，二。

當大戰時，俄國無產階級陷於最艱苦的經濟狀況中，於是很容易引起他的階級

意識之覺悟與形成。他們的工資與他們西方的弟兄們的工資一樣，早已減少了。生活程度的增加比工資的增加快得多。軍事工業中的工資之增加比其他工業中迅速得多。例如，當冶金工人的工資大約增加兩倍的時候，陶工，磁工，以及密工的工資差不多停滯不變。在一九一六年，工資特別提高了。在一九一四年，冶金工人全年賺得三二四個盧布；一九一五年有四四五個盧布，到一九一六年，則有七一六個盧布。但是生活程度的提高更屬厲利。假設以一〇〇代表一九一三年的麵包與工資之價格，那末證明一九一五年一月的工資漲到一二八，麵包却漲到一四一；到一九一六年四月，工資是一四一，而麵包是一八二（見生活騰貴之研究第三卷一六七頁）。

那末，生活品價格的騰貴給俄國無產階級很嚴重地壓迫，同時在各國——中立的或交戰的——都表現生活品的昂貴。因為生活品的昂貴，逼着俄國無產階級再三考慮以至于發生有力的行動。

當大戰開始時，所有無產階級的組織與黨部已破壞。戰爭使一般人的精神都感覺擾亂。生活昂貴，惡劣的勞動條件，戰事延長，都足以促使無產階級意識之覺醒。縱令無產階級因滲入大批小資產階級的分子而衰弱，但經過平靜一年之後，他即出現於社會舞台之上，始而保持經濟的鬥爭，繼而達到政治的鬥爭。政治思想與無產階級的行動同時振作了。一九一四年已經破毀的政治組織到一九一五年秘密恢復起來；於是工人要求組織，了解并考慮過去的事實。自一九一五年初起，彼得格拉已經恢復被破毀的波爾什威克的組織；他的工人戰鬥員想發行一種非法的報紙——工人之聲 (*La Voix Ouvrière*)。該報記者之一說，這是『我們第一次的出版物』；他已確定我們對於戰爭的態度；該報說：『工人是國際的，應當對戰爭宣戰——一種神聖的戰爭，即是內戰』(見紅色年鑑二——三號一一七頁)。一九一五年初，這種波爾什威克的小組未能領導工人開始鬥爭。但是，從一九一五年秋起，有大批工人所

參加的經濟鬥爭變成了政治的罷工；到八九月，工人參加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者有幾萬人。一九一五年計算有三八三·五八七無產者參加七一五次經濟的罷工，二一三次政治的罷工參加者有一五五·九二一人；一九一六年，有一·一六七次經濟罷工，增加者七七六·〇六四人，二四四次政治罷工，參加者三一〇·三〇〇人。當戰爭期間，一切經濟的罷工都變成政治的罷工，即是無產階級與用統治機關，壓迫機關自然武裝起來的資產階級之決鬥。那末政治鬥爭擴大了，但是無產階級還沒有了解他的政治目標：：

戰爭與經濟恐慌之延長，更增加工人的不滿意。一九一六年沒有那一月沒有牽引數萬工人之罷工。但是無產階級之思想的陶養還是很薄弱的。在社會民主黨中，因為戰爭暴露了很深的危機。因此他們分成保護國家派與國際主義的失敗主義者。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多數派）(Le parti Ouvrier Social

Democrate Russe (Bolcheviste) 中央委員會所發表的宣言中說：「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為內戰是為巴黎公社 (La Commune de Paris) 的經驗與巴爾 (Bale) 決議案所正確指示之無產階級的唯一口號，而是充分發展的資產階級的國家互相爭奪之帝國主義戰爭之一切條件出發的。縱令這時候轉變的困難是如此之大，一旦戰爭成爲事實，社會主義者絕不會否認根據這種意義之系統的，預備的，繼續而堅持的工作」。

參加社會民主黨運動之俄國無產階級的份子還沒有明白了解這種觀念。無產階級分子中有贊成保護國家的信徒。必須在行動中使無產階級開始明白戰爭是爲資產階級的利益繼續進行的，而他所當採取的唯一態度只是國際主義者即指示給他之態度。當一九一六年，經濟上雖已鞏固的俄國資產階級還沒有感覺到害了死症，而且等待戰爭，使工業適應戰爭，並不注意無產階級之利益。爲軍事工業委員會選舉工人代表的競爭，使無產階級羣衆認識他們中間兩種相衝突的精神狀態。這次選舉使

無產階級認清了他們本身地位。凡屬無產階級聽從保護國家的信徒的話而跑進軍事工業委員會的地方，無產階級即相信在委員會中無事可做，這些委員會只是資產階級之場所。軍事工業委員會的工人分子常常感覺爲憲兵所監視（俄國憲兵即代替政治警察的職務）。在一封關於某省委員會的情形之報告中，有地方的憲兵曾經這樣說，因普列哈諾夫一書信的影響，首先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的工人們毫不遲疑地相信他們參與在這些組織中是無用的並且退出來了。

無產階級認識他們本身的道路是很遲緩的；工人羣衆的革命精神之擴大與奮勉的意志之發展更是遲鈍。經過一九一六年最後幾個月與一九一七年的開始，因爲罷工逐漸擴大，却已表現工人革命意志之發展。農民與大批集合在營房裏的兵士之怨憤同樣增加了，工廠與農村之怨憤反應到兵營中了。不服從命令，不守紀律以及逃竄的事情漸漸習爲故常了；資本主義爲發展一切勢力，集中這樣多的羣衆在營房裏

，至不能把他們變成極簡單的戰爭材料。軍隊自行離散，前敵與後防都是一樣。在薩馬拉(Samara)，有許多紀載這樣說，『三德次基(Sandetsky)司令常常發佈一天一天嚴厲的命令』；但是兵營的紀律常常弛懈了。三德次基漸漸禁止兵士出營；然而非法的缺席一天一天加多。軍官們已是狼狽不堪；罪犯如此之多，以致無法可施。要問那一個人受過處罰與否，差不多說不清的。兵士都知道他們的官長之困難情形，並且到處發現違犯規則的事，日見增加了（見薩馬拉區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之革命）。

由前敵一個很有職權的高級軍官克里莫夫(Крымов)將軍證明了同樣的精神狀態。據他的意見，軍隊的不滿意日見增加，甚至不能預料那一個時候，軍隊將會簡單地跑走而回到他們的家鄉去了。從一九一五年十月以來，西方前敵參謀部副偵探長曾經注意到『爲反政府宣傳所影響的西伯利亞的軍團，已經表示不振作，並不準

備參加攻擊，大抵軍官與兵士一樣，都是希望戰爭之迅速終止，無論條件如何」（見紅軍第四號四二一頁）。這種精神狀態自是關係政治問題的：例如第十二軍的軍事批評說，『兵士與官長都充分注意俄國與資本中之政治事變』。結果是發展了軍隊的政治意識，並想用革命的方法解決一切政治問題。狄邦哥（Dybenko）在他的筆記中，曾經敘述海軍的革命精神以及在海軍中組織暴動之情形。

資本主義社會進到一個恐慌與崩潰的時期了。許多資產階級的人物都表示如此。從一九一五年起，駐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法國公使巴勒阿洛格（Palcologue）在他的報告書中曾經注意俄國革命之可能性。俄國政論家勒姆克（Lehnke）在他解釋（沙皇大本營之二百五十日）中說，他聽得亞勒則也夫（Alexiev）說，基本勢力之爆發與資產階級的俄國之衰敗已經快到了，怨恨深入無產階級之最下層分子中，並帶有漸漸明顯的政治形式，這種怨憤引起農民革命的醞釀，並得到軍隊中的響應

。壓迫一九〇五年革命之農民的軍隊，已經變成新的革命之重要因子之一。在一九一七年一月，政治運動引起二二八次罷工（罷工者有一六二・〇二八人）。據官廳組報告，二月間有二四七・七〇〇罷工者。老實說，在二月一個月內，無產階級，尤其是彼得格拉的無產階級，常常處在政治罷工與小戰中。一天一天發展而鞏固之彼得格拉的無產階級運動，牽動了農民的軍隊；並且當全國資產階級非常恐怖並十分憤懣的時候他們掃除了貴族的君主政體之組織而引起資產階級當權了。

當二月間，在各大城市到處遊行之幾百萬工人與農民將一九〇五年同樣的問題寫在他們的旗幟上，並且實際生活中提出來了；但是因為戰爭與俄國資本主義之新的構造，當時的情形却是不一樣的。各種懸而未決的問題還未表現成爲一個很確定的綱領之形式，並沒得到實際解決；最大的原因，就是無論無產階級與農民都還沒

有明白了解這些問題。無產階級雖然還沒有確定的目標，但是知道君主政體時代已經滿了；於是與小資產階級協同進行，於二月間即把帝制推翻了。

俄國各社會階級與職等

四四

第二三章

一九一七年二月——三、革命之爆發及其內部矛盾。

當二月尾，在彼得格拉，因為工人革命，發生了無產階級的罷工與示威運動，並打擊已經很衰微的政府。工人運動迅速地變成革命，從最初起，即以其忍耐，堅強與彼得格拉偉大的無產階級羣衆之參加而著聞。照正式數目說；二月二十三日有八七五三四罷工者；二十五日有二四〇〇〇人。正式的統計即止於此。

二月二十四日，沙皇后從彼得格拉寫信給在前敵之尼古拉第二(Nicola II.)報告革命發端的消息。她說，事變發生於麵包之缺乏。二月二十五日。她還斷定已經變成一種革命的運動為平民的騷亂。關於同樣的事件，二月二十四日沙皇后有一封

新的信給尼古拉第二。大本營 (La Grand Quartier Général 簡寫爲 G. Q. G.) 已經決定抵抗了。二月二十七日，尼古拉第二任命伊凡諾夫 (Ivanov) 將軍爲彼得格拉區的軍事指揮，並以最好的軍隊歸他節制。但是，這位將軍的兵力並不會達到彼得格拉。伊凡諾夫在半途即已信服革命運動的勢力。他很難取得札爾斯各若——塞羅 (Tsarskoïe-Sélo 小城名，離京二十三基羅米突，即沙皇行宮所在)。在這個小城中，一長槍大隊與一機關鎗師團向車站進行，因爲要他的軍隊離開那裏。將軍沒有等開始行動，即帶着他的軍隊到威力扎 (Vyrysa) 去了。當他如此圍着彼得格拉旅行之時，舊制度之最後的政府，想在首都保全地位。

二月二十六日，在瑪利宮 (Palais Marie) 舉行內閣會議。對於高漲的革命怎麼辦呢？各部大臣決定同資產階級的代表開談判。這些資產階級的代表——帝國議會——要求內閣辭職，並組織一個爲國民所信任的內閣。大公爵密舍爾 (Michel) 於二

十七日應召到彼得格拉，他同會議的首領與協約國的外交官（英國公使居第一位）磋商一切。他曾參加二十七日的內閣會議：會議後，即以各關員的幫助，起草給尼古拉第二之電報。陸軍大臣與密舍爾想直接向大本營通報他們對於彼得格拉之感想。尼古拉回答他們說，爲採取必要的決定，他要回到首都。大公爵與資產階級教君主政體讓步之企圖已經失敗了。

然而大公爵密舍爾活動地參加抵抗的組織。他與英國公使布查南（Buchanan）商議，並要求報告大不列顛（La Grande-Bretagne）對於變俄國爲君主立憲之態度。而且法國與英國的公使，在帝國之最後幾分鐘還表示很活動的。他們欸待羅蔣哥（Rozianko，他是第四次議會議長，豪富的地主，即自由資產階級之著名的首領）的使者。在前敵之法蘭西與大不列顛的代表極力慫恿尼古拉第二讓步，並採用君主立憲。他們担任讓步後之墮落的王統之保護。五月一日，英國將軍威廉（William）拿着

一封信見尼古拉第二，他在那封信內，指示沙皇號召人民援助君主以完成其重大的使命之時機到了。二月二十六日法國公使巴勒阿洛格與立憲民主黨（Gadet）的首領馬克拉哥夫（Makalov）談判。法蘭西與大不列顛的公使即認戰爭問題為最大的問題。

• 二月二十六七日，他們曾經到外交大臣博克羅夫斯基（Poklovsky）家裏幾次。二月二十七日巴勒阿洛格對他說：「在還嚴重的情況中，協約國的代表很有權力告訴帝國政府對於內政的意見」。外國資產階級的代表給俄國資產階級的代表之勸告，就是由君主與資產階級間之調和，建立君主立憲。但是無論法國與英國的代表之努力如何，帝國的君主已被推翻，而君主與資產階級間之調和亦已失敗；於是兩個公使更盡其力之所能及，以維持并鞏固資產階級，他們對於尼古拉第二表現極大的憂念，很欣幸地贊成以尼古拉·尼古賴也維治（Nicolas Nicolaievich）大公爵為高級司令之任命。他們以為那就是成功之保證，軍隊歸服資產階級之表示。在組織臨時政府

之後，法國與英國的公使即刻與外交總長的米留哥夫 (Milioukov) 開過談判。布奢南曾在他的報告書中，敘述他們主張維持尼古拉尼·古賴也維治大公爵爲軍隊的首領。在他們眼光中，這是「掌握軍隊之最能幹的人」。他們以維持臨時政府爲反對蘇維埃的鬥爭中之最緊迫的工作。法國與英國的政府爲要繼續戰爭，必須維持臨時政府；俄國資產階級與他們一樣，希望勝利地以遂其敵愾之心，如此則維持同盟很是必要的。並且布奢南與巴勒阿洛格的要求沒有遇着任何的阻碍。新曆三月四日（即舊曆三月十七日）巴勒阿洛格與米留哥夫有一次會談；米留哥夫明確地承認戰爭到底。法國公使要求臨時政府再不遲延地決定其續戰爭之意志，并忠順於協約國。米留哥夫承認「給協約國以新期望的一切担保」。

與封建貴族的君主政體鬥爭的俄國資產階級，常常監視工人區域，并自工人運動如緊以來，從沒有減少與君主政體之聯絡。當二月革命的時候，彼得格拉工人區

域所發生的羣衆運動，已經蔓延到軍隊中，并牽動了俄國資產階級。俄國資產階級有他的指導者做代表，自從遇着工人運動，即努力阻止，壓迫并消滅他，利用工人與農民的無知而與君主政體妥協，并攫取政權，但是羅曼諾夫的君主政體崩潰了，再沒有行動與商議之力量了。唯有資產階級與革命對抗。因爲資產階級無從與君主政體妥協，并沒有時間與他妥協，那末只再想保守權力。他在時勢威迫之下，承認各種讓步而希望保守權力，並只是犧牲政治的形式，而獲得時間以恢復暫時犧牲的利益。

『國會諾長羅蔣哥與臨時政府將來的主席爾活夫（Lvov）打電話給魯斯基（Rousky）將軍說，米失爾·亞力三大羅威治（Michel Alexandrovich）大公爵宣布登極，只是火上添油，引起人們儘可能的無情的屠殺。我們失掉一切權力，沒有人能够壓制平民的運動。在我們所引用回復王統的公式中，沒有不相容的，同樣都是希望

最高會議與現存的臨時政府保持作用，一直到戰爭結局。我相信在這些條件中可以迅速平息怨憤，而確定的勝利是我們的（見俄國革命紀錄二六六頁）。爲事變所牽動的資產階級，只是幻想保護政權并壓制革命。因此他建立他的政府機關——國會臨時委員會，即刻發展大的活動，團結資產階級的力量，調柯爾尼洛夫（Kornilov）將軍到彼得格拉以恢復秩序，并從事爲權力與勢力之鬥爭，反對工兵代表蘇維埃。

羣衆自發的運動，沒有組織與指導的中心。當彼得格拉巷戰時所發生的組織與執行革命的羣衆之間，最初缺少一切的聯絡。革命已經蔓延全城，而新生的組織中心沒有策略與武力，還不知道甚麼一回事。無產階級以及隨從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士兵羣衆——實行革命了。多數派（Les bolchevics）中央委員會辦公處與彼得格拉委員會，從最初起即參與革命。多數派與羣衆一致進行，並努力指導他們。他們的政策，主張在這時候擴大運動，包圍並奪取軍隊，以與君主政體作充分的決鬥。施

立亞普尼哥夫 (Chiapnikov) 在他的論文中，敘述他固執地攻擊中央委員會辦公處之不堅決的暴動的意志，而主張和平地征取軍隊之必要，命令在各營附近組織羣衆大會，並引誘兵士到會。在彼得格拉與其他的地方都是如此：無產階級到處都站在二月革命之前鋒。羣衆的力量還沒有組織的。羣衆還沒有明白了解適當的方法以達到他們的目的。

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於二月二十七日，差不多與國會臨時委員會同時組織成功。假若必須相信蘇哈諾夫 (Soukhanov) 少數派，曾參加一九一七年彼得格拉第一次蘇維埃的功作的記載，這次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包含下面這些人：克隆斯基 (Klensky) 斯哥伯勒夫 (Skobélev)，蔡澤 (Tchéidzé)，格活次節夫，(Grozdiev)，格里尼也維治 (Griniévitch)，邦各夫 (Pankov)，薩哥洛夫 (Sokolov)，蘇哈諾夫 (Soukhanov)，加白林斯基 (Kapelinsky)，薩哥洛夫斯基 (Sokolovskiy)，查特羅夫 (Charov) 斯特克

洛夫 (Sieklov) · 扎魯次基 (Zaloucky 多數派) · 巴夫洛威治—克拉西哥夫 (Pavlovich-Rassikov 多數派) · 施立亞普尼哥夫 (Chiapnikov 多數派) · 亞夫山大羅維治—得米特里夫斯基 (Alkandrovitch-Dmitrievsky) · 以各黨的代表資格參加者：馬洛多夫 (Molotov 多數派) · 愛立世 (Erllich) 與拉菲 (Raffes) (二人屬猶太同盟) (Bund juif) · 博格達諾夫 (Bogdanov) 與巴杜斯基 (Paroursky) (二人屬少數派) · 布含孫 (Bramson) · 代表勞動黨者，始則茶伊哥夫斯基 (Tchajkovsky) · 繼則有斯丹克維治 (Sankewitch) 盧沙諾夫 (Roussanov) 與參齊諾夫 (Zenzinov) (社會革命黨) · 皮也舍合諾夫 (Piechekhnov) 與察爾諾魯斯基 (Tcharnolousky) (平民社會黨) · 攸里也尼夫 (Jourieniev 社會民主的組織) · 斯杜治加 (Stoutchka 勒頓社會民主黨，同情多數派) · 加次洛夫斯基 (Kazlovsky · 波蘭社會民主黨，同情多數派者)。那末少數派，社會革命黨，平民社會黨以及勞動黨，即是只認俄國革命為資產階級的革命之各派，在蘇維埃執行委員

會中占多數；多數派只有四個代表。執行委員會的成分即決定了他的策略。執行委員會不想擴大并發展革命，如多數派四月二十六日宣言中所指示的，只是設法迴避革命，避免陡然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之緊急問題。由羣衆組成的工人代表蘇維埃（會議）應當說明他們的革命的意志。但是羣衆還沒有了解革命之社會綱領，他們的注意，都專重在封建貴族的君主政體而給他以許多打擊；因此，使主張推翻封建貴族的君主政體之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代表，擔負了革命運動的代言之責任。在羣衆的心願與他們的代名人之間之矛盾，只在一九一七年不久即已表現，同時無產階級，農民的心願與資產階級的心願之間之矛盾亦復如此。

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與國會臨時委員會間之鬥爭，集中在軍隊。資產階級爲達到對外政策之目的，與爲鞏固政權一樣，都需要完全的軍隊。但是，假設執行委員會的多數隨從資產階級之對外政策，那末這些多數應當在內政上反對實現與崩潰的

君主政體之調和，以及壓制革命之企圖。當二月蘇維埃與臨時政府談判的時候開始鬥爭，不久，因為資產階級革命之兩個階段的信徒之間之調和而終止了。蘇哈諾夫在他的論文中說，三月間，斯特克洛夫(Steklov)曾經將這件事通知蘇維埃會議。在這些談判中，曾經討論三個問題：這些問題正好說明資產階級之志願與希望。資產階級毫不願意預斷政府之形式(共和或君主立憲)；拉精哥(Radiniko)與爾活夫的商議，已經將這點明白告訴我們了。資產階級反對軍隊中之改革，承認維持舊的紀律。為蘇維埃所讚賞之軍隊的内部自治權，遭了激烈的反對，并且資產階級的大首領米留哥夫還起草共同宣言之一段，只附帶地說：『廢除保存在各等級與服務期間中之舊的軍紀，兵士的公民權之一切限制』。

國會臨時委員會力圖鞏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沒有放棄任何活動的機會。他顯然繼承先帝的命運。但是羣衆的力量，剛已接續三次推翻羅曼諾夫之君主政體，

這種社會的力量還沒有好好組織，只有主張資產階級的革命黨徒在蘇維埃表現不好的感覺與不正確的口號；然而羣衆還是疑惑，在無產階級與農民的眼目中，是不斷地希望滿足最低限度之明白而正確的政治要求。

缺乏組織，缺乏無產階級羣衆所能了解之階級鬥爭的綱領，以致工人在二月間沒有明白注意去奪取政權。無產階級雖願意放棄權力給資產階級，然而無產階級爲事實所迫，已經決定他的階級綱領。二月以來，已經爲他具備奪取政權之一切的條件；并且無產階級讓資產階級統治，同時在資產階級的權力組織之側，主立工人代表蘇維埃無產階級的權力機關。

列寧在他的遠道寄回論兩個權力並存之信中以及四月論文中，都給了一個全般的估量，首先指明二月革命之意義與價值。他考察二月革命爲資產階級的革命，而決定這次革命，是根據由這一階級的權力轉移到另一階級之社會的特徵。當二月間

，權力已由封建貴族的君主政體之手轉給資產階級。并且革命是取得法國與英國資產階級之同意與幫助而完成的。在擴大的革命勢力逼迫之下，俄國的與英法的資產階級想都利用革命勢力的弱點，在所謂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爲內戰已經明顯之戰線很不鞏固的地方，保存將來之成功。列寧在『無產階級在我們革命中之任務』論文中指出：由現存社會力量的關係以及帝國主義戰爭引起的嚴重形勢所發生之二月革命，即表明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內戰之開始。帝國主義的鎖鏈，第一次在他的弱點處折斷了。列寧說過：『二月革命是變帝國主義爲內戰之開始。他是走向戰爭結局之初步，因爲只有由另一種行動，即是轉移權力給無產階級，才能保證戰爭之結局。這就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戰線破裂之開始，并且只有破壞這個戰線，無產階級才能使人類脫離戰爭之恐怖，而給他保證永久並鞏固的和平』。二月革命乃是無產階級與農民所成就之資產階級的革命，雖說有資產階級參加。資產階級接受了政權，即採取一

種反革命的態度。革命的形式與特徵也是如此。從此，無產階級與農民構成他們本身的組織，預備變資產階級的革命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在臨時政府——資產階級專政——之側，已經組織蘇維埃了——無產階級與農民之民主的革命的專政機關。這就是時勢之最顯著的特徵。

在資產階級政府之側已有蘇維埃。列寧說：「二月比革命習慣上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更進步些，但是還沒有達到純然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專政」。二月革命之政權問題與國際作用之特別景象，指示俄國無產階級以新的任務，民主的革命獨裁已經實現。無產階級應當更加前進。列寧在他回到俄國之翌日（四月四日）所發表的，並為多數黨四月會議所通過的論文中，已經決定工人階級與黨的任務。他說，革命的主要問題是政權問題。他肯定說，無產階級應當為蘇維埃共和國而奮鬥。並且，為以重大的鬥爭成就蘇維埃共和國，必須組織小資產階級與農民，使他們脫離階

級合作的影響而受我們的領導。當前的任務即在組織贊成由蘇維埃掌握政權之革命的多數。要列寧贊揚拒絕與臨時政府之合作，必須使無產階級與農民明白起來反對臨時政府。

列寧對於二月革命的估計，以及由這種估計中抽出來的推論都遇着加麥業夫 (Kaménev) 與一部分多數派的戰士之反對。加麥業夫以二月革命為未完成的資產階級的革命。他不以為這次革命，即表明政權由這一階級到另一階級之轉變，但是一個確定的政綱之實現。加麥業夫與他的同志因為視二月革命為未完成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拒絕列寧四月論文中所提出之策略與戰略的計劃。加麥業夫為回答四月論文，曾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在真理報 (Pravda) 發表一篇論文，表示他不接受列寧的意見。他說：「假若我們在俄國已經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並且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影響之下我們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那末，要求政府採取達到和平的手

段，真是不合理的。口說憲法會議，並幻想一個議會的共和國，也是不合理的。畢竟列寧同志毫不願意變更他的理論，更沒有想到這些事情；假若他想到這一層。只是否認他，不在乎向政府提出些要求，不在乎揭破他的假面具，不在乎有議會的共和國，只在乎有蘇維埃等等』。

必須怎樣辦呢？列寧說，必須以巧妙而進步的行動，堅決地準備資本主義的失敗。這種行動已經迫切，這是很顯明的。但是達到社會主義并破壞資本之行動，唯有工人能够做得到，并且他們知道，在歐洲一個經濟的最落後國家。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農村還沒有脫離奴隸地位之時，這種行動是不可能的。如此所說的狀況不甚利於社會主義之進行。因為加麥業夫以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沒有完成，所以他認為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還沒有完成他的使命。由此得到的結論是，蘇維埃——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力量之結合——以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為任務。加

麥業夫對於工人與農民的結合，以及這種結合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之使命，得到一種錯誤的估量。他以為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聯合存在於資產階級的革命中，但是只在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分離而繼續他本階級的目的之時，才能結束資產階級的革命，而開始社會主義的革命。那末，照加麥業夫的意見，因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沒有完成，需要繼續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合，并須使這種聯合與臨政府分離。因此，蘇維埃對於臨時政府必須實行管理。這種戰略不能發展階級對抗，使無產階級與農民反對資產階級，只是教無產階級去維持他。加麥業夫在四月會議提出的意見遇着列寧有力的反對。列寧說，加麥業夫跑到蔡澤與少數派的方向去了。四月會議的多數，都反對加麥業夫的意見。

列寧與黨部，還須保持他們對於二月革命之估量，反對托洛斯基在他的著作中所發表的意見。托洛斯基（當時在美洲）曾在外國各地發表幾篇關於二月革命的文章

。他在那些文章中轉載了他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之估量。他把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比較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這次革命與那一次革命相似。他說：「彼得格拉的街市從新談起一九〇五年的故事了。現在與當時一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工人要求麵包，和平與自由。如當年一樣，電車停止，報紙再不出版了。並且在首都街市中，只看見兩種力量：工人與沙皇的軍隊」。如一九〇五年一樣，托洛斯基否認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作用與意義。『俄國小資產階級在那裏？他的經濟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如一九〇五年一樣，托洛斯基確定由工人奪取政權的口號。列寧估計小資產階級的作用之時，他即指出鞏固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之必要。托洛斯基以爲無產階級征取小資產階級而獨掌政權。一九一七年，列寧研究托洛斯基這種觀念，即說，這種觀念帶有一種想超越還未經過的農民運動而陷於主觀主義之危險：我們不是被迫而陷於主觀主義中，不是願意超越還沒有經過並沒有完成他的使命之農民運動嗎？假設我

縮；沒有沙皇，要一個工人政府，則我們是冒險」。此所以列寧應當在動內保守他的戰略的計畫，同時攻擊很久以來爲歷史所否認之托洛斯基的戰略計畫。列寧的戰略計畫已經多數黨四月會議通過，并且不久由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實行起來了。

第四章

二月——三月革命的內部矛盾之顯露：各社會階級及爲政權之鬥爭。

我們說過，二月革命含着深厚的矛盾：造成革命之社會力量；使一個以攻擊并降服革命爲主要任務之政府得到權力；工人與工人所領導之兵農羣衆，以革命的行動，提出戰爭，土地與麵包問題了；當時握權的資產階級只想其護舊俄羅斯的組織，恢復『秩序』，並攻擊爲工人兵士的本身目的而奮鬥之黨。工人與兵士都希望并要求一種對內與對外的有力的政策；當時臨時政府，自革命開始以來，即召柯爾尼洛夫 (Kornilov) 到彼得格拉，并用一切的方法，竭力保守並鞏固舊俄羅斯之貴族與資產階級的組織。

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即是在這種矛盾制度中失望地掙扎。着工人與農民本身亦很難解除羈絆。自二月革命初期以來，這種矛盾即已明顯。各種問題顯然提出來了，第一是戰爭問題。「許多兵士來到編輯所。他們很有神氣的。他們來，是爲要談話。人們殷勤懇切地招待他們。這種軍隊是我們的。他們談論着戰爭。『無論如何沒有和平，只是要停止戰爭』。這不是一種決定，乃是平民的意識所提出的問題。委員會（軍事的）的委員也來了：這不是些左派，中立，右派的人。人們正在戰爭，怎麼辦？戰爭一直到最後的勝利」。大家都是這種見解。並且在問題是更困難的時候，我比一九一四——一五年，更是茫然自失，無所適從。我處於工業家，自由派與社會主義者同心一意之前，茫然自失，無所適從」（見龍德伯格(Landberg)：柏林一個著作者的日記三九頁）。

這些文字見之於諾活羅西伊斯克(Novosisk)，然而到處如此，在被得格拉，

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都是一樣。當權的資產階級與工農之間的衝突，隨時隨地都發生了。因為戰爭所引起，發展並不斷地加重之經濟恐慌，構成這種衝突之基礎。

經濟破產以及農業與工業間之破裂，是戰爭發生以來即已開始的現象，特別在一九一七年令人酷烈地感覺到的。戰爭所發生之生產力的浪費開始發生結果了。城市與鄉村之間——工業中心以及原料與糧食之間——的關係之由破裂運輸破壞即可以充分證明的。鐵道因為戰爭而有驚人的活動。鐵道網——鐵軌，車頭，車箱——之固定資本還沒有恢復，他又很快地破壞了，第一在全國感覺運輸之遲滯。有許多數字可以證明。在一九一六年，二十四點鐘以內可以調動三八·〇〇〇車箱；一九一七年，只能調動二七六三五車箱，或是減少百分之二八七。一個車頭在二十四點鐘內之調動，比從前減少百分之二七·五一，同時在一九一六年，二十四點鐘以內

行駛九一威斯特 (Veres 俄國的里，約合一〇六七畝)，到一九一七年，減為七五威斯特。在各工業的中心，都表現飢荒的景象。一九一七年十月，工人報 (Rabochaya Gazeta) —— 少數派中央機關報 —— 發表關於一九一七年所定的麥粉與小麥之統計沒有好好估量。試看下面那些數字：

定貨與裝運之關係

一九一七年	為軍隊的	為人民的
一月	54.4	0.2
二月	45.9	29.6
三月	50.4	41.4
四月	36.4	24.7
五月	61.4	56.9

六月	53,2	34,3
七月	32	26,1
八月(1—15)	18,4	—
八月(16—31)	31	32,7
九月(1—15)	26,2	—

這個表揭明少數派的政策之完全的失敗，不能採取有力的方法以抵制破產；他指出了客觀的情形，以及裝運的百分比之繼續的低減因之減少分配給軍隊與人民的糧食數量之比例。運輸總長烏斯特魯哥夫(Оустругов)在臨時政府經濟委員會集會中所引證的數字亦有同樣的指示。

一九一七年六月，彼得格拉收到五·〇五二車箱麥粉；第二個月，只收到一·九五九車箱。糧食供給已經減少；麵包與各種食料品之價格平行地提高了。在一九

一七年一月，一半冠(La Litre)麵包的價格，比戰前增加百分之二〇〇；到七月，則增加到百分之三三三。失業也增加了。據米留丁(Miloutine)所發表而很不完全的材料(見米留丁；俄國現在經濟的發展與無產階級專政，一六頁)，失業者數目增加如次：

一九一七年	三月	停閉企業	有6,646個工人
—	四月	55	2,168
—	五月	103	8,701
—	六月	125	38,455
—	七月	206	47,759

因為廠主有意的怠工，機器與工具的損壞，於是在這種經濟恐慌的現象中，失業的軍隊擴大了。擺在無產階級前面之嚴重的經濟問題，顯然要得到一個解決。臨

時政府——與世界資本主義相角逐之資產階級的政府——只具了一種『保護的』作用。

當一九一七年，臨時政府，無論他的成分如何，在外交政策上已有一種不變的態度；他用盡一切的力量，只想繼續戰爭到勝利——俄國資產階級的要求與利益之勝利。第一次臨時政府，簡單明瞭地，毫不曖昧地，是如此說，如資產階級有時候自己說明一樣，這些資產階級常常不知道在外交的狡滑之下隱藏了他的嗜慾；嗣後的內閣已經包含德謨克拉西的分子與蘇維埃的代表，還是如此說，但是用一些所謂世界和平之好聽的語調。自二月初間起，從無產階級與農民掃除君主政體以及資產階級占據政權之時起，資產階級對於外交政策已經採取一種很確定的態度：戰爭到底，儘力戰爭，跟着『光榮的協約國』戰爭。三月四日至十七日，米留哥夫致駐外之俄國外交代表的電報中宣言，俄國實行『不變的尊重過去的政府所担任之國際義務，并遵守他的約契』。『俄國爲反對共同的敵人，不屈不撓地奮鬥到底』。米留哥夫

熱烈地保持這種態度，并常常在他的外交政策中貫徹這種精神。他的繼任者——資產階級之另一個代表，也是如此做。米留哥夫被無產階級與農民驅逐出臨時政府；但是他們只排斥了一個人，仍舊讓資產階級繼續使他們所不滿意而為他們所欲阻止之外交政策。米留哥夫的繼任者——德爾世承哥（Terchchenko）仍舊不屈地，熱烈而堅勇地，繼續戰爭到最後的勝利。俄國資產階級很知道他將來所得到的最後的勝利與英法兩國的資產階級所得到的有不同的意義。他希望與他的『光榮的協約國』繼續戰爭，但是，在革命之前，他害怕這些協約國奪取他的戰利品之最大部份。他的地位因革命而嚴重了。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攻擊他，并願意脫離戰爭；當時臨時政府極力強制無產階級與農民為富有階級的利益而鬥爭。於是臨時政府應當強迫俄國勞動者戰爭，同時要他們保護他的戰爭的目的以反對英法的資產階級。俄國資產階級由戰爭的血腥的練子與英法資產階級連結起來，暗地裏還是與他們爭鬥；并且

當戰爭期間所發展的爭鬥繼續到一九一七年，同時，無產階級與農民逼迫俄國資產階級以至于完全的失敗。五月二十四日（即六月六日），外交總長德爾世承哥給駐倫敦之俄國公使有如次的電報；『英國政府贊成在原則上審查戰爭之目的，我們認為在這個時候召集協約國談判這件事并非我們的利益。當臨時政府想在前敵恢復地位之努力得到成功的時候，約集這種談判的時機就來了』。這個電報是有意義的。他表明俄國資產階級與英法資產階級之間之關係。他指出俄國資產階級建立在他的武力之上之希望。末了他告訴我們爲甚麼俄國資產階級如此熱烈地繼續戰爭。他的階級目的，他的階級利益都操在一種鬥爭中，這種鬥爭不僅使他與德奧的聯盟相爭，而且與資產階級的法國與英國相爭。誠然，在這種鬥爭中，俄國資產階級不是孤立的，保護國家的社會主義者是熱心援助他的。

社會革命黨的海陸軍總長克隆斯基是他的奴隸中之最重要而且最勤勉的。克隆

斯基之一切努力，無非想再開戰爭，引導軍隊大大進攻，因此造成一種地位，以便教俄國資產階級，一方面向無產階級與農民，一方面向英法資產階級，放大炮，說硬話。這就是要給俄國資產階級保證與協約國暗地競爭之戰利品。因為他本身的階級利益的憂慮以及巴黎與倫敦的命令所逼迫，於是急於要俄國的軍隊從事反攻，以期勝利地結束戰爭。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都是贊助這件事的。以為現在的革命是一種資產階級的革命，並且俄國必然要向前進化，於是他們自事變發生以來，即反對繼續革命，抑制革命，以圖維持資產階級而使工人與農民不超乎二月革命的範圍之外。

經濟恐慌不斷的增加，使他們不得不注意生產與分配之組織。大家都感覺經濟規則化之必要。資產階級雖然與無產階級一樣注意這件事，但是幻想另一種的解決方法。他們宣稱：不承認在他的經濟中有任何的強取以及任何權利之減少。六月初

間，各工業家在彼得格拉開了一次會議。他們宣言：『所有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制度是不能存在於俄國的』；並且工業生活之規則化，應當完全操在資產階級與廠主的手裏；凡屬妨害這個原則與資產階級的權利的，例如工人監督生產，只是使『企業家失敗』，並且應當『立即制止，認爲反對全國人民之利益』（見一九一七年六月三日比爾奢維也，威也多莫司的(Birjewe Vidomosti)交易所雜誌)。

在彼得格拉與莫斯科，同時在各製造所與各工廠的委員會會議的時候，無產階級要求工人監督生產，都認爲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那末階級對抗已經表現得很激烈，很明顯的。資產階級所倚賴的特權與社會的霸權，爲無產階級所攻擊。他採取許多合於維持他的統治之手段，而輕視因革命所開關之前途。五月間古治哥夫(Gouchkov)在軍事工業委員會發言的時候，他因革命的發展所迫，曾經宣言：『俄國的工業準備節制他的過分的利息以及全部的利息』。俄國的工業準備暫時的權

性，祇須維持私有的財產。古治哥夫又說：『資本之機械的變更，或如所謂國有化與社會化，都將構成一種爲任何方面所未曾嘗試而將剷除大工業之原來的基本之經驗』（見濟伯羅維治(Tsiporovich)：俄國之新提加與托拉司）。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搖擺於這兩種敵對的勢力之間，而想使彼此都歸服他，并且向工人表示臨時政府是勞動者的政府。階級調和的黨徒常常是反對工人的。

當工業家會議在彼得格拉開會，宣布凡屬妨害廠主的權利即是反對國家之罪惡的時候，少數派的機關報——工人報，發表一篇『列寧的黨徒怎樣攻擊已破壞的國家』之論文，這中有這樣幾行：有資產階級參加之臨時政府能够阻得我們的道路嗎？我們能够使一切經濟生活合乎規則，并且能够在現政府之下使他合乎規則，因爲全國人民之各階級都與這個政府有關係的；我們能够在工農羣衆的利益中使他合乎規則，因爲革命的德謨克拉西對於革命的命運有極大的影響（一九一七年工人報六

九號)。

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在一切問題中如外交政策問題一樣，都是反對無產階級的，因為照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原則，不得不如此；於是當時之階級衝突更加厲害了。那末只是使這一方面之工人與小資產階級以及另一方面之臨時政府與其觀念相同的人之間更加挖成了一條鴻溝。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常常宣傳多數派有脫離無產階級的危險，他們自己却已離無產階級而孤立。但是這把調和派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之減少，即刻反映到政治勢力之減少；階級調和派的影響與勢力已經低落。這些社會主義者不特不能滿足無產階級的要求，而且排斥無產階級；但是他們也再不能滿足大資產階級的要求了。他們想阻止革命，并使革命保存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於是對內不僅保護財產主的利益，而且對外要有一種積極的政策。保護國家與革命即表明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階級調和。

從客觀的觀點看繼·續戰爭直到最後的勝利已有結果了。工人報的指導者說：『反攻絕不是保守之反對物』。保護國家與革命，是深深地與帝國主義的屠殺相聯結的。就資產階級說，在前敵之一切勝利與失敗，即是他的勝利與失敗；在保護國家與革命的黨徒之心目中，法國與英國的帝國主義者，都是俄羅斯帝國之『光榮的協約者』。因為利用我們前敵的軟弱，德國參謀部從那里抽出他的隊伍以壓滅英法的軍隊，隨即傾他的力量對付我們的前敵，以便對俄國革命提出他們的條件』（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工人報八十五號）。革命之資產階級性的含義本少有國際性的含義；而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則因俄國革命做了英法帝國主義之溫順的奴僕，因為他們因革命而勾結協約國的戰勝國，而在這些國家中之資產階級革命則久已成功。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為對內保存資產階級的制度，反對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而鬥爭，同時他們對外也背叛革命，如沙皇昔日之所為者。

四月十八日，最初的爭論即是戰爭問題；少數派與社會民主黨之曖昧的態度即刻表現出來了。六月十八日，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想表示他的帝國主義之專橫。現在根據駐彼得格拉之法國公使巴勒阿洛格與英國公使布奢南之備忘錄，知道所有外交總長米留哥夫的演說與解釋，都是受這兩個公使之影響的。俄國資產階級想打仗；因為占有內閣的交椅，他只想消滅革命，因此情願承認外國財政之要求。巴勒阿洛格與布奢南曾經直率地敘述他們與米留哥夫之會談，他們的要求，以及他的預約等。四月十八日關於俄國盡忠於協約國戰爭目的之文書，即是俄國資產階級與其債權人的默契之結果。這種文書引起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方面之激烈的反對；而且這種衝突即包含革命的最後的矛盾之種子。多數軍隊，即大部分的小資產階級，大呼反對臨時政府；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之中央蘇維埃機關的委員雖為羣衆的逼迫所屈服，然而他保護政府而努力消滅衝突；同時很知道一種外交政策的改變，將引起

改變對內政策的問題，總之將引起許多問題，如所謂善良的社會等，照例要交給憲法會議去解決。

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還明白起來與工農對抗。他們的語言行動已是資產階級所委托以馴服工農之保護者。四月十八日的示威運動，即表示政府與羣衆間之決裂，而暴露彼此之社會性質與目的。列寧分析四月十八日事變說：『兵士以一種無效慮的，無用而且矛盾的呼聲——打倒米留哥夫！發起示威運動，似乎變更某一個人與某一派即可以變更一種政策之原來的性質。這就是說，接近農民之偉大的，飄流而不固定的羣衆——照他的科學的定義說，小資產階級的羣衆——正在動搖間，將由資本家方面而趨向於工人了。這種動搖，這種能以他的權力決定一切之羣衆運動，發現危機了』。這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離棄臨時政府之開始。資產階級革命的原則，使階級調和的黨徒不僅要維持并保護臨時政府。而且要參加政府，以便執行

保存資本主義社會之傳統的基礎之資產階級的政策，當時爲世界大戰與恐慌所引動之工人與農民，不得不由自己去解決實際生活所提出來的問題。

臨時政府之對內政策，使小資產階級羣衆離開了，同時并樹立了他的朋友與仇敵。階級對抗已經緊張了。沒有人尊敬階級調和的黨徒之忠信。六月十八日的反攻所表現之進攻的對外政策，激起彼得格拉無產階級之怨怒。在四月間已經教人感覺他們對於臨時政府之離貳與怨恨：到蘇維埃第一次大會的時候，有七月的示威運動即已充分表現了。在七月三，四，五日那幾天，無產階級已經由示威運動達到實際運動。彼得格拉的工人紛擁於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所在地——金牛宮(Les Palais de Tauride)之周圍，要求他担保政府的責任。

運動失敗了。全俄執行委員會拒絕掌握政權，因爲他很知道，執行政權，要有一個新的綱領，拋棄資產階級革命的原則，而過渡到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這幾天影

響是很大的。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用武裝的力量反對無產階級以及跟隨無產階級之小資產階級。自是以後，由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的指導者化身之委員會以及無產階級之間，已有了血痕。依照委員會的命令，解除工人與參加示威運動的兵士之武裝，并拘捕一大批的人；對於運動之參加者與指導人，如對多數黨，特別壓迫得厲害，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發布許多命令，反革命的軍官即遵照執行。

凡屬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所常常請求的事，即有專門担任這種事業的軍官，將軍去執行。因為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的態度與壓迫的殘暴，於是用一種新的力量提出政權問題了。為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以及反革命的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所敗之無產階級，只有威迫他的反革命的敵人之共同戰線，才能完成他的使命：一言以蔽之，要奪取政權。列寧知道七月三日至四日的事變很是驚歎；當他分析的時候即說：「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經驗以後，就是革命的無產階級應當自己掌握政權，否則，革

命勝利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一四卷第二部分一七頁）。同樣的觀念影響到多數黨第六次大會的工作。這次大會是在克隆斯基政府最壞的時候，即是黨被壓迫，差不多變成非法狀態的時候召集的，這次大會在他的宣言中說：『刺刀不能安輯人民的……。歷史之潛勢力正在發揚。在人民羣衆中醞釀了一種深刻的怨憤……。我們展開旗幟，進行戰鬥……。他知道正在預備一種新的運動，并且舊社會的末日是遠遠了』。全俄執行委員會起來反對工人，行將衰弱，自行衰廢，一天一天離開他的社會的基礎，與資產階級密切聯合，已經暴露出來，只是保護富有階級而執行他們的政策，再不能飾掩資產階級之反革命的計劃。

資產階級的要求變成更迫切了。他想完全利用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一日，哥爾尼洛夫打電給臨時政府：『專爲一種沒有出路而變動之臨時方法，急需在前敵設制死刑并組織軍法會議』。哥爾尼洛夫威

嚇地說：『這够了，假設政府拒絕我所提議的辦法，使我無法保全軍隊并利用牠所謂保護祖國與自由之真正目的，那末我將離開我本身的首領——我，哥爾尼洛夫，高級司令』（見一九一七年俄羅斯之聲（*Russkoié Slovo*）一五七頁）。臨時政府也是保護『祖國與自由』的，軟起耳根聽從這位將軍的威嚇，而急於滿足資產階級的要求。政府的命令與傳單之體制，彷彿就是哥爾尼洛夫的命令與宣言之體制。內務總長則赫特里（*Tseretli*）——少數派的首領——寫信給各地方委員會，這樣說：『現在的時候，不可有遲疑與散亂的行動；唯有一個有力而統一的政權才能保全祖國』（見政府公報一一一號）。

臨時政府，縱令反對工人，并不曾為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視為可以給他一切保障的。當他執行資產階級的命令與要求的時候，他只是為資產階級之最後的行動預備些地步。資產階級不能拋棄他的目的，在前敵與在後方一樣。但是資產階級為達到

他的目的，應當自行統治，用不着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之中間人，他要政權，并想一種軍事獨裁的形式之政權。哥爾尼洛夫將軍在八月十四日莫斯科國事會議演說之時，沒有得到一切資產階級的讚賞之表示，他宣言：「假設接取許多為健全軍隊并增加他的戰鬥能力之方法，我以為在前敵與在後方都要採用為國家安全所必要的嚴厲制度，不應有所區別」（見一九一七年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新聞一四四號）。

資產階級不只是口說，而且準備行動了。在他看來，克隆斯基顯然不及哥爾尼洛夫，無論他如何溫柔馴順。臨時政府中之內閣陰謀已經成熟。政府中的一個總長伏拉的米爾活夫(Vladimir Lvov)曾在他的回憶錄中敘述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克隆斯基欺罔我，并不努力攻擊多數黨，他缺乏意志；并且如果有人要問必須擴大他的權力與否，那我即去見德爾世承哥，并且問他：克隆斯基與哥爾尼洛夫那一個最好呢？」（見一九二〇年巴黎最近新聞(Pоследnie Novosti)八四頁）。

在這些說話中應當注意的，就是說這些話的地方以及說這些話的原因。在臨時政府之資產階級的總長眼中，再不需要那些階級調和的黨徒了。

克隆斯基爲攻擊多數派由前敵召回之聯隊，進行反對他自己與臨時政府了。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想由哥爾尼洛夫的暴變取得政權。據新聞報 (Izvestia) 說，哥爾尼洛夫的行動之發露已經引起交易所金融價格之高漲 (見伏拉底米羅法 (Vladimirova) : 一九一七年革命四卷一一頁)。努力參加活動之爾活夫的記事，即已指明甚麼是暴變的基礎。「八月二十一日我回彼得格拉，在車上與一位同路的將軍談話；他告訴我，爲出席軍事會議回彼得格拉去；在這次會議中應當提出許多要求給政府。」我問他，八月二十日聽到甚麼消息嗎？——這位將軍說，我不知道，我僅僅知道命令這天動員舊的警察與我所領導的憲兵。無論如何，將要給政府一個哀的美敦書；如不接受，則會發生變故」(見一九二〇年最近新聞一九〇號)。

哥爾尼洛夫失敗了。七月三日至五日已經失敗并受了嚴厲壓迫之無產階級，堅決一致拒絕這種反革命之反攻。一個跨着白馬的將軍之怪物，惹起羣衆集合於蘇維埃的周圍。在反哥爾尼洛夫之鬥爭中，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已經表現他們之間強大的力量。這是無產階級的組織——蘇維埃——所領導之羣衆抵抗哥爾尼洛夫。即此表明臨時政府之無能。無產階級羣衆的精神都已集中於政權與武裝問題。代表莫斯科各工會之全體會議關於哥爾尼洛夫暴變的動議中說：『如攻擊反革命，顯然有組織真正具有革命精神者——即工人羣衆——的武裝之必要；而且必須組織赤衛軍，預備聽工兵代表蘇維埃的緊急命令以保護革命，并堅決地壓迫反革命』（見伏拉底米·羅夫：一九一七年革命四卷一二九頁）。

蘇維埃抵抗了哥爾尼洛夫，於是握住了政權。在純然無產階級的中心，即是這種情形。魯干斯克（Lougansk）得到哥爾尼洛夫暴變之最初的消息，即拘捕許多軍

官，組織工人大隊，設立法庭，總之在鬥爭期中，政權即歸蘇維埃了（見哈哥夫（Kharkov）十月革命五週年紀念六三四頁）。哥爾尼洛夫的行動，即表示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拋棄階級調和的政策，并趨向於波爾什威克主義之最後的階段之一步。對外政策與經濟破壞，都足以發展階級對抗；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都想以健全的方法解決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并揭破階級調和之不可靠。從哥爾尼洛夫失敗以來，波爾什維克主義的影響顯然擴大了。

第五章

十月革命之前夜：工農羣衆自動地集合於多數黨旗幟之下；多數黨爲適合革命之準備與組織；事變前夜之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的羣衆，離開小資產階級的黨，而趨向於多數派之急促的改變，是頗混亂的，特別在哥爾尼洛夫事變的明日，無產階級的各種組織之趨向波爾什威克主義，可以證明。各市議會，工廠委員會及蘇維埃之政治態度，都已開始改變。從前由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之代表所構成的多數已經分離，而各組織的指導的責任交給多數派了。全俄國無產階級的組織，從無產階級的中心以至於各省，都是如此。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羣衆之趨向波爾什威克主義，到八九月更加明顯。有各種證

據都可以證明：自哥爾尼洛夫事變以後，波爾什威克主義對於工人與兵士之影響迅速增加。首先在彼得格拉就是這種情形，如哥爾尼洛夫事件以前，市議會選舉結果所指示的。

試看這次選舉的結果：

黨 派	滿期的市議會		新選的市議會	
	議員的數目	數目	議員的數目	數目
社會革命黨……	54	75	5	2
立憲民主黨……	47	42	—	1
少數派……	40	8	—	1
多數派……	37	67	—	1
勞動黨……	11		—	1
平民社會黨……	6	2		
黨 派	滿期的市議會		新選的市議會	
統一派……	議員的數目		議員的數目	
急進民主黨……			1	
民主共和黨……			1	
工商大同盟……			1	
無黨派者……			1	

【附註】統一黨(Edinstvo)即保國國家的社會黨之極右一派，以布列哈諾夫(G. V. Plekhanov)爲

首領。

這個表，即指示哥爾尼洛夫暴變前彼得格拉選舉的勢力之比較，并可以得出有趣味的結論。首先躍現在眼前的，就是社會革命黨與多數派所得的議員數目；但是還有一點要注意。多數派所得的議席差不多加了兩倍；社會革命黨的勝利却是很少。多數黨與社會革命黨漸漸進步而妨害少數派及接近少數派的團體，使他們遭了很大的失敗。屬於少數派的議員數目，由四十票減成八票，即是失敗的證明。平民黨，勞動黨，平民社會黨都失敗了。社會革命黨之所得，就是平民黨之所失，這是無庸疑議的。假設我們現在分析彼得格拉區多數派，社會革命黨以及立憲民主黨所得之投票的結果，試看一個大有關係的表即可以知道。

阿 姆

多數派

社會革命黨

立憲民主黨

亞米荷德 (Amirante)	4,233	4,952	2,531
(亞力三大——乃夫斯塞 (Alexandre-Nevsky))	12,180	22,820	5,993
華西里——阿斯特羅夫 (Vassili-Ostrov)	21,355	18,462	1,987
維波爾 (Vyborg)	22,487	8,519	2,703
卡贊 (Kazan)	2,284	3,998	5,478
加洛曼斯基 (Kolomenski)	7,015	9,042	6,179
李德呂 (Liteyni)	5,293	10,999	12,038
莫斯科夫斯基 (Moskovsky)	8,508	13,917	13,190
納爾華 (Narva)	23,177	24,969	7,8 ¹ / ₂
彼得格拉 (邊界)	26,781	18,232	18,582
羅哲斯宛斯基 (Rojdesvensky)	5,321	13,477	11,530

斯巴斯基 (Spasski)	3.020	7.141	5.927
勒斯諾爾 (Lessnoe)	5.770	4.044	3.894
乃夫斯基 (Nevsky)	—	—	—
諾華雅節列夫惹 (Novaya Derevnia)	3.689	2.739	2.698
伯德哥夫 (Petrov)	17.255	8.807	953
波留斯特羅活 (Poloustrovo)	5.789	10.825	1.741
總計	174.092	182.203	110.928

(此表見一九一七年語報 (Ritch) 一九七號)

我們看見有幾縣內多數派所有的選舉票，顯然超過其他各黨所得的票數之總和。如阿西里——阿斯特羅夫，維波爾，彼得格拉邊界以及伯德哥夫等處即是如此。我們應當注意，多數派得到絕對多數的地方(除彼得格拉邊界外)，即是屬於立憲民

主黨的票數比其他黨派少些的地方。有幾處地方，社會革命黨得到絕對的多數，但是立憲民主黨只占着很少數。李德尼與莫斯科夫斯基就是這種情形。這又怎樣解釋呢？當大小資產階級集中的州縣投票給社會革命黨與民主立憲黨之時，那末純然無產階級的州縣則投票給無產階級的黨（維波爾）。那末，從八月起，我們的黨在彼得格拉工人區域有了堅固的基礎。并且，有些數字即可以證明。我們在彼得格拉無產階級中之影響，經過夏季即龐然擴大了。

各省的市區選舉，同樣可以證明我們黨的影響之擴大。在札力精（Tarisynne），七月初間（九日），市議會共有一〇二個議員，其中有三個多數派，四一個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以及兩個民主立憲黨。八月二十七日的選舉則有如此之成分：多數派四五個，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二六個，民主立憲黨兩個。在莫斯科選舉的結果更屬明顯（在哥爾尼洛夫事件後之選舉）。六月間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在莫斯科市區得有議

席的百分之七〇；九月選舉只剩有百分之一八；民主立憲黨達到百分之三〇；多數派達到百分之四七。在無產階級的區域，多數派的勝利特別顯明。工人的城市，第一落在我們黨的手裏。據俄文報（Rouskoié Slovo）說，多數派在阿勒荷活——諾爾和（Orkovo-Zouevo）市會議占議席百分之七五；在納爾華（Narva）占百分之五〇；在克隆斯達德（Cronstadt）占百分之四四；在伊凡諾活——活次乃三斯克（Ivanovo-Voziensensk）則占百分之三九。

還有純然無產階級的組織，如工廠委員會，工會委員會，蘇維埃都歸服我們的黨，這就極明顯地表明多數派在工人羣衆中的勢力之擴張。當時在少數派手中之莫斯科大企業之工廠委員，到八九月都移交多數派了。在頓（Don）區也是如此。莫斯科蘇維埃與他的執行委員會之組織都已變更。由多數派，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所組成的執行委員會，起初多數屬於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九月尾的選舉，則發生了變

化。從此以後，在委員會中，多數派占三二個（二四六票），少數派一六個（一二五票），社會革命黨九個（六五票），統一派社會民主黨有三個（二六票）（見從二月到十月一五頁）。

所有的蘇維埃，一個一個都移交給多數派了。八月三十一日，彼得格拉的蘇維埃贊成多數派的提議。莫斯科蘇維埃隨即響應了。蘇維埃的政治組織已經完全變更。薩拉多夫蘇維埃組織中發生之變更即是如此；因此使無產階級的黨之勝利的前進，到得一個明白的觀念。

薩拉多夫(Saratov)蘇維埃之組織

第二次選舉

第三次選舉

黨派	工人	兵士	工人	兵士
少數派	120	90	72	4

社會革命黨	50	260	43	60
無黨派者	—	—	34	—
多數派	40	50	164	156

(第一次蘇維埃延長到九月止；第二次蘇維埃是九月選舉的)(見薩拉多夫十月革命紀念(一九一八年))。

這個表是很有意思的。他證明與市議會選舉同樣的過程，但是還更明顯些。當少數派在工人區占有多數的時候，社會革命黨却在兵士支部中占有多數。這兩黨之破壞，即指示工廠的無產階級與從軍的農民都集合於多數派旗幟之下了。在這一觀點來看，薩拉多夫的數字即是一種特徵。在九月與十月初間，許多省蘇維埃與大的地方蘇維埃都已歸於多數派。

在同一的時期，各工廠開始自動地發起無產階級的武裝，不久即受多數派的指

導。自革命初期以來，羣衆雖已表示有建立無產階級的武裝與赤衛軍之必要，但在哥爾尼洛夫事件之後才使他們明白了解。從那時候起，許多工廠即着手組織赤衛軍。舉例來說：莫斯科密失爾孫 (Wicherson) 工廠的工人已經組織他們的赤衛軍。試聽一個參加事變的證人之敘述：『工人募捐以購買武器。他們都交一天的工資。因此他們可以得到四十枝奧大利與德意志的槍，每枝槍有二十顆子彈』（見索哥爾尼基 (Sokolniki) 十月紀念日五三頁)。無論到處自發地產生一點組織的企圖如何，工人階級已經處於暴動的時機。各工廠漸漸組織赤衛軍；彼得格拉在十月二十三日城區會議時起草他的規章，莫斯科則在十月二十四日已經開戰的時候。

這些規章決定了赤衛軍之目的，成分，工作與組織；赤衛軍乃『無產階級武裝勢力的組織，用以攻擊反革命并保護十月革命之所獲』（規章第一條）。工廠即赤衛軍之組織基礎。赤衛軍應當選擇工人階級中之最忠實的分子組織而成。『在各企

業中組織赤衛軍，他即服從當地所選舉的司令。小的企業工人則按區聯合，受一個共同的司令之指揮』（第十九條）。『赤衛軍隸屬於蘇維埃，而服從他的固有的司令』。

在八九月與十月間，農民羣衆已經同臨時政府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決裂了。經過二月革命，農民未能由臨時政府方面得到他們主要的要求——沒收大土地——之滿足。

無論臨時政府之繼續的組織如何，他是一致反對農民取得土地的。臨時政府與蘇維埃第一次全俄執行委員會之土地委員會對於此事之態度都是一致的。政府與委員會同樣都是教農民等待憲法會議。唯一的區別，只是臨時政府以武力壓迫農村，同時也有譴責與勸告，并且以哥札克分隊的幫助，輸入憲法會議的使命之高遠的觀念到爭取土地之有知識的農民腦筋中。被任命在蘇維埃第一次全俄執行委員會之少

數派與社會革命黨，當時對於這種實際的宣傳，給了一種觀念上的辯解。委員會的土地部發送許多傳單，宣言與命令到全俄國，勸告農民不攫取土地，不解決土地問題，一直等到憲法會議。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這種態度，實際上是維持在農村中的現狀，即是維持地主與貴族的土地制度。臨時政府用他所有的力量保護原來的地位。於是在農民與社會革命黨，少數派所支持的臨時政府之間挖成一條鴻溝了。

急於要取得土地的農民之力量是很可驚的。一切農民都是一致要求廢除大的土地所有權，幷一致以這個目標為最重要。臨時政府抵抗農民運動，想在他的辦公室來檢查幷解決土地的糾紛。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一般農民運動之發展及其進化之迅速。我們根據這些材料所看到的，農民由階級動搖達到暴動了。據臨時政府的記載，從三月到九月之七個月中，發生三·五五一件土地的擾亂。十月間的暴動都沒有記

載，因為政府只在月尾造統計；那末，十月尾再沒有這種記載了。暴動的發展如次：
：三月一七件，四月二〇六件，五月二五九件，六月五五七件，七月一・一二三件，
八月七四一件，九月則有六二九件。這些數字第一指示農村與城市比較，革命是遲緩些。當三月間，在中部的工業區域，革命已經完成，君主政體已經肅清。但是在農村中只指出十七件革命的行動。那末農民剛開始估計過去的事情，因為他們想得到教訓并決定方針。但自他們了解情形以後，他們努力着手工作并開始參加革命，在我們看來，特別需要土地革命；農民的革命行動不斷地擴大，他們為土地而鬥爭。一直到七月，鬥爭日見嚴重并擴大了，到八九月却是失敗了。因為政府對於城市與農村的革命之反攻，于是使無產階級在七月三日至五日受了失敗。但是假說八月的時候農民的行動之數量減少，而他的質量却已改良。在革命之最初幾個月中，因為地方政權歸給資產階級的組織之影響，農民想用特別的條約解決土地問題，

停止工作，阻止鋸木及木料的運輸，並且到處都設立義務的租地金。在八月間，他們開始沒收并破壞了。在革命之最初四個月中只有二四八件爭奪土地的事；七月間發生二五六件，到八九月前有二八三件；但是九月有一一二件搶劫與火災都包括在內。那末好了，農民由單純的爭奪土地達到消滅地主了。一九一七年農民行動的性質之變化如此，其變化的強烈即是由調和的傾向變成消滅的傾向，還有，在某種程度，則由自發的行動變成有組織的行動。

可以說，一九一七年的農民組織非常地勝過一九〇五年的組織。譬如在卡簪，一九一七年，農民發生八〇次有組織的行動與一五〇次自發的行動，在邦札(Penza)，農民有組織的行動有一六九次，自發的行動有一一八次。在丹波夫(Tambov)，有三九次有組織的行動，一〇五次自發的行動。一切有組織的行動之比例日見增加，并可以看出一種進化：八九月農民羣衆之自發的行動，開了有組織的行動之門徑

，并且不可抵抗地由停止工作與沒收工具以至破壞地主的財產。

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不扶助爲土地而鬥爭的農民，而且攻擊他。假設當革命最初幾個月內，社會革命黨在農村中得到一種確實的勢力，則可明白指示他們應當隨從的農民以解決土地問題的方式。唯有多數派是與農民一致爲土地而鬥爭。當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的時候，列寧認爲多數派應當以他所有的力量維持農民運動與農民的組織。他說，『因爲農民的組織——由他們的下層組織起——既沒有官吏又沒有地主與他的助手管理與監督，他是完成革命，以及從地主的羈軛下解放俄國之惟一而最可靠的保證』（見列寧全集一四卷第一部分八七頁）。

多數派不教農民等待憲法會議，反之要有組織，即刻解決土地問題。在四月全俄會議時，在列寧的提案與他所寫的決議中都已說明，無產階級的黨以所有的力量鬥爭，使地主的土地，親王的采地以及教會與帝王的土地即刻完全國有化。黨曾經

堅決地宣言，贊成土地即刻轉給農民，使農民組成蘇維埃或以別種民主形式，組成被選舉的，并與地主，官吏完全獨立之地方管理機關。無產階級的黨要求土地國有，廢除土地所有權及一切享有特權的財產形式。多數派勸告農民以組織取得土地而不破壞農業的企業；他們教農民準備并組織他們的行動。四月會議的決議，勸告農民莫破壞農業工具并增加生產。列寧給第一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的信，曾以多數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勸告農民即刻攫取土地，莫等待憲法會議，但是要有組織，不容許破壞工具，將土地交給地方委員會，并預備播種。他說，『我們的黨認為農民應當不遲滯地攫取一切土地，但是要用儘可能的組織，不容許損害一切財產，并且儘可能地增加麥子與肉的生產』（見列寧全集一四卷第一部分一五〇頁）。

多數派的宣言已經達到農民羣衆中，而農民爲土地鬥爭之組織與激烈不斷地擴大了。在農民全體對於社會革命黨，少數派所支持的臨時政府之間之鴻溝一天一天

挖深了。在那些從與土地所有權調和變成破壞土地所有權之農民中，新的社會分子取得運動之指揮權。二月革命以後，地方政權屬於農村資產階級，他們想維持特權的地位。到七八月，當時農民由調和變成破壞土地所有權與臨時政府在農村中之前哨，即是貧農站在爭取土地之前線。農村之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取得農民組織之指揮權，結合全體農民在他們的周圍，並且引導他們進攻貴族封建制度之最後的營寨以及資產階級之營寨。接着反對土地所有權的鬥爭又開始為和平的鬥爭，而反對臨時政府的鬥爭將變成一種為政權之鬥爭。他們在貧農指揮之下的都集合於波爾什威主義旗幟之下，並拿起武器反對臨時政府，九月間即看見這種情形。

九月間即有人宣布，在加次洛夫斯克(Козловск)與丹波夫搶了一處財產，並燒了二十五所住宅。當時在塞爾多普斯克(Сердобск)，薩拉多夫，土地的糾紛日見擴大，農民攘奪家畜，分配土地與森林並且爭取麥子。官廳都請求軍隊。地方執行委

員會則提議將土地歸給土地委員會，許多騷擾蔓延於亞特加斯克(Atkask)。在九月以內，到處有同樣告急的快電，并且一天一天多了。十月間有幾州縣的地方，土地糾紛成了一種完全普遍的現象。有人從邦札寫信說，在諾活·轍爾加斯克(Novo Tcherkassk)有八處財產被搶。遲幾天又有人從邦札寫信說，在薩漢斯克(Saransk)已經開始普遍地爭奪土地。土地糾紛蔓延到各州縣，食物供給的恐慌日見增加。這種農村的恐怖主義所普及的地方，即是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土地運動之舞台，如克尼波維治(Knipovitch)在他的著作(論土地 Sur la Terre)中所畫的土地運動圖所指示的；考察這種情形是很有趣味的。

農民開始為爭取土地的鬥爭，不久即帶有組織的形式：農民代表蘇維埃，州縣執行委員會，土地委員會都決定將所有的土地與工具完全交給農民，并且努力合理地應用這些方法。『薩馬拉農民代表全體大會決定將私人的土地與工具交給地方委

員會」。許多地方都採用這種類似的決議。當時無產階級與農民為政權鬥爭之同盟，顯然表現在臨時政府，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之眼前。無產階級與農民也實現了這種同盟；當九月農民戰爭達到極點的時候，列寧向他們發出這種口號：『恐慌即在目前』。

農民運動遇着大小地主方面之無情的抵抗。卡簪之地主協會說：『地方情形是很嚴重的，薩馬拉農民代表蘇維埃大會的決議非常流行而常常適用的。在憲法會議開會以前，因為扣押田產，工具與家畜，禁止工人為私人工作，對農民也是如此，於是引起許多重大的事變，妨害食物的供給，并惹起經濟的恐慌』（見革命之路第一號六六頁）。

許多類似的咒罵之聲震動全國。烏曼（Uman）地主協會打快電給大元帥，內務，陸軍，糧食，商業及司法部各總長說：『武裝的匪徒——專在道途以搶掠為生者

——繼續攻擊居民，搶奪財產，又農民對於地主與富農的土地之覬覦，都足以使國家發生經濟恐慌。臨時政府并非不聽從地主的哀訴。爾活夫王子屢次在地方委員會的機關報上指出農民爲土地鬥爭之完全無用。臨時政府大發電報，命令用『最有力的方法』，使亞法納西也活(Alfanasiev)村的農民將奪去的土地與工具，立即歸還加簪斯基(Kasynsky)地主……。』。秋季漸漸近了，財主的咒罵更加利害，而臨時政府關於各種處置的方法之命令更是增加。說服既是毫無結果，於是臨時政府命令他的官吏，遵照老的傳統方法，在農村中使用武力。騎兵散布在各城市中，但是也沒有結果。許多帶着憂愁的音調之通牒說，『巴各雅夫蘭斯克(Bogoyavlensk)與攸列夫·斯達里(Jouriev-Starti)村都發生擾亂并蔓延到李白次克(Lipeck)』，雖然有騎兵『有力的』行動，的確不能阻止農民的革命。因爲種種壓迫，于是構成農民與臨時政府(大部分由代表農民傳統的黨之社會革命黨組織而成)之間一種武裝衝突的狀況。爲

數千萬農民所參加並擴張到俄國很大部分之公開的鬥爭沒有別的結果，只是使臨時政府顯然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三月間使這個政府得到政權之羣衆又明白提出推翻他的問題了。無產階級離開這個政府，同時脫離小資產階級的黨派之影響，到處投票贊成多數派並請他們指導無產階級的組織。

因爲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之發展，工農羣衆與臨時政府之間之破裂，開始有無產階級，接着有農民羣衆，他們都趨向於波爾什威克主義，這些情形都反映到軍隊中；本來當一九一七年，階級鬥爭都帶有軍隊鬥爭同樣的性質。在臨時政府之資產階級的代表與無產階級的，農民的兵士羣衆之間，挖有很深的鴻溝。資產階級組成幹部與司令，而農民與從軍的無產階級却構成人的工具。因此，軍隊實行而且明白是反映資產階級的內外政策之同一的構造。他是對外政策之直接的工具，並且高級司令即使用這種工具以達到他原來的目的。千百萬被動員的工人與農民絕不滿意資

產階級之對外政策。當資產階級跟隨帝國主義的英法而努力繼續戰爭之時，兵士羣衆思念和平，爲和平而鬥爭，願意用全力以解脫帝國主義的戰爭。革命明確提出政權問題在軍隊的前面，無產階級與農民正在進行解決這個問題了。因爲軍隊的戰爭成分的關係，沒有把革命即刻着重在政權問題，而首先需要得到戰爭問題之解決。必須脫離資產階級之命令，建立無產階級之司令，并改組軍隊在新的基礎之上。在軍隊中所成就的革命，即是反映以鄉村爲舞台之革命。在軍隊中如在鄉村一樣，必須破壞資產階級的統治機關，而建立另一種統治機關。

照這種確定的目標，鬥爭帶有極變化的形式，開始是自發的行動，末了是充分審慎而調和的行動。大元帥的參謀長所起草之公文，極力說明了一九一七年六月半間軍隊之精神狀態。有一個兵士說：『我們已推翻舊政府，我們也將結清克隆斯基的賬』。在某些聯隊中，精神狀態時時變更。他們的革命行動遵循各種不同的道路

，逃營，拒絕命令，無紀律的事情一天一天加多。司令則儘可能地保持軍隊。結果在同一的軍隊中，發生一種非常的內亂狀況。背叛，即是兵士與從軍的農民爲脫離官長的監視之企圖。資產階級不惜運用任何的手段以維持一切兵士在他的制馭之下。壓迫繼續着。許多整個的聯隊被解除武裝；許多大隊被處了死刑。被司令官視爲一切罪惡根原之多數派的報紙受了壓迫。在西方前敵總司令處之臨時政府的委員報告，採取了許多特別的方法以阻火星報(La Zvezda) (在明斯克(Minsk)出版之)『顯然列寧派的機關報』到運隊中去。爲恢復軍紀，組織了『革命的』軍法會議。我們知道，有些兵士爲在一個果樹園摘了一個蘋果，或鼓動了這種『罪犯』，即被處了死刑。在軍隊的工農羣衆用反攻答復政府的攻擊，由自發的行動漸漸變成有組織的行動。兵士組織大集會，樹起旗子；在旗上寫有這些口號：『打倒戰爭！打倒資本主義的內閣！』，并且拒絕向前敵出發而隨從多數派。多數派的影響一天一天擴大。在軍

隊中，這種階級鬥爭，使兵士明白臨時政府的本質以及他的希望與目的，并使他們看清熱心辯護臨時政府，調軍反攻并再啓戰爭之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之作用。在工農的軍隊與臨時政府之間，軍隊與小資產階級——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的黨派之間，挖有很深的鴻溝。步兵大隊一隊一隊都歸向於波爾什威克主義。

在哥爾尼洛夫事變後，這種進化特別發展。軍隊不祇是以哥爾尼洛夫事件爲一個將軍之偶然的事，他很了解這件事之社會性質與重要。哥爾尼洛夫代表許多將軍——想主持并使用軍隊之資產階級，而軍隊答復哥爾尼洛夫，明白宣言他們站在那一方面。當他隨從多數派并提出政權問題之時，只是證明俄國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願望。但是特別是戰爭，使他們與資產階級鬥爭。工人與農民的軍隊不僅希望脫離資產階級的拘留，再不爲資產階級的利益去戰鬥，而且希望逃出戰爭，因此停止戰爭。從二月革命最初幾分鐘起，前敵即開始鬥爭，一方面反對戰爭，一方面反對繼續

戰爭之臨時政府。這種鬥爭就是兵士間的『互相親愛的運動』(La Fraternisation)。自三月初起，許多特別的報告都說明前敵『互相親愛的運動』之進步。列寧說，必須變『互相親愛運動』爲一種自覺的并有組織的運動；這種運動使無產階級在各交戰的國家中有取得政權之可能。

從革命最初的時候起，多數派即要求怎樣停止戰爭。列寧在四月會議所通過關於戰爭之決議中說，不能因爲兵士之簡單的拒絕繼續戰爭或交戰國的一方面之簡單的停止抵抗可以停止戰爭。必須使全體無產階級脫離帝國主義的戰爭。那末，照多數派的意見，『互相親愛的運動』爲最妥當方法，因爲他可以使前日尚在相殺之前敵無產階級的軍隊，變成一種以破壞資產階級爲目的之唯一的國際軍隊。臨時政府與司令官制止『互相親愛的運動』，因爲要抓住軍隊并繼續戰爭，因爲要鞏固他們的地位以及在與他們交戰之德奧資產階級之地位。反對『互相親愛運動』之鬥爭，變成一

種資產階級之國際的行動，即與無產階級方面的『互相親愛運動』相類似的行動。『互相親愛運動』是指導反對全世界資產階級的。俄國資產階級制止『互相親愛運動』，即是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并且這種反對『互相親愛運動』之鬥爭——爲在軍隊中之權力——漸漸使廣大的工農羣衆更加明白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的臨時政府之真正的社會性質，以及他們的口號，志願與要求之性質。於是軍隊更加與臨時政府相鬥，而且都傾向於波爾什威克主義。我們黨的影響之擴大，即表見於我們在軍隊的組織之發展；雖說有拘留與槍斃的壓迫與威嚇；我們的組織漸漸抓住了隊伍，大隊與聯隊的委員會。『打倒戰爭』，『打倒臨時政府』的呼聲，必須奪取政權的觀念，都貫注在千百萬無產階級與武裝的農民腦子裏。彼此的利益交錯在俄國的軍隊中。彼此都出軍隊中爲停止戰爭與土地而鬥爭。如此則資產階級的軍事機關因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之打擊而動搖；但是少數派的影響與組織阻止兵士羣衆之分離；於是這種軍

事機關保持他們的軍事改治的組織，而站在資產階級的壓迫機關與無產階級，農民的統治機關之間之中途。軍隊脫離資產階級，破壞舊的司令，而集合於他的階級組織之周圍。

克隆斯基時代的臨時政府之陸軍總長維爾哥夫斯基 (U. Verkovsky) 曾經證明在十月初兵士羣衆堅決地脫離臨時政府。這位總長在國會預備會的報告中說，『在前敵與後方都增加我們的不幸。自十月一號以來爲壓迫後方的紊亂用了十六次武力——這是在九天內的事。哥爾尼洛夫事變非常損害司令與軍隊之間剛開始建立的威信。從此以後，羣衆有再不相信任何人之感覺，因爲總司令與臨時政府打起來了。這種悲慘的歷史給我們造成一種不可測度的錯誤，並且我們在前敵與後方所看見之無政府的奮激即是這種錯誤的結果』(一九一七年十月俄文報二三二號)。

維爾哥夫斯基的證據在我們是很寶貴的。軍隊的敗壞與分離，即證明臨時政府

所處的地位已經動搖。全國最緊要的工具已在破壞中。這可以證明工農羣衆的不滿意充分表現在軍隊中。農民的軍隊最近還有多數在社會革命黨方面者，現在却捨棄他們了。許多隊伍，大隊，聯隊，破隊，總而言之，他的基本組織，如工人組織一樣，都歸向於波爾什威克主義。

軍隊（更正確說，兵士羣衆）脫離臨時政府，再不給臨時政府做犧牲的工具。農民分子畢竟脫離政府，因為他們再不希望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革命成功的條件——列寧所常常認定的——已經實現。農民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潮流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潮流混合起來了。

多數黨很好地視察革命形勢之發展以及使勞動羣衆與臨時政府之間的破裂為不可避免之行動的原因。自列寧回到俄國以來，他在許多演說與文字中都說革命應當由第一個階段過渡到第二個階段。從一九一七年三月起，列寧說過，「目前的口號，

任務應當是：工友們，你們在反沙皇的內戰中，你們造成了無產階級的，平民的英勇奇蹟。你們應當完成無產階級的與平民的組織之奇蹟，以準備在革命的第二階段中之勝利」。這就是說爲奪取政權。在四月多數黨的會議時，列寧在他最後的信中，明白決定由蘇維埃取得政權之必要的條件。俄國革命之客觀情形，由政權問題變成資本問題。列寧說過，「戰爭是難以和解的。他已經很明顯地提出兩條道路：不是消滅便是聯合各先進的國家并勝過他們，在經濟中也是一樣。那在我們是可能的，因爲我們具有大多數先進國家之經驗，如技術與文化之結果。歐洲反對戰爭之擴大的抗議與迫切的世界革命之期望，都給我們以精神上的幫助。我們爲民主革命的自由——當帝國主義戰爭時之稀少的自由所刺激，激動。或消滅或儘快前進，這就是歷史提出來的問題」（見列寧全集一四卷第二冊二一三頁）。

列寧在一九〇五年說過，俄國革命之成功，以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之聯合以及西方

各國對革命之幫助為條件。在這個時候，當俄國革命運動的潮流——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的潮流——漸漸高漲而混合之時，西方革命的進步又有發展，這是沒有疑問的。革命風潮之會合，到九月間的確明顯了。在同一的時期中（九月），在歐洲，特別是德國，都感覺革命之發展。俄國工農羣衆已經用最後的力量與臨時政府相爭鬥。

千百萬無產階級與農民之會集於波爾什維克主義旗幟之下，即表示黨應以選擇暴動時期為任務。當一九一七年，黨毫不懈怠地繼續在無產階級與農民中的工作，同時號召他們暴動，并準備為政權的鬥爭。到九月間，黨的影響之發展，他所節制的革命軍隊之發展，都一天一天明白表現了。黨指導全無產階級，農民羣衆也歸向他。他的組織，如同他的影響，他的活動以及他的幹部之強固都擴大了。於是為達到實現他的口號以及聯合千百萬人於他的旗幟下之口號之時機問題，已經擺在黨的前面了。

九十月間，列寧堅決地提出暴動問題在黨的前面。一九一七年十月七日，他在他的論文——時機成熟了——中說過：『俄國革命之前途正在發展，國際工人的革命及爲政權鬥爭之前途也正在發展，危機成熟了。』無產階級的軍隊之集合於黨之周圍，農民及臨時政府之公開的鬥爭，以及多數黨的勢力與組織之擴大，列寧由此看出危機成熟之象徵。當時臨時政府的勢力已經瓦解，而他的社會本質更加暴露了。列寧在同一的論文中說明黨已預備爲暴動所需要之要素。他已有無產階級的羣衆，又有革命的農民羣衆。他已有進步的組織，他的活動達到頂點；當時敵人的勢力已經瓦解。千百萬無產階級與農民，如同小資產階級與一羣遲疑分子都脫離了臨時政府，並且，當他們還沒有歸服無產階級的時候，給政府構成許多困難，破壞資產階級的組織。革命勢力的發展，顯然提出了暴動問題，同時指示時機已經到了。不僅在俄國危機已經成熟，而所有的國際狀況都證明到了革命之行動時期。革命的力

量在其他交戰的國家也同樣地擴大了。俄國資產階級因爲他的混亂與衰敗，已經在德國資產階級中尋找他的聯盟者，以便共同努力消滅革命。世界危機之解決在於俄國危機之解決。

但是在黨還沒有充分證明危機成熟之時機。這種證明有了，暴動問題現在已經明白并實行提出來了，必須達到暴動之具體的準備，必須證明對於暴動的態度是怎樣。當列寧肯定危機已經成熟的時候，他已起草并證明暴動之根本原則。九月以來，他寫信給斯蜜爾加(Smirnina)說：『現在的歷史由軍事問題變成緊要的政治問題了』。在這封信中，如同其他幾封信一樣，列寧說明并發揮多數派對於暴動問題之態度，以及在俄國所處的條件中可能而且應當適應之具體的計畫。

列寧說：多數派的暴動顯然與布郎吉派的陰謀與反亂不同。暴動是一種藝術。主要的規則之一，首先必須好好選擇爲適於戰鬥之社會力量——階級——之布置所

決定的時期。列寧說，暴動不應當建立在一種陰謀或一個黨之上，但是建立在前進的階級之上。他應當以平民之革命的亢進為基礎。他應當組織并發展於大多數平民參加之時。末了，他應當產生於革命轉變之時，以至於羣衆的組織達到極點，他們的活動是很磅礴的，而革命之敵人與曖昧的朋友之組織之活動却是挫抑的。列寧還說，暴動『應當產生於高漲的革命歷史中之轉變時期，以至於平民的前進分子之活動到了極點，無產階級之曖昧的，軟弱而不堅決的朋友之遲疑也達到極點』。他又說，馬克思教訓我們，暴動是一種藝術，并且不能玩弄暴動。選擇了時期，并且這是革命力量的奮發之時期，勇猛前進。人們不能玩弄暴動，應當知道暴動已經開始，如要制勝，必須進行到底。

十月初間，全無產階級都歸向於多數派，并承認為政權而暴動與鬥爭之必要。有多數勞動者，農民跟隨着無產階級。這些羣衆圍集於黨的鐵軍之周圍，因為他很

了解他們的需要與目的。據多數派與列寧的意見，已有實行準備戰鬥之可能。列寧在他的信中分析由九月尾到十月初之社會狀況，指出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中才能適用暴動之藝術，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所寫之一個旁觀者的意見中(Des Cosmels d'un spectent)顯然舉出了那些條件：「預先指定堅決的攻擊之點，及時并於緊要之點，佈置顯然勝過敵人之力量；準備并組織這些力量。努力襲取敵人。努力而堅決地取得仍屬少許範圍之成功。用大的氣力去活動，儘力達到反攻。暴動既經開始；則應果決活動，絕對地進行反攻。保守是宣布暴動之死刑」。列寧提出暴動的具體計畫之時，他囑令集中最大的力量於彼得格拉，因此并召集克隆斯達德(Constat)與黑法爾(Réal)之革命黨人到那裏去。努力由內應外和，抓住彼得格拉。「無論如何損失，用全力佔據電話，電報。車站，橋樑，總之都城之一切戰略上的重要地點，包圍敵人的中心，保留他在這些中心，圍攻軍事學校等等」。列寧說過，必須組織我們

的突擊軍之最勇敢的分分子，最好的海軍以及各種小支隊，以備佔據一切重要的地點與參加一切殊死戰。組織精銳工人的分隊以包圍并攻擊敵人的中心，軍事學校，電報與電話，并給他們一直到最後的犧牲而不放過敵人之口號。列寧說：「俄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之成功關係於兩三天」。

因此，在九月與十月初間，多數派不只是分析革命力量的情形，同時并建立暴動之理論與實際的計畫。勇敢，更勇敢，而且常常勇敢！那末，爲制勝起見，必須對於時勢有明確的分析。如列寧在勝利不久之後就說過，暴動力量之非常擴大以及騷動之成功，不僅說明多數派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之組織工作之成功，對於戰鬥之很好的預備，時期之很好的選擇以及行動之有力，而且可以說明在俄國一切特殊條件之實現。十月暴動使帝國主義的戰爭停止之後得以奪取政權。他利用了帝國主義的海盜之決鬥，因爲這些海盜不知道并不能够馬上聯合起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因

爲地面的廣漠，使蘇維埃政權支持一種長期的內戰。農民一旦得到滿足資產階級的民主的與革命的深切願望，於是固結不解地鞏固了無產階級與農民之聯盟。實在只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才能滿足農民羣衆之資產階級的民主的要求。這些條件給俄國十月革命以便宜，完成革命的力量，保證革命的穩定，并引導千百萬無產階級與農民得以達到爲黨所正確選擇之時機。黨的組織之鞏固與統一，他在行動中之剛強與果斷，這都是無產階級的黨給羣衆以便利之主要的因子。

總而言之，黨應當對於革命的形勢有一種正確的估量，應當建立組織以表示并溝通積聚的革命力量，并建立暴動之指揮與執行的機關。

黨內激烈地討論過暴動問題。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多數派）中央委員會，專爲這個問題開過一次會。列寧（Lenine），齊諾維也夫（Zinoviev），加麥業夫（Kamenev），托洛斯基（Trotsky），斯達林（Staline），斯日德洛夫（Bverd-

lov)，烏里次基 (Ouritsky)，澤爾申斯基 (Dzerjinsky)，郭隆泰 (Kollontai)，布普諾夫 (Bubnov)，索哥爾尼各夫 (Sokolnikov)，洛莫夫 (Lomov) 都出席這次會。議事日程中寫有四個問題，由列寧(記錄上削了他的名字)做了一個關於現狀的報告。列寧證明『自九月初間以來，對於暴動沒有不同之觀察。所不允許無差別的，即是我們嚴格規定由蘇維埃奪取政權之時間問題。很久以來，我們即注意於問題之技術方面。我們似乎失掉許多時機；然而問題是很迫切的，決定的時機到了。國際狀況是如此，我們應當進取了。因為已經計劃向納爾窪 (Nava) 與彼得格拉退却，使我們不得不有一種堅決的行動。政治狀況給我們證明如此。六月三日至五日，我們黨的堅決的行動沒有結果，因為羣衆沒有隨從我們。自是以後，我們有了成就。如此可以說明羣衆之分心與冷淡；羣衆只有些決議與言論。多數是隨從我們的。在政治觀點說，為轉移政權之形勢完全成熟了。土地運動也是如此，要制止這種運動，顯

然須要很大的努力。奪取土地已經變成農民之口號。那末形勢是有利於我們的。必須審察形勢之技術方面。那都够了。那末，如保護國家的老手一般，我們也視暴動之系統的準備爲一種政治的惡習。等待憲法會議是錯誤的，顯然他不會贊成我們；這却增加我們的工作。列寧站在國際運動與俄國運動兩重觀念之上，用完全實際的方法提出問題。在幾次討論之後，中央委員會採取下面的決議：

「中央委員會證明俄國革命之國際狀況（德國海軍的反抗極力表現全歐洲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之擴大，帝國主義者中間爲消滅俄國革命加於和平之威迫），軍事狀況（資產階級與克隆斯基及其同調者決將彼得格拉交給德國），以及無產階級的黨取得蘇維埃的多數，這都是與農民的反抗以及平民對於我們黨之信任（莫斯科）選舉有關係的；末了，第二次哥爾尼洛夫事變之明顯的準備（彼得格拉軍隊出發，調遣哥札克到京都，哥札克包圍明斯克等），這都是把武裝運動放在議事日程中之同樣的

事實。因爲『證明暴動是不可避免的，暴動時機也到了，於是中央委員會勸告黨的一切組織，要了解這種狀況，并從這種觀點去研究并解決一切實際問題（北方蘇維埃大會，調遣彼得格拉駐兵到前敵，在莫斯科與明斯克之行動等等）。』這個決議差兩票即一致通過，實行提出暴動問題在黨的前面。

列寧對於暴動的意見，於十月十日會議時，受了齊諾維也夫與加麥業夫之攻擊。他們不止是干涉中央委員會，而且從事有力的鬥爭反對進行暴動。十月十日，他們寫一封關於『現在的時機的信』給莫斯科與彼得格拉的委員會，芬蘭委員會以及北方蘇維埃與全俄執行委員會之多數派黨團幹事會；這是攻擊黨的政策之勸告。齊諾維也夫與加麥業夫反對列寧的估計與戰略，而提出他們自己的估計，他們自己的戰略與策略。列寧與黨的多數認爲暴動的力量已經預備，并且時機已經來到。齊諾維也夫與加麥業夫則指出這真是太早了。我們深深相信，現在開始暴動，不僅危及我們

黨的命運，而且危及俄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之命運」。列寧認爲條件都成熟了，并且無產階級——總之一切勞動者之絕對多數都贊成暴動。齊諾維也夫與加麥業夫宣言：『這樣那樣的肯定都不是真的。我們沒有多數。我們在俄國有多數工人與兵士。其餘都是成疑問的』。他們以爲沒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支持并完成俄國的暴動，同時并否認在國際無產階級中有充分的援助。據他們的意見，如果說國際無產階級的多數將援助俄國的暴動，那是錯誤的；他們說：『不幸不是如此』。齊諾維也夫與加麥業夫認爲力量不够，時機沒有到，另一方面則以爲臨時政府與資產階級都預備有重大的力量，他們肯定說，主張暴動者輕視臨時政府的力量；『資產階級的力量比外面所表現的力量更大』。在這種條件之下把暴動放在議事日程中，照他們的意見，這是陷入在深沈的錯誤之中。『這樣提出無產階級的力量奪取政權之問題，在現在或永遠，從歷史上看都是錯誤的』。然而齊諾維也夫與加麥業夫宣言，得到政權的希

望擺在黨的前面。蘇維埃第二次大會行將開會，可以集合一切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的份子，一切的組織於他之周圍。黨在羣衆中的工作，要組織一切力量并揭露敵人背叛革命之政策。無產階級的力量日見擴大并且組織起來，他可以取得政權。他們說：『但是在這個時候行動，這是要受緊結隊伍并跟有小資產階級羣衆之資產階級之害的。當這個時候提出暴動問題，這是繼續一種不幸的政策』。黨的各組織得到齊諾維也夫與加麥業夫的信，都沒有入信服。齊諾維也夫與加麥業夫在彼得格拉負責分子大會發言，繼續反對暴動之強硬的鬥爭；他們想在這次會上教人贊成他們自己的決議，反對中央委員會的決議。

在彼得格拉活動分子大會以及彼得格拉與莫斯科的委員會會議時，都討論過暴動問題，大家考察許多使行動得到良好結果之方法。在李斯諾爾(Lesnoe)市議會集合之彼得格拉負責分子大會時，列寧以報告者的名義發言。齊諾維也夫與加麥業夫

都給他答辯。接着又做報告。波德活斯基(Подвоиский)報告彼得格拉委員會之軍事組織。據世立亞普尼哥夫(Чилипников)關於這次集會之敘述，波德活斯基「表示彼得格拉駐兵之精神狀態，顯然是贊成暴動的」。世立亞普尼哥夫自己與加列寧(Калинне)都報告過工人的精神狀態。一切討論都集中在暴動之實際的可能，世立亞普尼哥夫說：『但是希望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批評暴動的方法』。列寧回答這些呼聲，即說明馬克思視暴動如一種藝術之意見，并且援引適當的例子，而否認布郎吉主義(Lé Blancisme)之誹謗。世立亞普尼哥夫說：『我不記得已經通過的決議或決定，但是他是融會列寧提議的精神，稱贊中央委員會的態度并為最大多數所贊成的』(見無產階級革命第一〇號一三，一四及一五頁)。

嗣後按照中央委員會決議所研究的暴動問題，在十月十日彼得格拉委員會上討論。將通告報告之後，有幾位同志加入了。愛夫多啓莫夫(Евдокимов)的演說更

是有心，他說：『假設我們現在不行動，那末我們就葬送了革命的使命。無論人們怎樣說，行動是不可避免的：羣衆的精神狀態或者明天就改變了，但是羣衆在這個時候是不滿足的，因為革命還沒有給他們一點東西。他們還不會搖動』因為只有七月三日至五日之攻擊，才會使他們屈服於資產階級。羣衆能够發展如此偉大的活動，以致任何組織不能抑制他。一切都應以準備暴動的觀點來觀察』（見一九二二年紅色年鑑二至三號三三〇頁）。這種演說要注意，因為他敘述羣衆的威權，并證明黨內之優越的精神。中央委員會與彼得格拉委員會之代表達到郊外與前敵；因為要準備各省的與軍事的組織以實行中央委員會的決定。

莫斯科地方幹事會當其在中央委員會之代表——洛莫夫(Ломов)與奢各夫勒法(Zacovleva)回來之時，即舉行集會。他決定召集各地方委員會之代表會議。以便同他們討論在各省宣布開始暴動及報告游街時間之方法。幹事會派了幾個同志到各

地方：他們應當估量準備的力量。於是暴動問題由理論範圍達到實行之範圍了。

暴動已經預備。工人與農民之自發的運動進到組織的軌道了，自發與組織之聯合，即是十月革命的特徵之一。無產階級與農民構成基本的力量，黨即供獻預定的計劃之組織與指揮。轉移政權給蘇維埃問題，引起各報紙之熱烈的討論。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極力指示由蘇維埃奪取政權之一切企圖預先受了處罰。少數派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工人報說，自從多數派企圖暴動以來，你們看，人民奮激，在最初的計劃中，即可窺察一切反革命的力量：被犧牲的俄國已處於混亂的無政府的內亂空氣中，並為在彼得格拉的門口之敵人所迫，將倒在已來到的拿破侖第(Le Premier Banoparte)，米銀(Minine)他與王子波奢爾斯基(Pojarsky)於一六二二年在莫斯科解放波蘭人。他們是一個大的『民族解放社』之首領)或為新俄羅斯報(Novaja Rossia)所宣布之波奢爾斯基之懷抱中。這是列寧的黨徒所願意的嗎？(見一九一七年十月

八日工人報一八一號)。

轉移政權給蘇維埃問題，同是工人與兵士中熱烈討論之資料。至於臨時政府，在京都與在各省一樣，他已準備抵抗。他命令各地方官廳採取有力的手段。內務總長尼吉丁(Nikitine)當十月最緊急的時期，發了一個通令給各地方委員會，他說：『鞏固政權在於依靠各地方的自治衙門，并鼓勵他們去反對無政府狀態。政府應當在人民面前保持威權。假設爲當地狀況所允許，你們可以組織反對無政府的行動委員會，由各市區與各省的代表，駐軍首領以及司法衙門的代表組織而成。採取緊急的手段以組織民軍，并編入可靠的分子在民軍中，同時停止他們的服役時間，或依照陸軍總長給軍事區域的司令之命令，給以特別的假期』。

按照這種通令，各省着手組織特別大隊。在下諾夫哥羅德(Nijni-Novgorod)，軍事衙門發了許多武器給按照尼吉丁訓令所組織之委員會。到處爲抵抗暴動，編

制自衛并壓迫之組織，都有些討論。下諾夫哥羅德交易所指定一〇・〇〇〇盧布購買武器；在最可靠的聯隊中之宣傳很是活動；教他們贊成對臨時政府之信任案。舉一個例子來說：十月二十日左右，在下諾夫哥羅德學校大隊的官兵全體大會通過一個決議案，痛罵一切反對臨時政府的運動；到會的人都宣言準備反對任何擾亂之鬥爭中，使用一切的方法以保護臨時政府（見下諾夫哥羅得革命運動史參攷材料三卷七五頁）。

彼得格拉有同樣的準備，但是規模更大些。臨時政府企圖解除彼得格拉與克隆斯達德的駐軍之武裝，并調遣一部分到前敵去，另一方面，他由前敵調回一批可靠的聯隊，以使用他反對偶然的暴動。克隆斯基說：政府預備消滅騷亂，但是不依賴完全為哥爾尼洛夫事變所敗壞之彼得格拉的駐軍而找着了別的行動方法。我已發出命令趕急調遣前敵的軍隊到彼德斯堡（Petersobury），并且第一梯隊應當在十月二十

四從北方前敵到京城』（見克隆斯基：加奇納（Gatchina）第二頁）。

那末，調遣彼得格拉駐軍的聯隊到前敵是一種政治的，戰略的手段；前敵不甚需要增加力量，可以從那裏調動軍隊。這是簡單地以別的忠順於政府的聯隊代替革命的聯隊。照克隆斯基的意思，同時政府命令彼得格拉軍事區域的司令波爾各夫尼哥夫（Polkovnikor）聯隊預備鎮壓暴動的計畫。政府再不疏忽武裝民軍及整理警察的工作。工人報說，『昨天（十月十九日）着手武裝民軍；分配手鎗給他；其中有六百曾經試驗盡忠於臨時政府的兵士』（見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九日工人報一九〇號）。彼得格拉市議會，於十月二十日左右，研究當暴動時所採取之方法。軍隊之各高級組織以他們的忠信保障政府，并給他以武力的幫助。臨時政府老實準備與多數派開仗了。

政府所取的手段很明白地表示他感覺不安全，并且惟有反對工農的分子保護政

府。各市議會想組織抵抗，彼得格拉與各省一樣，這是要地方交易所即資產階級的經費。聯隊與治安特別大隊都屬於特權階級。表示準備維持政府之軍隊組織與他們的委任人沒有靈敏的聯絡，并且很久沒有改造過。他們再不能代表他們的委任人之意見。

在所謂可以保護政府的人——即大資產階級與一些過渡階級的分子中既沒有一致又沒有深刻的調和。大資產階級繼續追隨哥爾尼洛夫之後反對臨時政府，假設他準備與工農開戰，這不一定是保護克羅斯基之不隱定的政權。當十月最緊急的時候，反動的報紙新俄羅斯說：「俄羅斯駕着揚帆的船走向安全的道路，他將經過一切艱難險阻。當光明的日子在莫斯科建設第二個政府；真正的俄國人都集合在那裏，人民自己組織中心，因為彼得格拉的政府，昏迷的政府——克羅斯基政府顯然不能成爲中心了。莫斯科將要請求哥爾尼洛夫并且你們把莫斯科還給他；莫謀害俄羅斯

！』據克隆斯基說；反動派想讓多數派推翻臨時政府，以後不能克服這種暴動的平民了。担任決定抵抗彼得格拉多數派暴動計劃之波爾各夫尼哥夫聯隊長玩有兩重的把戲，但是克隆斯基在最後的時期雖已覺悟到這一層，然而臨時政府不能在首都集合很多的力量以維持政權。

第六章

十月革命的緊急形勢之鬥爭：彼得格拉駐軍之防禦，蘇維埃第二次大會之開幕。十月：革命軍

事委員會之活動；與臨時政府之鬥爭，彼得格拉暴動。

在十月間，大家看得很明白，暴動時期已經到了。臨時政府估計暴動的準備一天一天成熟，於是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的幫助，熱烈地準備抵抗。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企圖善用蘇維埃的合法以反對暴動。假設因奪取武裝牽連到蘇維埃第二次大會，他們則用蘇維埃與他們的黨之正式機關來反對第二次大會之同一的觀念。他們提出憲法會議來反對蘇維埃大會。他們說，在憲法會議之前夜，大會是多餘的。這種鬥爭的目的是想在憲法會議保護之下遲延第二次大會并減少他的力量。在俄國惟有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兩黨之中央組織歡迎這種政策。所有蘇維埃的中央機關，前

敵蘇維埃以及各地蘇維埃，很久以來都沒有改選并且仍在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之手；他們都維持這種政策，這也是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的政策。

由第一次大會選舉的委會之多數只能依靠前敵組織各組的指導者。在贊成或反對召集等二次大會之鬥爭中，明白表現了各種勢力的比較。

各工人中心之蘇維埃：伊凡諾活—活次尼三斯克 (Ivanovo-Voznessensk) · 魯岡斯克 (Lougansk) · 首烏 (Chouy) · 基輔 (Kiev) · 阿木斯克 (Omsk) · 付拉的米爾 (Vladimir) · 巴爾腦爾 (Barnoul) 等處以及軍隊的下層組織都表示同樣的意見，贊成由蘇維埃奪取政權；軍隊的中央機關則持反對的意見。西方前敵與高加索前敵之執行委員會，第十一軍的軍委員會都採取同一的態度。很有趣味的，當通過反對第二次大會之決案時，這些不同的組織同時都表現完全離開了羣衆，再沒有表示是指導羣衆之政治團體之志願，希望與傾向。例如第十一軍委員會宣言，「認爲要好好代

表軍隊，必須着手改選他所有的機關。但是這破壞憲法會議之選舉。并且軍事委員會認定在憲法會議選舉終止之前舉行蘇維埃大會爲不當，依賴軍團委員會去解決問題（見一九一七年中央執行委員會新聞一四九號）。這種宣言無意中都吐露了軍隊中心組織的干涉之真實程度。軍團委員會決不能完全代表軍隊的中心組織并且顯然是依賴這中心組織的。軍隊的中心組織與軍隊間之聯繫已經破裂。但是軍隊的中心組織再沒有說明軍隊——即工人與從軍的農民——的意見，他想以他自己的意見強迫他們。第十二軍士兵代表蘇維埃在他的決議中寫着：想在憲法會議之前召集蘇維埃大會之意義，只是在篡奪憲法會議之權力與權利，由此以篡奪全體人民之權力與權力。這種篡奪憲法會議的權力與權利之企圖足以破壞蘇維埃——將來還有無限作用之革命中心——之信任（見一九一七年中央執委會新聞一四九頁）。如此顯然可以看出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反對召集蘇維埃第二次大會之理由。

多數派勢力之擴大以及他們管理蘇維埃與軍事的組織，沒有人不知道的；第二次大會的組織應當是多數派占絕對的多數，已經是很明顯的事實。希望主張蘇維埃政權者在第二次大會得到大多數。所以少數派與社會黨極力阻止召集第二次大會。蘇維埃的組織反映。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之精神狀態，於是由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方面趣向於多數派，並不贊成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的態度。這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同多數派一致之證明。工農羣衆都已明白了解轉移政權給蘇維埃之必要，再不能用幾個口號可以使他們改變這種觀念的。

爲召集蘇維埃第二次大會，如使我們的黨在這次會取得多數并指揮北方全區運動之鬥爭，使多數派在彼得格拉組織北方蘇維埃大會，以便統一組織全區的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建立一種準備第二次大會集會的基礎。北方大會完全站在我們黨的旗幟之下，同時在七月十二日的決議中宣布，「只有轉移政權給革命的組織——即工

兵農代表蘇維埃——才能够救濟平民，在各中心與在各省一樣。」再者十月十三日區大會一致通過一個決議，想「組織北方區委員會以保證全俄蘇維埃第二次大會之集會并整頓一切區蘇維埃之活動」。主張第二次大會者在那次會得到一種真正的援助。這種援助在他們是必要的，因為很知道我們的策略而反對地方委員會之全俄蘇維埃第一次執行委員否認地方委員會的權利并反對召集全俄大會。十月二十日全俄執行委員會軍事部討論這個問題，宣布反對大會。由彼得格拉到各省都發生爭論，到處可以鼓動一般人的感情，并指示各種力量與無產階級及農民多數之關係。

臨時政府因為準備平服猛烈的革命，想集合忠順於他之軍隊，隨地組織各種人民保衛隊，處於各市議會及其他資產階級組織的保護之下，組織許多特別隊并建立精粹的民軍，武裝起來，同時并徵募志願兵。他在彼得格拉已經集合許多軍事組織，他依賴這些組織可以反對蘇維埃。同時臨時政府想使他的武裝力量脫離革命，於

是解除彼得格拉與克隆斯達德的駐軍之武裝，并調遣一部分到前敵去。這是給革命奪去一些最好的力量。徹赫米索夫（Tcheremissov）將軍要求調遣彼得格拉駐軍到前敵去。這種要求與解除克隆斯達德砲台的武裝之預備，都是向彼得格拉蘇維埃及其後面之駐軍表示：與其說是鞏固前敵，寧肯說是利用國家保護的幻想以反對革命。彼得格拉引起了衝突。多數派所指導的蘇維埃為蘇維埃駐軍在彼得格拉而從事一種有力的鬥爭。因為回答臨時政府更調駐軍受反革命將軍們命令之要求，於是彼得格拉蘇維埃決定設立一個機關，以使用軍事的觀點，審查為調遣軍隊到前敵所援引之理由。這些理由都是合乎政策與戰略嗎？因此設立一個參謀部：彼得格拉駐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蘇維埃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全體會議時批准他的組織。從此以後，革命軍事委員會即參加為彼得格拉駐軍，為京都的革命力量之鬥爭，以及組織他們於蘇維埃的周圍之鬥爭。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十月暴動的計劃并指導執行這個計

劃。爲調遣駐軍到前敵的問題產生了革命軍事委員會，同時也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派一個代表團到徹赫米索夫將軍的參謀部，以便報告調遣軍隊到前敵之必要與否。代表團達到普斯哥夫(РСКОВ)，他們與司令官討論；無論軍事技術家給代表團之論據如何，代表團仍是固守不動，并且非常明白調遣軍隊到前敵之真正目的。

革命軍事委員會爲保持軍隊在彼得格拉，應有一種有力的行動，以便領導這些軍隊而團結於他的周圍。臨時政府想攻擊革命軍事委員會，但是兵士羣衆不聽從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的命令。革命軍事委員會以鞏固他與首都軍隊之聯絡爲他的主要目的。他在各軍事單位中指定有委員。十月二十一日他召集駐軍聯隊委員會開非常會議，有托洛斯基出席演說。在托洛斯基演說之後，通過十一個決議案，贊成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織，在一切行動中一律給以幫助，并且希望在革命利益中更密切聯絡前敵與後防。

革命軍事委員會爲保證他與駐軍之聯絡，曾於十月二十二日發命令給各軍隊，只有經過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副署，才能執行要塞參謀部的命令。同時革命軍事委員會指定三個同志，用委員的名義，担任監督要塞參謀部的行動。這些委員都備有委任狀，凡屬參謀部的命令應該由他們中之一人副署才行。要塞軍隊的司令——波洛各夫尼哥夫聯隊長招待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代表，聽到他們的宣言，即明顯地拒絕與他們合作，并且申明『不承認任何委員，并不需要任何監視』。革命軍事委員會答復他，駐軍以後服從命令與否已成疑問，這位司令却保證說，『駐軍已在掌握，有必要時即可以指揮他』。因此談判即終止了。那末，革命軍事委員會應當採取他們的方法。他的代表回到斯莫爾尼(Smolny)，在那裏開了一次大會議，有斯曰德洛夫(Sverdlov)參加，當時決定將情形通知在軍隊中之黨的組織，并且向各軍隊證實只有由革命軍事委員會副署才能執行命令之決定。十月二十三日彼得格拉蘇維埃重新

召集各聯隊代表到斯莫爾尼。革命軍事委員會與參謀部談判之經過與結果都通知給他們。會議全體都贊成革命軍事委員會并承認給他無條件的援助。通過的決議宣布，駐軍應當視革命軍事委員會爲他的指導機關。參謀部拒絕服從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要求，即可視爲仍在臨時政府手裏之司令與革命的駐軍之間之破裂。在這個動議中顯然說過：「十月二十二日晚要塞參謀部拒絕承認革命軍事委員以及與蘇維埃軍事部代表合作。於是參謀部與革命的駐軍及工兵代表蘇維埃決裂而變成一種反革命的工兵工具。至於要塞參謀的行動，革命軍事委員會不承認一切的責任。彼得格拉的兵士爲維持受了反革命的防害之革命的命令，使你們歸屬於革命軍，委員會指揮之下。沒有革命軍事委員會簽字之任何命令都不執行的」。那末參謀部，駐軍與革命軍事委員會之間完全決裂了，隊伍都團結於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周圍。革命軍事委員會——時勢的主人——宣布參謀部爲反革命之工具。這是暴動之開始，是鬥爭之開始。

。同時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了暴動的計畫。

薩多夫斯基(Sadovsky)曾在他的回憶錄敘述下面的事情：『十月二十三與二十四日革命軍事委員會指定一個三位委員的委員會以指導攻擊冬宮(Le Palais d'Hiver)之軍事動作。這個委員會由波德活斯基(Podvolsky)，朱德諾夫斯基(Tchoudnovsky)，及安德諾夫—阿夫三哥(Antonov Ovsénko)三個同志組織而成，他們勉力布置工作。我記得最近委員會於十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的晚間在我家裏十號房子開過一次會議。在一個小小的地方展開一張大地圖。安德諾夫坐在床上，波德活斯基與朱德諾夫斯基激烈地爭論攻擊冬宮，皮爾(Pierre)—保羅(Paul)砲台對於我們之重要以及使用之戰略；他們指定我們在陸地與海上的兵力之位置，這些兵力在內窪(Néva)附近』（見無產階級革命第一〇號七七頁）。

決定行動計劃的時候，必須占領武裝。工人缺乏武器。最大的軍械庫之一即在

皮爾——保羅砲台，並且這兩個砲台可以控制冬宮。奪取砲台可以供給武器，並可以保證暴動的成功。砲台駐軍是不堅決的。安德諾夫——阿夫三哥說，托洛斯基在這個時候有重大的作用；革命的直覺使他抓住內部的砲台」。他說，「軍隊不同情我們是不可能的」。托洛斯基與拉舍維治 (Lachévitch) 達到砲台，在那裏大會中演說，并教他們通過一個決議，贊成轉移政權給蘇維埃。砲台的軍隊械庫給一萬枝槍以武裝威波爾 (Vybor) 地方之赤衛軍 (見無產革命第一〇號一二六頁)。

我們說過，臨時政府也準備了鬥爭。因為不能調遣彼得格拉與克隆斯達德之駐軍到前敵去，於是他從前敵調回一批可靠的聯隊。十月二十四日調回札爾斯哥若塞羅——伯德哥夫下級軍官學校——突擊大隊與巴夫洛夫斯基 (Pavlovsky) 砲兵大隊。革命軍事委員會為答復這些手段，發布如次的命令：「各聯隊委員會，駐軍各委員——彼得格拉工兵代表蘇維埃正在危險中。反革命的陰謀家想在今晚召集市都之士官

學生 (Les Junkers) 與突擊大隊。兵士 (Le Soldat) 與工人之聲 (La Voix ouvrière)，都停止了。你們準備行動。凡屬遲延執行這個命令，拒絕服從命令者，即認為對於革命之反叛」。這個命令是十月二十四日晚發表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派遣小隊到重新出版的兩報印刷局。當時臨時政府想截斷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電話交通；因此革命軍事委員會不得不佔據電話中央局。——在二十五日晚間，凡屬橋梁，車站，中央郵政局，電報以及國家銀行都歸於革命軍事委員會之手。於是臨時政府即葬終於冬宮了。所有政府的機關都沒有戰事被佔領了。有一個同志敘述佔領電報局的情形如此說：「下午兩點鐘左右，當我着手登記為出席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接踵而來之多數派黨團的代表時，澤爾申斯基跑來了。他拿着一張紙在手裏。——他對我說，有命令給你，教你與勒昌斯基 (Letchinsky) 占據電報。這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任狀，指定你做中央電站的委員。即刻到那裏去」。——我就問，怎樣佔據電報局呢？——克客斯

各爾姆斯基(Кексгольмский)的聯隊在那裏守衛，他是贊成我們的……。「我去找勒昌斯基，并且我們動身了。我們兩個都還有手槍。實在聯隊即在中央電站幫助我們，并且一切都說過了」(見無產階級革命第十號九五頁)。

在十月二十五日早晨：革命軍事委員會由占領的電報局發一個通知給一切民衆，向全國宣布臨時政府之崩潰以及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取得政權。下而即是公文的發端：『俄羅斯民衆們！臨時政府推翻了。政府的權力已經交給革命軍事委員會，即領導無產階級與駐軍之彼德格拉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機關。平民爲這些利益——即刻提議民主的和平，廢除土地所有權：工人管理生產，組織蘇維埃政府——而鬥爭，現在已有保證了。工人，兵士與農民革命萬歲！』

在二十五日，大約有二千水兵由克羅斯達德來援助彼得格拉。實在。在彼得格拉差不多沒有戰爭即取得政權。只是在冬宮周圍交戰，因爲臨時政府以士官學生與

女子大隊的保護逃避在那裏。由溯內窪而上之曙光(L'Aurore)巡洋艦向白黨放幾砲即結束了國務員的抵抗。當克拉斯諾夫(Krasnov)將軍與他的哥札克兵出現於彼得格拉，以及軍官學校也在那裏反亂之時，却是一個格外嚴重鬥爭的時期到了。

在此說明事變之幾個特點：主張蘇維埃政權者之有組織的行動，嚴格的紀律，黨之指導作用，是有意義的。事變都是照預定的計劃而發展。黨已組織并指導鬥爭；有組織赤衛軍之工人羣衆隨從着他。赤衛軍在運動中具有指導的作用，兵士羣衆都隨從他。

彼得格拉無產階級羣衆之行動爲十月事變最特色之點，爲革命之敵人與朋友所同樣注意的。社會革命黨的參謀長——克拉哥維次基(Kravovetsky)曾經如此敘述他在城的中心——工程師別墅所看見的情形：「街市充滿一羣着黑衣的羣衆。很使我懷疑：這不是兵士，這是急忙召集的赤衛軍，一種完全不熟練的赤衛軍，我看見

他們左邊荷着槍，并且拙劣地出發攻擊冬宮。這是一羣急忙集合，瞬息動員而穿着破舊的冬服之工人……一羣純粹的工人……從各工廠與製造所來的，就是所謂無產階級……」（見波德活依斯基(M. Podvoisky)：假稱社會革命黨人訴訟之結果一九頁）。

彼得格拉的無產階級乃革命之指導者，他完全獻身在鬥爭中。主要的力量與黨之有組織的力量混合起來。無產階級同他保持組織關係并勾通他與兵士之絡聯，而實現無產階級及以他為領導者之農民——小資產階級——之聯合。在彼得格拉指揮作戰之波德活依斯基曾經敘述工人在兵士中所具有的組織作用。無產階級明白他所做的事以及為甚麼要戰鬥。他是堅忍剛毅而充分沈着的。波德活依斯基說，「赤衛軍勤謹地注意他的職守，由糶糊不定漸漸進步到寧靜果敢，而在巡邏中即表現非常審慎周詳。我們重要的聯隊長之集中的注意與審慎周詳都表現在大家的目前。他們的巡邏在注意反革命者不能與兵士接觸」（見無產階級革命第一〇號七八頁）。那末

彼得格拉十月革命，乃無產階級以及隨從他之小資產階級羣衆之工作。無產階級服從多數黨之指揮。就是黨在羣衆自發的運動中給以指揮與組織。

無產階級在鬥爭中發展，鞏固并組織起來。他們是有團結力并同心合意的。在臨時政府的保護者中却是遠不相同。他們都缺乏勇氣，一致與團結。有些士官學生，下級軍官，高級軍官，突擊隊，總之凡屬資產階級的分子都想保護臨時政府。當準備暴動期間，政府本已預備抵抗，但是畢竟未能解除彼得格拉與克羅斯德之武裝；爲調遣幾聯隊到前敵又遇着革命軍事委員會之抵抗，他以反攻回答攻擊。

在政府中沒有一致。蘇維埃全體執行委員會與臨時國會於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召集會議。少數派的丹(Dan)曾於全俄執行委員會預言無產階級革命之失敗。『多數派將不能履行他們告訴羣衆之預約：給他們以麵包，和平與自由。他們一旦取得政

權則他們所誘惑的羣衆就會推翻他們……」（見一九一七年新聞報二〇七號）。

少數派的加三德（Cassandres）以這種預言處罰臨時政府，因為他們當戰爭的時候不給臨時政府以幫助。全俄執行委員會宣言國家破產，政府不決堅的政策（適用緊急方法之遲緩）——如臨時國會的決議中所說的，——這都是給革命以便宜。（由民主會議所產生的臨時國會即資產階級的代表機關，他沒有確定的法律，而是用以維持克隆斯基政府并鞏固俄國占有階級的權力）。如此處罰了臨時政府，所以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與預備議會都勸告他採取各種的手段，特別是將土地交給農民之地方委員會。因此可以證明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簡直不明白革命之根本原因。在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看來，一切都是臨時政府之遲疑與迂緩；他們幻想醫治這些毛病，使小資產階級，農民都脫離無產階級。他們錯了；他們的決議更削弱臨時政府，不那樣更屬不幸。承認幫助臨時政府之哥扎克兵過了一整晚還是牢牢繫着馬而

沒有援助，畢竟分散了；據克隆斯基說，只剩一些極右派的人在參謀部，預備去參加推翻政府，以便後來占到一個空間的位置。政府只有發布告給國人而等待成疑問的援助；倘若救援不到，則可以預見他的拘留之時間……。十月二十五日臨時政府號召人民『保護祖國，民主政體與自由』，并頒布參議院的敕令任命在國會代表莫斯科資產階級之吉世金(M. Kichine)爲彼得格拉的專政者。形式的任命，在階級鬥爭進到激烈的變象之時，爲小資產階級所拋棄而屈服於無產階級攻擊之下的政府失掉其民主精神之最後的渣滓，而以資產階級的獨裁反對無產階級之新生的獨裁。而且資產階級的獨裁只是宣布幾篇演講，實際上是等待無產階級去驅逐他。在冬宮等待援助之政府並沒有安排任何的力量。他們少數的保護者都已投降，宣布中立，列隊以待了。他的總理克隆斯基，在美國旗幟保護之下，從彼得格拉逃跑以尋求援助。他沒有找到一點援助。於是再不需要克隆斯基政府了。

惟有格拉斯諾夫與他的哥札克兵響應政府的號召。但是必須說明，一般兵士與哥札克的態度已經充分證明他們彼此之社會的根原。兵士與哥札克都拒絕爲克隆斯基政府打仗。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哥次（Gon）與菲特（Fert）由彼得格拉跑去援助克隆斯基，爲要幫他團結軍隊，但是兵士到處拒絕反對首都的工人，反之，他們與工人聯合起來了。嗣後菲特即宣言責難社會革命黨（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中央委員會曾經派我到加奇納，札爾斯各若——塞羅及更遠之波羅的海戰線，負有集合凡能够保護臨時政府的軍隊單位之使命。我應當說，我到處進着與彼得格拉同樣的事情；我會與駐軍委員會接洽，有時與一個聯隊委員會接洽，曾經得到一種保證，說這些或那些大隊都準備動作。但是過了一些時期，當我再來引導這些大隊到加奇納，他們却拒絕前進了」。到處都是一樣。謝米諾夫（Semenov）他是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社會革命黨之前任暴政者及戰鬥團體的組織者（敘述哥次在札爾斯

哥若——塞羅對一聯隊步兵之演說。『社會革命黨的首領——相信是很受優待的——開始很有把握，教人知道他是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的副會長并在舊政府時代做過十年的苦工。但是馬上開始噪鬧，從各方面發出喊聲：够了！够了！——哥次改變了聲調，但是很難結束一篇因間斷而打成紛碎的演說。聯隊之反對臨時政府，并由打斷演說來判斷，更是反對在軍隊中之克隆斯基的政策，這是很明顯的』。（見謝米諾夫：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四月社會革命黨之行動）。

從參加反對十月革命的鬥爭之社會革命黨流露出來的證據是很明顯的，因為他們揭露了從軍的農民工人之精神狀態。凡屬臨時政府想集合兵力的地方，在彼得格拉與各省，前敵與後防，到處都是同樣的精神狀態。兵士不願意為臨時政府打仗以反對蘇維埃之工人與農民。克隆斯基在各區都過着同樣的情形，他曾經教這些地方進行反對彼得格拉呢。他曾經對克拉斯諾夫所指揮而駐在阿斯特羅活（Астро́во）之

軍團的哥札克演說向彼得格拉前進。克拉斯諾夫在他的筆記中說，『有兩次軍隊的高級首領之演說遂粗魯地爲許多喊聲所打斷。大家叫他：『你願意我們浸在我們的血泊中，你想在我們齊膝的血泊中前進罷』。

在這種景況中，被克隆斯基召集之各聯隊已經宣布反對臨時政府并贊成蘇維埃政權，這用不着驚駭的。有一個被克隆斯基由前敵調回之自行車大隊到斯莫爾尼亞求『派代表到他那裏去，給他解釋同前的狀況』。當聽到代表報告之後，這大隊即決定維持蘇維埃第二次大會。再遲幾天，即有一部分自行車隊員參加反對克隆斯基的作戰。

但是不獨是軍隊反對臨時政府。鐵道工人與技術人員大都如此。他們努力用各種方法攻擊臨時政府而使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易於召集。於是爲運送政府的軍隊所必要之車箱與列車都找不着，連公文都不能發。克拉斯諾夫說，組織一列車，照習慣

要一〇——五分鐘，現在要經過一個整小時。必須不疏忽地逼迫一切雇員，時常派車長去考察他們。有一半公文不能達到目的地，同一的哥札克——反動的堡壘——也拒絕援助克隆斯基。因此克隆斯基與社會革命黨不能集合隊伍，教他們進攻彼得格拉。反之，首都的運動有了工人與農民所組成的軍隊中之忠實而熱烈的聯盟者。

但是，克隆斯基曾經叙述不能教軍隊進攻彼得格拉的勞動者，軍官們却願意參加反攻首都之戰爭，畢竟沒有隱藏他們的意見。克隆斯基說，『我們到着加奇納，引起大批軍官的注意，使我們的兵營有一種特別的氣象并使哥札克不暢快，似乎他們聽說軍官們實在太忠於舊制度一樣的』（見克隆斯基：加奇納二一頁）。倘若反革命的軍官們願意攻擊正在彼得格拉所組織的蘇維埃政權，那末究竟他們不承認在克隆斯基旗幟之下交戰。聽克拉斯諾夫說：『某晚，在加奇納，有駐軍軍官代表團來找我——他們告訴我，軍隊不同克隆斯基前進，他不招人愛；他爲難你，你應當磨』

保一切行動的責任，並且阻止他」。那末在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中有勤勉的，從前哥爾尼洛夫所組織的反革命分子。並且很明顯的，反對十月革命之莫斯科的軍官組織有打到頓(Don)附近即退却之計劃，以便在那裏組織反革命的基礎。

臨時政府想集合兵力並為生存而鬥爭已經完全失敗了。勞動者都不援助他，並且來幫助他之資產階級分子時常預備阻止他並為完全恢復大資產階級的獨裁而鬥爭。

第七章

十月革命。蘇維埃第二次大會。

十月革命乃羣衆深切一致的行動。工人與農民幾乎沒有流血即取得了政權。與二月所經過的情形相反，十月間爲多數黨所指導的羣衆按照預先研究的計劃，有組織地行動。每個人都明白他要做的事，明白怎麼樣開始并且是爲甚麼。十月革命已經精密地預備了；可以說多數派一點一點完成了這次革命。工人與農民很久即已明白革命之必要，到完成革命的時候，他們很知道爲甚麼上街游行以及爲甚麼理由而作戰。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小資產階級的）之潮流畢竟匯合起來，給革命以一種非常大的力量。

自十月革命開始以來，他即帶有工人與農民同盟之印象。這是一種無產階級的革命，同時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他應當滿足工人的利益以及農民的利益。

無產階級是十月革命之主要的創造力量。他跟隨着有貧農，貧農也提出了政權問題，并有農民羣衆隨從着他們而希望消滅在農村中之封建殘餘。就他的原動力說，十月革命是一種無產階級的革命，但是小資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是具有重大的作用。就他的內容說，十月革命是一種社會主義的革命，也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與最貧苦的農民所追求的主要目的。社會主義的改革乃十月革命之主要的目的，但是無產階級與貧農爲完成這種工作，也應當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嗣後列寧在一篇十月革命第四週年紀念的論文中曾經說明兩種革命如此連結成爲一種革命，這一種變成那一種，即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變成社會主義的革命。在動力與繼續的目的方面，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是主要的革命，但是爲

要完全成功這種革命則應當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我們附帶地解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問題；這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工作之附帶結果之一」（列寧）。

在俄國革命中資產階級的民主的變化，如同在帝國主義戰爭與社會主義革命時代之變化一般，都是無產階級革命之附帶的結果。這些結果首先就是消滅固定在俄國社會組織中之封建貴族的殘餘。「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民主的內容，就是消滅中世紀遺留下的社會關係，風俗，教育，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列寧）。俄國奴隸制度的殘餘之表現是甚麼？在一九一七年，就是君主政體，土地私有制中之階級制度，婦女之壓制，宗教以及民族之壓迫。這些封建貴族的社會之殘餘，十月革命把他都消除於俄國的組織之紅鐵中。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收獲，沒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則為不可知之事。但是這種收穫不是十月無產階級的革命之主要目的，他的主要目的首先在取得政權。蘇維埃第二次全俄大會所宣布之蘇維埃政權，即明白指出

這一革命擴大成爲另一革命，並且征取政權乃十月征取之優越的事業。列寧說，『蘇維埃的社會是這種變化——由這一革命擴大成爲另一革命——之明證或表現。蘇維埃的社會，保證工人與農民之最高限度的德摸拉西，同時表示與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克拉西斷絕關係，並建立德謨克拉克拉西之新的歷史的模範——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克拉西或無產階級的專政』。

如此：兩種革命，有動力與內容兩方面，但是這一方面只是另一方面之附帶的結果。十月革命之主要目的，就是由城市無產階級與農村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以及最貧的農民之聯合以征取政權。這就是他的力量。但是當俄國尙存有封建貴族的社會遺跡之時，要征取政權則不得不使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團結，組織在起來角逐政權之階級的周圍，第一希望廢除這些遺跡。於是隨從無產階級與貧農之小資產階級與農民羣衆爲消滅封建貴族制度之遺跡，增加了無產階級的力量，幫助他攫取政

權，參加鬥爭，爲他開闢道路。十月革命之兩重內容——由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擴大成爲優越的事業之無產階級的革命——給一切事變以模範，可以決定戰鬥中社會的力量之作用與狀況，並可以決定蘇維埃政府在活動初期之規律，命令與決議。

征取政權乃社會主義革命之主要事業。因爲取得政權，於是無產階級消滅封建貴族的制度之殘餘而聯絡農村之小資產階級羣衆。蘇維埃第二次全俄大會公布一個命令廢除土地私有制——因此可以滿足最廣大的農民羣衆之利益——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並且使千百萬的農民歸附無產階級的專政。惟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廢除階級之私有制。蘇維埃第二次大會頒布和平命令，即刻肯定革命之社會主義的性質且想使世界無產階級都脫離戰爭。因此可以滿足俄國無產階級與農民之最廣泛的要求。十月間兩種革命聯合起來了，並且主要的革命——無產階級的與社會主義的——也能成就小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沒有社會主義的革命，欲肅清俄國封建貴

族的殘餘是不可能的。列寧說過，『我們有權利引我們的工作以自豪。從對於平民羣衆所執行的行動之觀點看，我們肅清國家之『封建殘餘』，比法國大革命更是堅決，迅速，剛毅，深厚而廣大。但是因爲附帶地完成這種工作：十月革命成去了特別偉大的成績。在歷史中之第一次，被剝削的人類以奴隸反對一切主張賣奴制者之革命回答主張賣奴制者之間之戰爭，并且繼續這種鬥爭到底而建立自己的政權——無產階級專政』。

在批准并決定事變之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曾經指明這種革命之性質，在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兩點鐘舉行之彼得格拉士兵代表蘇維埃會議中也是如此。革命的成功是很明顯的。沒有人擁護克隆斯基政府。克隆斯基任命之專政者——吉世金，除開他的任命：一張廢紙以外，沒有其他的力量。工人與兵士是戰勝了。彼得格拉蘇維埃主席——托洛斯基宣布開會并報告蘇維埃。他立即說明革命之特色的工作：無產階級

之組織，堅強，團結以及臨時政府與他的黨徒之瓦解，破壞。托洛斯基說：「當時沒有流血即過去了；我們不知道任何的犧牲。我在歷史中沒有見過任何的革命運動有這多的羣衆參加，並沒有流一點血。克隆斯基的政府已經滅亡，再不等待歷史的掃帚之掃蕩」。列寧繼托洛斯基之後發言。他用明確的詞句說明白事變之意義。『多數派常常認爲必要之工農革命完成了』——『甚麼是他的重要之點？』就是『被壓迫的羣衆自己建立他的政權』。無限的責任擺在他們面前。首先是『即刻的消除戰爭，因爲要停止深切地與資本主義結合之戰爭，必須戰勝資本主義之本身，這是很明顯的』。因此，從他的第一步起，十月革命即變成一種世界的革命，因爲要完成他的主要責任之一。爲和平之鬥爭即刻變成反對交戰的資本帝國主義的組織之鬥爭。十月革命舉起和平的旗幟，同時即舉起反對資本主義的世界之暴動旗幟。他在這種鬥爭中之力量與成功，與世界工人運動相聯絡，他給世界工人運動指示了一條道路。

十月革命對內也有重大的責任。革命由工農之共同努力而完成的，於是使無產階級農村與小資產階級更加結合一致。農民只有靠無產階級才能得到土地。但是農民之資產階級的利益既經滿足，十月革命應當滿足無產階級的要求。他應當在新的基礎之上組織生產，同時廢除土地私有制。列寧說過：『俄國第三次革命終究要達到社會主義之勝利』。一切條件都是很便利的。『在俄國內部有一大部分農民說：同資本主義玩够了，我們同工人前進。廢除土地私有制的命令使我們取得一般農民信仰。他們知道，惟有與工人聯盟才能救濟他們。現在我們學習了共同工作。剛纔成功的革命即是一個證據。我們有組織的羣衆力量，可以戰勝一切，并引導無產階級到世界革命。我們開始在俄國建設一個無產階級的與共產主義的國家。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列寧就是這些話結束他對於剛纔成功之堅決的事變之第一次演說。

列寧明白說明事變之重要，指示將來的責任與道路以及必要的策略。十月革命是俄國的，同時是世界的，他是關係資本主義世界的存在的問題；他爲和平而鬥爭，舉起世界革命的旗幟。他爲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組織而鬥爭，於是使農村小資產階級歸附於他的凱旋之途，引導他們爲征取土地而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戰爭。十月革命之如此的意義，已經在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明白指示出來了。在那次會議即已預備勝利的革命之組織與形式；并且公開地開始鬥爭以反對世界資本主義，贊成勞動者的政權。在世界勞動者歷史中如此著名之俄國勞動階級的大會，差不多沒有留甚麼給我們。他的紀錄都沒有保存；我們只有議事日程的報告。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於十月二十五日晚間十點四十一—四十五分鐘，在斯莫爾尼學院 (L'Institut Smolny) 藝術廳舉行第一次會。多數派黨團舉行一次會議，預備大會之開幕。人們知道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有示威地離開大會之傾向。大會之同一的成分顯然表現千百萬

農民與工人的精神狀態中之深切的改變。第二次大會與第一次相反，第一次大會時，差不多沒有看見多數派，到第二次大會則顯然是多數派的。六二六個代表中，有三八二個多數派還多，多數派的同情者有三一個，社會革命黨左派七〇個，無政府主義者五個，國際統一派一五個，少數派——世界主義者三〇個，保護祖國的少數派二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派一三個，社會革命黨中立派三六個，社會革命黨右派一六個，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黨一三個。少數派丹——舊執行委員會——宣布開會，同時提議選舉書記局。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都拒絕參加書記局，因此書記局僅由共產派與社會革命黨左派組織而成。阿法乃索夫 (Avanessof) 用共產派名義提議選舉下列諸人參加秘書處：列寧，齊諾維也夫，托洛斯基，加麥業夫，斯克李揚斯基，(Skliansky) · 諾干 (Nogvine) · 克李蘭哥 (Krylanko) · 郭隆泰 (Kollantai) · 李哥甫 (Rykov) · 安得諾夫——阿夫二哥，赫列札諾夫 (Riazanov) · 穆拉諾夫 (Mouranov) ·

羅納察爾斯基 (Lonatcharsky) 及斯杜治加 (Souchka)。社會革命黨左派則提出：加葛夫斯加雅 (Kakhtovskaya)、穆斯抵斯拉夫斯基 (Msislavsky)、薩氏、加列寧及格魯氏曼 (Crouchman)。加麥業夫到主席團，宣布寫在議事日程中的三個問題：政權的組織，和平，憲法會議。在幾個不甚重要申明之後，金珠客 (Khitchouk 少數派) 與亨德爾曼 (Hendelman) 社會革命黨說明他們的黨拒絕參加大會，并宣讀一個決議案，其中形容彼得格拉事變為『軍事陰謀』是『反對祖國與革革命之罪惡』，並是表示內亂之開始，置革命於死地』。於是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都不容於工人階級，而歸附於亞勒塞也夫 (Alexeiev) 的軍官，士官學生與哥札克之反革命。他們反對內亂，形容工人革命為『罪惡』與『妄動』，同時他們自己却建立個內亂的巢窟，豎起為反對蘇維埃第二次大會而組織的『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之旗幟。托洛斯基用力說：『平民羣衆的暴動沒有辯解之必要；我們剛纔已有暴動的證據，並不是一種陰謀。我們鍛鍊

了彼得格拉的工人與兵士之能力，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並不是在一種陰謀中鍛鍊了爲暴動之羣衆的意志」。論到社會革命黨右派退出大會，托洛斯基曾經提出一個決議，證明當七月間——即整個革命中——他們採取一種以嘲笑農民並保護資產階級的政策。他們退出『決不是削弱蘇維埃，却是鞏固蘇維埃，使工農政府淘汰了反革命的分。很多年載以來自稱工人的代表，到了嚴重的時候，即工人的先鋒執着武器保護大會與反革命而反對革命的攻擊的時候，他即拋棄了無產階級』。

大會爲結束這個歷史的紀念日，決定發一個宣言告俄國民衆。大會向他們宣布經過的情形並說明他對內對外的政策。『大會根據工兵農最大多數之志願以及彼得格拉的工人與駐軍之勝利的暴動。担负政權之完全責任』。他的意思在引導締結和約，將土地給農民。建立工人監督生產，承認一切民族自決並使軍隊民主化。『維蘇埃政府將向一切平民建議即刻民主的和平以及前敵之立即停戰。他將担保貴

族，帝王與教士的土地，無條件地交給農民委員會，並將保護兵士使軍隊完全民主化之權利，建立工人管理生產，担保召集憲法會議，供給城市以麥子，給農村以最緊急需要的物品，保證俄國一切民族之真正的民族自決權。大會勸告兵士，工人與農民，團結於他之周圍以攻擊反革命：『一切權力歸於工兵農代表維蘇埃！』

這篇宣言已經指示十月革命之兩重的性質，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的革命。資產階級的革命，在於廢除俄國封建制度的遺跡並交土地給農民。世界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在企圖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組織生產，並且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的世界。當維蘇埃第二次大會討論和平與土地問題之時，更加明白表現這兩重性質。當時列寧提議這宣言的原文，並加以批評；這原文即變成關於和平的布告（原文錄後）這個布告勸告一切交戰國的人民及其政府，立即召集關於正直的並民主的和平之談判。『正直而民主的和平』應當是不吞併不賠償之和平。大會

宣言，『決不視這些和平條件爲哀的美敦書』；換句話說，是預備審查其他之和平條件，只是主張最迅速地最明顯地審查各交戰國所提出的條件而排斥一切兩可性與一切秘密。請各交戰國締結立即休戰的條約。這個布告致急切的呼籲於法國，德國以及英國的工人。

附 錄

告一切交戰國的人民與政府書

由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十一月六日至七日）之革命所產生而依據在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之上之工農政府，向一切交戰國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議，立即開始關於民主的並正確的和平之談判。

本政府企圖由民主的正確的和平，即疲於戰爭之最大多數的工人與勞動階

級所熱烈希望之和平，並是俄國工農推翻沙皇的德謨克拉西以後不斷地要求之和平，達到無吞併（即不侵略別國的土地並不強迫合併別國的人口）無賠償之和平。

俄國政府向一切交戰國的人民建議，立即締結如此的條約，並宣布預備不稍遲延採取一切確定而必要的手段，以達到由各民族與民衆所承認的大會，批准這種和約之一切條件。

本政府知道，依照一般民主的權利觀念，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權利觀念，因為併吞並侵略別國的土地，則使少數或弱小的人民歸附於一個強大的國家，並沒有這種人民同意與要求之明白的，正確而自由的表示，無論為強力所吞併或拘留在別一國邊界的人民之文化程度如何，以及如此歸附之時期如何；這些人民生長在歐洲或遠離海外的國家。

倘若一種人民被強迫扣留在他國的邊界，縱令他表示要用報章，人民大會，政黨的決議，或用騷擾與反亂以反對國家主義的壓迫，倘若這種人民沒有得到用自由投票以選擇他的政府之形式之權利——即是沒有些微的限制，並且在實行歸附或最強的國家撤退一切軍事力量之後——則這樣的歸附是一種併吞，即是一種征服與強暴行動。

本政府認定，為解決各富強國家間瓜分他們所征服的弱小民族問題而繼續戰爭，即是反對人類所犯之最大的罪惡；因此，正式宣布立即簽訂和約之決議，這種和約即是按照前面所宣布的，對一切民族毫無例外，一律公正的條件，以停止戰爭。

再者本政府宣布，這種和平條件沒有哀的美敦書的性質，即是預備審查一切可能提出之條件，但是為用最高限度的迅速並完全明白提出調停之條件起見

，主張排除一切兩可性與一切秘密。

本政府廢除秘密的外交，並說明在全體民衆前面公開召集談判之堅確的決定，他即刻着手完全公布自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七日，由大地主與資本家的政府所批准或締結之一切秘密條款。這些秘密條約之一切條款，其目的無非使俄國的地主與資本家得到利益與特權，並維持或增加由大俄羅斯帝國主義所施行之吞併，却由本政府即刻並一律否認之。

本政府宣布，向一切人民及一切人民提議，開始關於和平之公開的談判用電報與信件，或由各國代表間談話，或集合這些代表之會議都好。本政府爲便於這些談判，即派遣全權代表到各中立國。

本政府向各交戰的政府與人民建議，締結即刻休戰的條約；估計這種休戰至低限度要經過三個月，即在這個期間，不僅能夠完成一切人民——無論牽引

戰爭或被逼參加戰爭的——的代表之間之談判，而且同樣可以使各國召集有權力的會議來批准和平之條件。

當提出這種和平建議於一切交戰國的政府與人民之時，俄國工農臨時政府特別通知人類中三個最先進的民族之覺悟的工人，並參加目前戰爭之三個最重要的國家——英，法，德三國。這些國家的工人曾經對於進步與社會主義之利益，有最大的幫助。比如英國憲章運動之偉大的榜樣，法國無產階級繼續完成之世界重要的革命，末了德國反對特別法之英勇的鬥爭，以及由堅忍而有規律的努力建立德國無產階級羣衆之組織，因此給全世界勞動者以模範，所有這些無產階級的英勇榜樣，歷史進化的紀念物，都給我們以確實的保證，使這些國家的工人都知道他們的責任，即在從戰爭的恐怖與影響之下以解放人類，並且使這些工人用全般的，勇武的，而且不可抵抗地有力的行動，幫助我們引導和

平的利益以達到幸福的時期，同時可以從一切奴隸地位剝削之下解放被剝削的羣衆。

這不僅是從維蘇埃共和國發出來的一個和平建議，亦是爲和平與世界革命鬥爭之武器。這篇原文，認爲可以達到一切帝國主義的政府並使一切被壓迫的民衆明白資本主義社會之罪惡與虛僞。列寧顯然說明了這篇布告的希望。他說：「我們的呼籲應當達到各政府與民衆；我們不能不認識各政府，因爲這是離開和平之可能，一個平民政府應當好好預防的。我們沒有任何權力可以不同時通知各民衆。各政府與各民衆到處都是不和協的；我們應當幫助一切民衆干涉和平與戰爭問題」。此所以維蘇埃大會的提議不是哀的美敦的。列寧主張無論甚麼條件，「因爲我們不願意使我們的敵人對民衆有隱藏真理之方法而申明我們的不讓步；因爲不願意和平的政府是一個罪惡的政府；我們不是用哀的美敦書的形式申明我們的建議，務必使各政府

表露罪惡於民衆之前。並且民衆不要因這些罪犯而煩惱！』這樣的談判應當用以在大衆前面揭破資本主義的權力之政府之真相。在這種爭論中，必須強迫各資本家說明他們爲甚麼派遣千百萬人去自相屠殺。『我們不應並不能使各政府有託詞我們不讓步，並對民衆隱藏他們爲甚麼派人到殺場之可能。這是一滴水，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該拋棄這滴水，因爲這滴水可以滴穿資產階級的征服之石』。（見列寧全集一五卷。）

第二次大會處於不可以言喻的興奮之中。人們在大會聽到歷史進步之回聲。布告的語言已爲千百萬人所了解。出席大會之約翰李德 (John Reed) 曾經敘述和平布告之投票情形。我們最好引出他的全文中這一頁：

一個用他的本名的代表的說：

——有一種矛盾。首先你們提議不吞併不賠償之和平，嗣後你們說，你們

拿着一切和平建議來考察。拿着一切和平建議來考察。拿着來考察，那是表示承認……

列寧跳起來：

——我們要求一種正直的和平，但是我們不怕革命的戰爭。或者帝國主義的政府不會回答我們的呼籲，但是……避免發一個哀的美敦書，因為對哀的美敦書太容易說一個不字。

假若德國無產階級明白，我們是預備考察一切和平建議，這真好像水漲到瓶子外面，革命已在德國爆發了……

『我們贊成審查一切和平條件，但是這並非表示我們承認那些條件……的確我們為我們的條件奮鬥到底；若是別的條件，我們將判斷他是否沒有繼續戰爭之困苦……我們第一所願意的就是停止戰爭……』

當加麥業夫要求贊成這個布告的人表決的時候，恰好是十點三十五分鐘。惟有一個代表敢於舉手反對，但是從他的周圍所發出的抗議之激烈，即刻使們放下去了，這是全體一致的。

爲共同的衝動所刺激，我們忽然都站起來了，我們的聲音連成一氣，漸漸大唱其國際譔(L'Internationale英特爾納維納爾)。一個臉皮變成灰色的老兵士，如小孩一般嗚咽起來。亞力三大拉·郭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揩乾了他的眼淚。譔聲強烈地充滿全場，震動所有的門窗而慢慢恢復平靜的空氣。「戰爭完了！戰爭完了！」一個青年工人在我們後面叫喊着。繼而，當末了的時候，即我們站在一種很少安靜中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喊着：

——同志們！紀念着爲自由而死的人們！

於是我們唱着追悼譔，這個莊嚴的，憂鬱而雄壯的，俄羅斯的，如此感動

的謠。(見約翰李德：搖動世界之十日)

和平布告已經說明十月革命之世界無產階級的特質，十月革命與世界資本主義對立，給全人類以自由。爲和平之鬥爭，使團結於維蘇埃全俄大會周圍之農民變成世界革命之參加者。贊成蘇維埃之小資產階級，保護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並爲廢除世界資本主義制度而戰爭。但是爲世界革命之鬥爭已於第二次大會時即開始了，他不僅滿足俄國無產階級羣衆之希望，而且滿足小資產階級羣衆之希望；這次大會採取了各種方法，注意滿足小資產階級羣衆之希望，而且保證他們與無產階級革命之結合在那末蔓延全俄羅斯，而且使小資產階級與臨時政府反對之農民之土地鬥爭應當完成了。

在和平布告之後，列寧提出關於土地之布告。本治布魯爾維治 (Boritch Broué vitch) 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過：『我記得，列寧起草這個告布之第二天早晨對我說：

倘若我們只有時間頒布這種法律，有誰能夠即刻取消他！」（見無產階級革命第一〇號六一頁）。

在宣讀這個布告之前，列寧在一個簡短的演說中解釋這個布告，並說明動議之策略的觀察。列寧說：「聽說這個布告與給代表之委任狀都由社會革命黨集起來了。彙集這種文件無甚關係；民主的政府，我們不能忽略平民羣衆的要求，雖則我們不是與他們同意。農民在迫切的實際中看出這個布告中真理之所在」。這是一篇最可注目的演說。列寧在其中指出不在乎一種學理與實行之綱領，而在乎滿足千百萬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生活之需要與要求，即是社會革命黨——一個農民的黨——所不知道使農民滿意的。農民在革命之八個月中得到一些經驗，他想自己來解決關於土地之一切問題。所以我們宣布反對這種法律草案所提出之修正：因為寫一個布告，並非行動的綱領，我們不願意加以詳細說明。俄國是很大的，而且地方的條件是不

相同的，我們相信農民比我們更會解決問題些，並且相信在我們的綱領之精神中或在社會革命黨之綱領中，關鍵不在乎這一點；其主要精神在乎農民確信在農村中再沒有地主，並且他們將要自己解決一切問題而組織他們的生活。」（見列寧全集一五卷）。

土地法令宣布不賠償地主之沒收法。『地主的田產，親王采地，帝王，教會與修道院的土地，以及一切動產與不動產，房產，其他建築物等，一直到憲法會議都歸土地委員會與各區工農代表蘇維埃處理。農民代表蘇維埃擔任監督被沒收的財產之保存』。一直到宣布確定的土地法之時，由新聞報編輯員根據二百九十二個地方的請求所編纂之農民請求冊應當供給土地改革之方針。據大會的意見，土地問題之正確的解決應當如次：『土地私有制一定要廢除，土地不能買賣，借貸，亦不能抵當，並不能以其他方式佔有之。所有國家的土地，教會與修道院的采地，地主，自

治邑及農民之土地等，都要無賠贖地變成國家之財產，并歸耕種這些土地的人之處理。凡屬國有的土地都應當屬於一切公民；一切公民對土地都有同樣的權利。

土地法令適合農村小資產階級之希望，而使農民與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嗣後大會從事政權之組織。爲此事開始爭論了。社會革命黨左派與世界主義者都主張民主同盟之必要。托洛斯基以多數派的名義回答剛哥夫 (Kamkov) 與亞維洛夫 (Anlov) 提議與退出大會之保護富農者締結同盟是不可能的，而且更加錯誤。托洛斯基說，「我們在全體民衆之前舉起革命的旗幟：暴動的政治口號是：一切權力由蘇維埃大會交於蘇維埃！」——加麥業夫用多數派黨團名義提出的政權組織之草案已經通過，并且以大會命令設立人民委員會之形式發表了。這個原文特別說明：『爲統治國家，直到憲法會議，即以人民委員名義組織工農臨時政府。國家行政各部門之指揮屬於各委員會，而各委員會與工人，海軍，兵士，農民及雇員羣衆之密

切的聯合可以保證大會所宣布的綱領之實際的應用。權力屬於這些委員會的主席所組織之集體——人民委員會。監督人民委員的行動與更替委員的權力屬於蘇維埃全俄大會，工兵農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富拉底米爾·烏里雅諾夫（列寧）（Vladimir Oulianov (Lenine)）被任命為人民委員會之主席。被任命之人民委員如次；內政——李哥夫（A. I. Rykov）；農業——米留丁（V. P. Miloutine）；勞動——世立亞普尼哥夫（A. G. Chlapinikov）；海陸軍——阿夫三哥·安多諾夫（V. A. Ovsenko Antonov），克里藍哥（N. V. Krylenko）與狄邦哥（P. U. Dybenko）；工商業——諾根（V. P. Nogine）；公民教育——羅納察爾斯基（A. V. Lounatchasky）；財政——斯克活爾左夫（I. I. Skovrtzov 卽斯德巴諾夫 Stepanov）；外交——托洛斯基（L. D. Trotsky）；司法——阿波哥夫（G. I. Opolkov 卽洛莫夫 Lomonov）；糧食供給——德阿多爾威治（I. A. Teodorovich）；郵電——亞維洛夫（N. P. Ariev 卽格勒波夫 Glebov）；民族——史達林

(I. V. Staline)：鐵道人民委員的職位暫付缺如』。

第一次工農政府如此組織起來，爲歷史所承認的。十月革命乃無產階級的革命，同時又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的革命，在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所產生的人民委員，爲鞏固勞動者政權所採取之最後的方法中已經表明這兩重的性質。實在，鬥爭決沒有停止。退出大會之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以及與他們聯合之大資產階級代表，都想與新生的，無產階級的政權開始鬥爭。反革命的打擊還沒壓下去；蘇維埃的仇敵，都希望在憲法會議中找到一個機關，以便集合羣衆於他們旗幟之下而消滅工農的政權。工農的政權應當保持一種酷烈的鬥爭以反對一切的敵人；這些人還不知道隨從有千百萬農民之無產階級已經準備拚命以掩護他的階級之政權。

第八章

少派脫與社會革命黨之態度；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

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退出蘇維埃第二次大會；但是他們的退出，并不是表示是讓出他們的位置，給無產階級以政權。恰好相反，他們只是爲繼續他們反對工農剛建立的政權之激烈的鬥爭。不獨在彼得格拉要發展這種鬥爭，在同樣的城市中，都是如此。市議會首先想變成反革命的抵抗中心，但是，一個指導這種鬥爭者證明，無產階級與農民有組織地完成十月革命，彼得格拉的兵士與工人之一切行動都嚴格聯合起來，并且暴動羣衆表示全體的組織與行動之非常的能力，反之，在革命之敵人中，却是完全缺乏一切組織與全般計劃，反革命派在抵抗的企圖中自相分裂，而

不能形成堅強并固結的組織。他們自己指出這種特徵了來：

『在各種反對團體之間，沒有任何的聯絡，沒有任何的抵抗計畫；那晚形勢表現失望了。無論市議會與指導社會革命者的黨，都不知道利用日間以組織防禦；他們只有憤懣的演講與回罵而失掉了機會』。由一個反對蘇維埃政權者所寫的這幾句話，即描寫了十月二十五那一天彼得格拉的反革命中心之精神。二十五至二十六晚，在市議會集合之會議，自稱是永久的，并命名為『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委員會隨即組織一個執行局。這個委員會滿受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之稱讚，并未能實現對於他的職務與使命之一致。據克隆斯基的武裝同伴與北方前敵的委員——斯丹吉也維治 (M. Stankevich) 說：『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決不遲疑地承認不能維持克隆斯基政府，并決定決不在他的綱領中提及這件事』。斯丹吉也維治說，他向委員會提議『宣布以復興多數派所推翻的政府為鬥爭之目的；但是，沒有一票贊成我，並

且人們一致證明，因為政府之不得民心，最好不提及這件事（見斯丹基也維治：備忘錄）

委員會在告公民宣言中說明了他的立足點。他號稱以「復興臨時政府為目的，因為臨時政府為民主勢力所倚靠，引導國家到憲法會議，並從反革命與無政府中將國家救出來」。委員會勸告公民莫服從蘇維埃政權并打擊多數派。因為他表示以復興一個新的臨時政府為職任，於是開始研究將來的政權之性質。伊紐的夫(Enache)說：『討論必須建設的政府問題已經過幾天了。將來的政府是同質的，是社會主義的呢？抑與立憲派(Caste)或多數派聯盟呢？照表決權的多數，決定建立社會主義的，同質的政府，但是排斥多數派』。這個決議未能應用，因為羅維克格爾(La Vikingel)——全俄鐵路工人中的委員會——有一個好的建議之干涉。伊紐的夫還說：『時機是極端嚴重的，如漢勒(Hamlet)一樣，我們應當解決極大的問題：生存或不生存？』

革命普及於全俄國，擾亂已經蔓延到參謀部，前敵兵士爲我們報効，我們還與多數派競爭對於駐軍之影響，一切反對團體，如同羣衆一般，都在待着要求組織一個具有權力的中心，他們團結于這個中心之周圍而行動。在這個悲慘的時期，宛斯坦 (Winsten) 以個人的名義向我們宣言，幾天以來他的政友都放棄軍事委員會之議，還沒有決定他們的態度」(見伊紐的夫：四年大戰之事實與總結)。

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很難決定他們的態度與行動；然而他們彼此都確定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在革命最嚴重的時候，當時還在莫斯科打仗，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本沒有勢力建立一個社會革命之確定的組織，開始向多數派的蘇維埃作奮激的鬥爭，并以他們的黨之權力來掩飾無產階級與農民之反對者。十月二十七日，當『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尙在討論將來政府的性質之時，社會革命黨中的著名的首領——贊積諾夫 (Zenzinov) 在民事報 (Dielo Naroda) 發表一篇文章，題爲：他們是

怎麼？我們抽出幾行來看看：『他們自稱人民的保護者，但是實在他們只是侵犯人民并流人民的血之逃亡者。爲自由與革命而奮鬥的人民，應當委棄他們，并以咒罵答復他的呼告。凡屬看出他們中之侵犯者強奪者的人，團結得愈早，則使引導國家與革命到滅亡之瘋狂并罪惡的暴行停止得愈早，我們勸告大家給多數派以有力的抵抗。與人民的仇敵不共戴天！他們內部的軟弱與貧乏都表現在國人前面了，被他們嘲笑的無知羣衆都計算到用以引誘他們之詭計了！』。少數派竭力援助社會革命黨。在十月革命中，工人報的政策只表現是一種失掉社會信任之罪惡的暴行。工人報有一篇論文中說：『多數派除攫取統治權以外，甚麼事都能做：今天或明天，他們確實將捲到深淵裏去』。并且他們的失敗應當引起反動之勝利，及少數派命令『陰謀者』不遲滯地投降於保護祖國與革命員會』。

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不以這些呼告與建議爲足，他們企圖行動。加之社會革命

黨所指導之『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未了決定允許多數派參加的政府，而排斥革命之其他的指導者；（排斥列寧與托洛次基）一方面如此做，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却不相信這種計劃之實現，努力在大本營（Le Grand Quartier Général 省寫為 G. Q. G.）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以徹爾諾夫（Tchernov）為主席。徹爾諾夫回到參謀部，哥次（Gorz），亞夫三節夫（Avxentiev），赫爾斯坦（Hernstein）以及社會革命黨之一切指揮者都如此。』他們都望在大本營找些兵力以攻擊蘇維埃政府。尙忠於社會革命黨之市議會與各省——如彼得格拉——建立之『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還集中注意於大本營。茶伊哥夫斯基（Tchajkovsky 社會革命黨最老的首領之一）亞夫三節夫與哥次——反多數派運動的首領——為尋求反對無產階級之聯盟者，還與外國帝國主義的接洽，因此布奢男與他們開了談判。

第九章

莫斯科之十月。多敏黨之組織任務。爲政權之戰爭。

莫斯科的工人迅速地脫離階級合作之影響，在九月間，城市蘇維埃已有共產派的多數。莫斯科蘇維埃遵照中央委員會訓令已於十月間預備暴動。他曾發布（九月至十月）一批關於經濟鬥爭的命令，并決定赤衛軍的規章。當時黨的報紙努力組織羣衆於蘇維埃之周圍。十月二十四日，社會民主報——莫斯科多數派委員會之機關報——說：『戰爭開始了，加魯甲（Kalinin）之蘇維埃都已解決，他們的委員都已被捕；并且傳說有些人已槍斃。於是臨時政府由西方前敵調去之哥札克即主持一切了……』

『宣布戰爭了，抵抗已經開始，我們應當注意這件事。克隆斯基與其代理人是我們明顯的仇敵，同他們沒有談判之餘地！不要與敵人爭論，只有攻擊他』（見莫斯科十月革命一五五四頁）。

彼得格拉宣布開始鬥爭了，於是使莫斯科進到興奮的地位。所有各縣蘇維埃忽然得到軍話之通知，并都召集常會。這是他們接到的通知：『彼得格拉頃已開始為政權之鬥爭。政府正在抵抗，城市在革命中心之手。莫斯科蘇維埃採取為時勢所必要的手段。所有的兵力都應當即刻布置陣容。沒有中央的命令不要動作。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設了一個常務局。明天（十月二十六日）召集蘇維埃全體大會。今日三點鐘，在工藝陳列所召集中央委員會會議：務必出席』。十月二十五日舉行莫斯科蘇維埃全體大會。由大會選舉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即於次日晝夜發出命令與呼告，并建立他的機關；他還沒有歸他節制的兵力。我們的同志伊紐多夫關

於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活動初期之情形有下面的敘述：『二十七日，莫斯科公安委員會的首領——魯德內夫（Roudnev）集合他的兵力——并且莫斯科資產階級有他的兵力——逼壓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十分鐘以內解散，并不轟擊蘇維埃』。這個哀的美敦書沒有討論過，我們自動地回答，我們沒有怎麼要告訴魯德內夫。伊蘇夫（Issouve 少數派）並沒有等到別的答復，而只是潦草以盡他的外交的使命。他走了。我靠着窗戶沈思。斯密多維治（Smidovitch）近來了，并殷勤地對我說：『人將絞死你，我的親愛的伊紐的治，你如此年青呵！……』我望着他笑；我不怕死。我們沒有實在的兵力。我再看見這慘劇，彷彿就是昨日：有十個人坐着或站着在各不相同的位置，在平安地討論應採取之手段。那晚沒有人害怕。差不多即刻決定宣布總罷工』（見莫斯科十月革命二七頁）。

這個證據有兩點教訓。第一，蘇維埃沒有爲他處置的兵力，當時臨時政府却預

備有上十萬武裝好的，并有軍官指揮的兵士。蘇維埃沒有武裝并組織的兵力。次之，我們保持共產主義者的職任與舉動，因為共產主義者担负指導革命之責任，知道一切力量實在是坐在他們方面的，并且唯一地要採取許多手段，用組織來表現這種力量。

同日（十月二十七日）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兩個通告，一個是通知事變給工人與兵士，并命令他們只服從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命令，另一個是命令已武裝的赤衛軍自行準備。『蘇維埃所領導之彼得格拉革命之工人與兵士，剛纔開始一種堅決的行動反對臨時政府——革命之背叛者。援助彼得格拉的同志乃莫斯科的工人與兵士之責任。莫斯科工兵代表蘇維埃為指揮行動起見，剛已選出革命軍事委員會并已開始工作。革命軍事委員會宣布：一，所有莫斯科駐軍都佈置戰爭；所有的聯隊都應當按照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命令，預備進行；二，除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或由革

軍事委員會副署的命令以外，任何命令都不執行」。共產黨員用宣傳員與組織員的名義散布在各兵營與工廠。

莫斯科無產階級全體一致自動地響應這些通告。各製造廠都遵照多數派的小組與孤立的戰士之通知，一律停止工作而委身於鬥爭。工人羣衆都跑到街上去，正在尋找武器，布置防堵。共產黨員首先舉起暴動的旗幟，隨從有莫斯科無產階級的羣衆。羣衆好高興地歡迎宣布暴動。在槍炮工廠忽然得到了消息，於是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奔赴各縣參謀部。加的舍夫(Karvchev)同志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過：「工人聽到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之出發，大家都停止工作并跑到院子裏去了，我們剛剛登上工廠的演說台，即有槍聲開始向城的中央爆發。我們向工人說明事變之嚴重，并勸告他們到各防堵的地方以決勝利或死亡，這個通告一直達到他們的心坎，以致許多人——特別是婦女——都哭起來了。這好像是電流通過這兩千人之心靈一般，興奮

影響如此之大，以至引動了我們許多社會革命黨與少數的對手。這些羣衆立即組織成十人小組，受蒲的兒基(Bouyrky)與蘇舍夫斯基—馬林(Soushevsky-Martin)革命軍事委員會之指揮。有幾個護衛的人留在工廠裏。工人組織成軍中救護分隊或担任供給糧食』(見普勒斯尼亞(Presnia)區之十月七八頁)。

這種簡單的敘述已經表明十月革命的特徵之一：羣衆運動之自發與共產黨之組織作用。無黨的工人羣衆很努力參加十月的工作。赤衛軍大隊差不多專由無黨的分子組織而成。富塞克斯維亞次哥—伯特羅夫斯克(Vselshviansko-Petrovsk)區一個同志說，那天晚上，革命軍事委員會着手組織赤衛軍。許多同志從各鄰近的工廠來報名。於是將近有九十個人都入營了；大部分是無黨的，但是他們都知道那一個黨領導這次運動以及他們爲甚麼事打仗』(見普勒你尼亞區之十月九一頁)。

當時黨沒有很够的武器；無產階級按照軍事技術之最後的名言，沒有武裝起來

反對武裝的敵人。無產階級只是富有興奮的勢力與階級覺悟。必須在鬥爭中取得武器。有一個戰士說：『只預備有舊的槍與兩顆子彈，我們開始解除軍官的武裝，以武裝自己而破壞他們』（見普勒斯基尼亞之十月九一頁）。

沒有武器，人們不承認爲戰鬥員。波布羅夫(S. Bobrov)說，『當日同志們的呼聲是如此：『武器呢！武器呢！』無黨的工人成羣地來到赤衛軍辦事處，但是我們很抱歉，沒有武器，不能接受他們』（見普勒斯基尼亞之十月九一頁）。各方面都要求武器。必須解除敵人的武裝以武裝自己。曼德爾斯丹(Mandelstam)敘述波曼(Bauman)地方的事件說：『我們最初所得的武器，是從敵人方面奪來的；實在我們這區解除了武裝』（見莫斯科十月紀念日一一九頁）。——『在富節克斯尼亞次克(Vielkshniatsk)區，我們靠搜索地方的資產階級的武裝來武裝自己：因此我們找着十五枝手槍。』無產階級就是用這些武裝打仗。但是雖說缺乏武器，興趣却是很高的。幾乎沒有武

裝的無產階級，雖然常常不知道使用槍枝，却是唱着譟去打仗，在火線上表現勇敢，以決勝利或死亡。有一個同志說：『暴動的第四天，我接到命令，要我管理三十個赤衛軍并調動一個分隊，因為這分隊從二十八點鐘以來，還沒有從斯安里尼哥哥夫 (Stalchnikov 莫斯科街名) 移動。於是我們登上四輪摩托車，一面唱着革命譟，不久就到了。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是些青年工人，從來沒有拿過槍，并不懂得戰鬥的初步法則』(見普勒斯尼亞區之十月七三頁)。

無限的忠誠與制勝之堅強志願，都足以補充武裝與軍事暴動之不足。

另一個戰士阿西波夫 (Ossipov) 說：『縱令我們武裝不好，教練不好，縱令我們缺乏一切的東西，譬如有些同志爲拉一個炮，必須用他們的腰帶代替那必需的繩索……這樣要阻止我們是很難的』(見莫斯科十月紀念日一一三頁)。

工人在戰鬥中證明了非常的組織能力。他們幾乎沒有武器，自發地暴動起來，

給資產階級以致命的打擊。莫斯科之強大的駐軍不給臨時政府做保護者，但是給許多戰士於革命軍事委員會。兵士有長鎗，機關鎗與砲。從暴動之第一分鐘起，革命軍軍事委員會通知過他們。據我們的同志伊紐多夫說，十月二十八日，莫斯科駐軍之聯隊與大隊委員會開了一次會，着手選舉十人組織一個委員，以布簪斯基(Bondzinsky)與薩伐斯特普尼亞克(Savva Stepmak)爲首領；他們領導駐軍歸革命軍事委員會之節制。當時通過決議，其中說：『血已流着，現在再用不着口說，而在於行動……；軍隊應當援助革命軍事委員會，并且只有服從他』（見莫斯科十月暴動二十九頁）。

砲兵首先響應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通告，接着有步兵響應。注意，步兵中有很多數分子首先起來響應，兵士羣衆——除開最初的時候——只是行動最熱烈的時期，漸漸參加鬥爭。莫斯科的戰鬥，因暴動者之無準備，開始是很遲滯并不堅決的，未

了則牽動了一切無產階級與駐軍之最大多數，在羣衆之鬥爭與武裝都擴張的時候，革命軍事委員會漸漸鞏固了。兵士與工人即是非常堅定與強固之證明。有時羣衆比指導的組織更堅決些。因為數量收買量之增加，於是莫斯科的戰鬥員給資產階級以可怕的打擊。

臨時政府的軍隊感覺無產階級專政之戰鬥員的軍隊之相反的進化。這些軍隊有好的武裝，有好的糧食供給，漸漸解體了；結果只剩下些軍官，及士官學校的學生與兵士，農民及工人相對立。因為他的數量之減少，於是質量也減少了；因此武裝不好的工人與兵士畢竟戰勝了本來數目很多，武裝極好的敵人。無產階級方面有極高的興趣，勝利的信心以及解除屢世的奴隸地位之要求。

臨時政府的保護者是不能好好保護他的；他們的兵力已經瓦解了。亞荷塞夫（Arossev）在他的筆記中說：『兵士跑到他們所願意的地方去，只是傾服那方面。』

我們的戰士表現這樣的剛強，我們的敵人則表現這樣的虛弱。我記得一樁顯著的事。我們圍攻官舍，有二百多士官學生，軍官，警察及學生都在那兒。第二天薩布林(Sabine)來找我，他說：『我將再來會你，請給我一個命令。我們在斯特拉斯納鴉(Strasnaya)場回轉砲位對着尼各羅斯克(Nikolsk)』。薩布林只有二十個人，當時却有好的指揮之分隊佔據官舍。在相似的對手之間有甚麼比較呢？薩布林的兵士向官舍擲兩個炸彈，薩布林即嘆着：『你們幹甚麼！這是可怕的！這是不可能的！』——

——當時看見有兩個人舉起手，由我們的十五人包圍着，忽然向特曰斯加鴉(Myers-Kata)街前進。爲使兩百個武裝的人歸服於十五個兵士，只放兩炮就夠了，我們很迷惑的，因爲不知道這些俘虜到那兒去，必須把他們關在幾部分。人們決定把他們囚在一個馬廐裏(見莫斯科十月紀念三二頁)。這齣戲描寫了交戰的兩方面之精神狀態：這一方面是興奮與創造的能力，另一方面是陷落與失敗。

莫斯科之十月

二〇八

第十章

十月間在各省，大本營G. O. C. 及前敵之情形。

彼得格拉與莫斯科之暴動成功，對於全俄國之革命進行是非常重要的。這些事變引起各工業區的無產階級之興奮，而在工業的，商業的與農村的資產階級很強的地方則引起激烈的抵抗。

隣近彼得格拉與莫斯科之工業區域已經預備了。這些地方之黨的組織，正在暴動的準備中，并預防一切偶然的事變；無產階級的羣衆自動地希望禾維埃之政權。得到兩個都城之最初的消息後，無產階級的羣衆即刻佔據政權，或者——當蘇維埃還在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之手的時候，即強迫蘇維埃抓住政權。在伊凡諾活——活次乃三斯克 (Ivanovo-Voznessensk)，魯澤 (Rouze)，哥倫拿 (Kolonna)，伊舍夫斯克

(Ijevsk)，杜拉(Toula)，烏拉爾(Ural)以及一切工業區域——無產階級繁殖的地方都是如此。有一個同志說，在伊凡諾活——活次乃三斯克，黨的組織得到已經準備的事之通知。十月二十五日晚間，蘇維埃開會并等候消息。「我有三次想打電話給莫斯科，都沒有成功。末了，我同新聞報編輯部辦交通。一個有力的響音告訴我；臨時政府已推翻了！喜之不勝，我跑到忽然寂靜的廳堂中，我告訴各代表：同志們，臨時政府已推翻了！……於是叫喊聲，槍聲，歎美之聲，混成一團喧擾。有人唱起國際歌(英特爾納雄納爾)起來了」(見無產階級革命第一〇號二三九頁)。

十月二十五日，杜拉接到消息之後，城執行委員會，他的書記局，蘇維埃之革命的委員，多數派與社會革命黨左派，立即在麻羅左夫(Morozov)工人俱樂部開會；組織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蘇維埃聽到一個從第二次大會回來的代表之報告，即贊成彼得格拉暴動并正式抓住政權(見共產主義者的響

導第一一號四一頁）。

無產階級到處都是革命之傳達者與創造者。在各工業區握住政權，他在幾天內即已組織起來并武裝起來，努力反攻蘇維埃的敵人，并在莫斯科附近區域急去援助這個城市的戰士。在各省，如各大中心，無產階級都證明是有組織，同心一致并有創造的信心。十月革命得到共產黨員與無黨者之狂熱的贊助，因為他們同樣準備為革命而鬥爭。在各工業區域之革命可以說沒有遇着抵抗；在商業資產階級占優勝的地方都是不同。這些地方之商業資產階級更多些，則抵抗也更大些。

在工業區域的小城市，特別在農村之小資產階級的人民中，也是無產階級擔負革命；這些地方之蘇維埃，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有時是一九一八年初，才取得政權。這些地方之革命沒有遇着抵抗，但是簡單地感覺能組織新的制度之力量常常缺乏的。有一個多數派來到，或一個工人從工業中心來到，則城市與鄉村之貧民，

小部分的工人士并組織起來抓住政權。在烏格里治（Onglich）就是這種情形。有一個塞斯托勒次克（Sestorenk）在彼得格拉附近（工廠的工人來到那兒，於是小城市的工人都組織起來，并於十二月初間組織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將政權交給蘇維埃。一個鐵道工人說，十月革命後，在李賓斯克（Rybinsk）甚麼都沒有改變。一切事變幾乎沒有一點兒痕跡。只是在一九一八年初彼得格拉的海員達到以後才改變蘇維埃的組織。因此形成一個多數派的強固核心而開始工作了』（見革命中之李賓斯克二六頁）。

在西伯利亞遠遠的小城（秋滿（Toumen）也是同樣的情形，或者還差一點。秋滿蘇維埃在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之手，起初反對十月事變。嗣後遵照中央的命令組織一個革命軍委員會，確實是少數派社會革命黨組織成功的。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初，有些共產黨員到着秋滿，於是才組織一個多數派的委員會，無產階級才集合。

於真正的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周圍。末了，政權轉給蘇維埃。在各農村中都是一樣，或早或遲，都是貧農與半無產階級了解革命些，他們都勇敢地從事工作。農村居民之社會成分，在這些事變的經過中都明白表現出來了。那一個地方有許多貧農，那一個地方工農發展些，那一個地方是鄉村接近工廠些，那末十月革命即可以得到一種順利的地位與確定的保護者。下諾夫哥羅得 (Nijni Novgorod) 區，就是這種情形之一個好的例子。李邦哥夫 (Lipenkov) 說：『在加積諾 (Khozino 屬亞爾打托夫縣 (Ardarov) 村，到十二月才知道十月二十五日的革命。村上的貧民，因為他們的地位接近無產階級，得到這個消息即很喜歡，並且毫不失掉時機而從事改變現存的行政成爲工農蘇維埃。可以說，加積諾的居民對於十月革命與創造這次革命，或在俄國宣布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給一切政權於蘇維埃者都有模糊的觀念。有些從農村出去的兵士與工人不久都跑到鄉村中來了。其中有富羅洛夫 (M. P. Frolov) 與

博洛所夫 (S. M. Polosov)，博洛所夫是加積諾第一屆蘇維埃之主席。他曾問農民說明經過的情形，并告訴他們社會民主工黨(多數黨)之指導作用(見下諾夫哥羅德區的革命運動第三卷二一六頁)。這種情形形成了一個公例：製造麻工人，從前敵回的兵士，貧民，他們就是十月革命之傳播者。傳播這個新聞到特羅伊次克(Троїцк)村莊者就是『這村莊之一個貧苦的兵士』(見前書二二一頁)。在革命很久以後，因為製造的工人與從前敵回的兵士才使多數派達到克尼雅于斯克(Книгауинск)縣(見前書二四三頁)。

在工業與商業的大資產階級之中心，十月革命遇着激烈的抵抗。在莫斯科，薩拉妥夫(Saratov)，伊爾庫次克(Иркутск)及下諾夫哥羅德都是這種情形。在這些城市中，無產階級是很多的，但是資產階級也是很多而且很強的。這些地方的工人興奮地接受十月革命之信號：立即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并以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心

，開始組織赤衛軍并武裝起來了。資產階級聯合一切反革命的分子以圖抵抗。在薩拉妥夫，『公立中學校學生，大學生與軍官學校學生都來援助市議會而想進攻工人的革命』（見無產革命第十號二五七頁）。在薩拉妥夫市議會所保護之已成囚犯的臨時政府者中『找不着一個兵士，一個工人，在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之間也是一樣。階級的本能使他們走到堅決行動的時期。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之『德謨克拉西』專是爲所謂『正經人』造成的』（見無產階級革命第十號二五七頁）。

資產階級抵抗勝利的革命之試嘗早知是要失敗的。臨時政府的保護者失敗了，雖然有他們的武裝與特別優良的技術。他們沒有形成一種廣大而團結的羣衆；他們從各種資產階級的環境中來的，組織很軟弱并不堅決的。在下諾夫哥羅德，市議會及『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都召集會議，無限地演說 通過提議，但是不曾證明有任何實際的活動。在薩拉妥夫，臨時政府的保護者遇着革命者最初幾槍之射擊就降

服了。在卡簪，他們完全純良地自己投降了：他們所倚靠的兵士都趨向暴動，并且資產階級的志願兵也表現不能戰鬥了。

十月革命的進行因各地方人民之社會組織而變換。

在大俄羅斯，西伯利亞與窩爾加，在無產階級與貧農中有許多忠於革命之黨徒。資產階級之抵抗企圖，因統治階級之內訌而失敗。多數派所領導的勞動羣衆保證了十月革命之成功。在各農村中，特別感覺兩個革命潮流之混合。無產階級所領導的農民，廢除了貴族的財產與分離人民之階級區別，并建立了民族平等。同時他們援助無產階級以破壞鄉村反革命的抵抗。在大俄羅斯的工業區域，十月革命迅速鞏固了。在南方各地的進行并不一樣，因為當地之經濟與社會的組織是不相同的。

大本營的變故，如彼得格拉與莫斯科事變一樣，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這次事變使革命的對手失掉一切援助，使軍隊歸服蘇維埃，并使爲和平之鬥爭得到有組織的

性質。據斯丹吉也維治說，從最初的時期起，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與總參謀部發生關係，幻想將莫伊勒夫（Mojilev）大本營再調回南方，以他爲作戰的基礎』。領導反對工人革命的抵抗之社會革命黨想在那裏組織一個反對人民委員會之政府。微爾諾夫，哥次，赫斯坦，亞夫三節夫，所有社會革命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都派遣到大本營去；想在參謀部保護之下，在莫伊勒夫召集一個全俄農民代表大會。

在莫伊勒夫——沒有工業的小省城——既沒有重要的無產階級，也沒有多數派的組織，而且地方蘇維埃是遲疑而不堅決的。那裏有一個軍事委員會，是二月革命初期所選舉的，由一些不堅決的戰士組織而成，與羣衆沒有關係。有級的兵士（按卽下士伍長等）也有他們的委員會，卽屬於他。這些組織接到十月革命的布告，都表示反對。十月三十一日，軍委員會通電給全俄鐵道工人委員會聲稱：『在總參謀部之軍委員會的代表，我們宣布無稍遲疑地，反對多數派以他們的意志強迫國人之

嘗試。我們以力量回答力量。他們之真正善良而強大的軍隊向彼得格拉進行。總參謀部所採取之一切手段都在我們監督之下來應用。我們不願意流血。當多數派將來拋棄武裝而服從全俄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授與民主全權之機關——的決定之時，軍隊都將調回來。沒有一滴血會枉然流的。假若右派想利用擾亂以達到反革命的目的，則我們以所有的力量來反對反革命。我們要求你們給我們以信任。莫阻礙我們的軍隊之進行。我們請你們派一個代表到我們的指導機關中來，以便在這種困難時期協力合作』（見勒勒維治：(Lelovich)：總參謀部之十月三十一頁）。

於是軍委員會向多數派宣布戰爭，指導作戰，組織兵力，并提出將政權交給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之綱領。這種宣言只是一種手勢，因為委員會並沒有任何的實力。司令與幹部的代表都有同樣的表示。十月三十一日，有一個由杜哥寧(Dolikhonine)將軍與臨時政府的委員會簽字之電報要求『以陸軍與海軍的名義，立即停

止多數派的暴動力，否認暴徒以武裝奪取政權，并無條件地服從臨時政府——由民
主授以全權，而且惟有他能够引導國家到憲法會議；憲法會議將是俄國土地之惟一
的主人翁」。——在這個威嚇的原文中說過，「活潑的軍隊以力量維持這種要求」（見
勒勒維治：總參謀部之十月三二頁）。

但是臨時政府已經打倒了；沒有一個兵士，一個工人起來保護他。在彼得格拉
，十月革命之反對者爲避免明顯地攻擊革命起見，想與革命軍事委員會開談判，并
且此舉在總參謀部有確實的反響。剛纔全體宣傳反對多數派之神聖的戰爭之軍事委
會，也開始講和了；放棄最初的觀點并否認攻擊蘇維埃，於是提出一個新的綱領：
『用即刻肅清危機與反動擾亂之鬥爭之名義，以實現反對右派的危險之一切民主勢
力之聯合；維持前敵之安寧與統一。軍委員會贊成一個同質的，社會主義的政府，
這政府包含平民社會黨與多數派而根據下面的綱領：迅速召集憲法會議，土地交給

土地委員會并即刻建議全般的和平（見勒勒維治：總參謀部之十月三、四日）。彼得格拉克拉斯諾夫與克隆斯基的軍隊之失敗，深深地變更了總參謀之精神狀態；人們再不說用武器，而是講和了。十一月四日維爾哥夫斯基（Verkhovskiy）臨時政府的陸軍總長），徹爾諾夫與哥次都到了大本營。

軍委員與明白反對十月革命之拉達烏克蘭（La Rada Ukraine）商議，結果發表一個通告，勸告『積極的軍隊以他的委員會為代表發起組織一個政府』。軍委員會向軍之各組織提議派出他們的候補者到會議之主席團，以便趕快組織政府。至於他自己，則提出社會革命黨之首領維克多米加伊洛維治徹爾諾夫（Victor Mikhailovich Tchernov）做候補者。那個通知末尾有幾句話：『同志們緊密團結於徹爾諾夫之周圍，危機將要解決的』（見勒勒維治：總參謀部之十月三頁）。這個通知沒有得到任何的回聲，已動員的工人與農民都興奮地歡迎十月革命，他們成羣地傾向於十月革

命。人們預備在大本營召集一次會議以討論政權之組織。沒有受多數派影響之軍隊組織都有些遲疑。軍委員會的紀事宣稱：「因爲在軍隊各委員會中力量的關係之變更，委員會決定不積極參加組織并召集這次會議」（見前書七一頁）。

這在於兵士之決定。軍委員會命令各戰綫退却。他首先宣言不讓步，過幾天却又開始講和，并即宣布中立，宣布大本營之中立。他沒有比兵力更決定的政策。北方與西北前敵之軍隊都歸服於多數派。總參謀部，他的職員，軍官與將軍們，開始爲協約國的代表所援助的，業已對蘇維埃政權宣布戰爭，但是現在急於捲起他們的旗幟了。反革命所依賴之聖喬治 (Saint Georges) 大隊阻止大本營向南方出發，而不願意戰鬥。參謀部只能倚賴幾個突擊大隊。

杜哥寧將軍與人民委員會之衝突，不得不使人民委員會注意大本營。杜哥寧不承認服從命令并拒絕和平談判。軍委員之一切矛盾的宣言都表明不發生效力。當多

數派的旗幟普遍到前敵與軍隊而覆沒蘇維埃的反對者之時，即使委員會無立足之餘地了。在莫伊勒夫亦證明蘇維埃的權力與兵力之擴大：特別為大本營服役所組織的精銳軍隊，現在離開了他；不僅離開他，而且拘捕他們的軍官，因為這些軍官想在十一月十八夜取得基輔(Kiev)，並且攻擊工農蘇維埃之不可能而自投拉達烏克蘭保護之下。在莫伊勒夫蘇維埃也有類似的變化：十月二十九日他曾經通過一個處罰首都暴動之決議，到十一月十八日却通過另一個承認新政權之決議，贊成蘇維埃第二次大會的綱領，選出革命軍事委員會，并担保監督總參謀部之行動。下面是他在這種情形中所公布的訓令：

第一，按照由十月革命的志願所建立之人民委員會之命令，莫伊勒夫革命軍事委員會——由城市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西方前敵革命軍事委員會軍隊的代表組織而成——宣布為莫伊勒夫與隣近地方之最高權力

并担保監督大本營的行動。

第二，所有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應當不遲延不保留地去執行。

第三，凡屬不承認與不執行人民委員會與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命令與處置者應即拘留，免職并取消俸給。

第四，凡屬反對人民委員會與革命軍事委員會者即受革命軍法會之拘留與審判。

這個訓令是十一月十九日公布的；同日有法國與英國的代表前導之突擊大隊，軍官與將軍都離開莫伊勒夫；二十日有一批海軍進到城內。於是反革命的參謀部孤立崩潰了。一般遲疑而分離的，沒有武器的將軍既無力量又無行動計劃，結果都逃跑了。士兵羣衆已經解決了一切問題。他構成前敵十月革命之力量，使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無能爲力而拋棄他們了。這是不可避免的，從最初起即感覺到的，并且我們的

知道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到着大本營，本想在那裏組織反對無產階產之鬥爭，爲甚麼忽於十一月十日通電給簪積諾夫與澤赫德里(Tsereki)說：『國家一定要經過一種分離現象，一直到恢復安全與團結之民主勢力足以抵制多數派的暴行』（勒勒維治）。

在大本營找不着便於團結民主勢力之餘地了。

前敵軍隊中之工農羣衆乃十月革命之奮勇的保護者。當十月革命發生的時候，最接近工業區域的前敵已經在共產黨之手；軍隊之下層組織，在哥爾尼洛夫事變後，即趨向於多數派。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只能在很久沒有改選之中央組織與遠離工業中心之前敵中維持地位。許多記錄很少有關於前敵十月革命——即奪取政權——之教訓。但是他們給他們之很少的教訓，即已指出在遠離前敵之中心省分所看到的景象。在那些省分之工農羣衆，如同在軍隊之兵士羣衆，都是全體贊成革命的；或在那裏準備，或聯絡最初的消息到那裏去。他們表現非常的興奮與偉大的組織能力。

反之，軍官，醫生，軍需官等都是革命之敵手。他們常常處於軍隊的政治組織之上峯，但是羣衆的壓迫足以妨礙他們的，縱令他們有正麼需要或抵抗，并且他們的勢力分散了，缺乏政治的穩定并爲羣衆劫持，因爲羣衆在取得下層組織以後，即取得中央的組織。因此完成了北方敵與羅馬前敵之革命。在里加（Riga），多數黨在軍隊中之勢力是很強的；黨的組織正在如彼得格拉所實行之準備中，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安多諾夫——阿夫三哥通知在里加前敵之職任，并且如果有臨時政府的黨徒，則不讓他們出發到彼得格拉。自十月二十一日預備兵士變動之時，勒統的槍手（Le Fusilier Letton）報在論文中說，『我們將近決鬥了。我們已處於特別事變與決切變化之前夜。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挖成了深淵；好調和的人也不能填滿他。現在政權問題乃主要的問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最近期間將會決定他的結局。準備罷沒有其他的解決』（見德羅丁：里加前敵之十月二三頁）。軍委員

會沒有降服，他也準備着鬥爭。他設立電報機關之經常的檢查，這不會阻止電報局員於十月二十五晚不通報敘述彼得格拉事變與多數派取得彼得格拉之快電。

共產黨員隨即武裝起來，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成功了；軍委員會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各自發出通知與布告給軍隊。十月二十六日，革命軍事委員會公布這樣的通告；『決切的時候到了，必須行動。快來援助革命的彼得格拉。拒絕執行反革命的命令。阻止調遣軍隊到彼得格拉。不應當在第十二軍中留有革命的劊子手！』革命軍事委員會派遣密使到各隊伍中去。另一方面，舊軍委員會則公布下面的通告：『同志們鎮靜些，剛強些！不執行革命軍事委員會所發出的任何命令。與全體人民一致。革命軍事委員會是非法的，作亂的』。但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敵手沒有任何的實力。軍隊都派遣代表到革命軍事委員會，允許他以幫助與援救。軍隊的大會應當解決許多爭論。縱令他是十月革命以前舉出來的並且有『農民的總長』徹爾諾夫親自參

加，在臨時政府看來，這次大會是失敗了。德羅丁(Draudine)同志說，「大會的選舉有一個有趣的表。第一行，所有挖壕塹的人都贊成多數派；所有有級者（按卽下士伍長等），辦公的重要職員，工場員司，如後防之半數，都贊成政府的聯盟」。十月二十七日舉行大會，縱使革命黨徒與多數并未能建立一個堅固的政權。必須有十一月十五日軍隊之非常大會以鞏固里加前敵之蘇維埃政權。在這次最後的大會，有二六一個代表宣布贊成蘇維埃政權與左翼大聯合，并有一三三三個地方與辦事處的代表贊成聯合內閣。那末表是很明顯的；挖壕塹的人都隨從多數派，聯合并組織於多數派之周圍；臨時政府的黨徒都是他的軍隊，但是無能力的將軍，因為他們只能倚靠享有特權者的勢力。

考察如此遠離中心之羅馬方面差不多也有同樣的事情，人們不會好好通知消息給那邊，到十一月初，卽十天左右，十月革命的布告才達到。大概兵士羣衆只在十

月初才開始脫離昏昧之狀態；臨時政府派有七月三日至五日失敗的敵手在此地。『在彼得格拉正式參加，以及有時參加七月事變之軍隊，在十月都開始達到羅馬前敵了。一般的精神狀態都改良了，兵士們脫離消沉狀態，開始了秘密的集會，但是缺乏指導者。在十月尾，關於彼得格拉之新的事變有許多混雜的傳說。十月十日左右接到了俄文報。政府的中心完全分離了。我們通知兵士，請他們重選聯隊委員會。官長所領導的社會革命黨右派即刻放出種種謠言，說前敵破壞，彼得格拉之屠殺以及列寧所表示的繼續戰爭之志願等』（見無產階級革命第十號四二八頁）。那末在羅馬前敵所經過的革命比北方前敵是不同的，但是社會的力量之團結也頗明顯的：工人與農民贊成革命的；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所領導之軍官與中小資產階級都是反對的。當時由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所組織之羅馬前敵執行委員會，證明完全不了解事變并孱弱不堪。當其多數派的左翼提議熱烈地贊成彼得格拉事變及其由社會革命黨

所形成的右翼主張派遣可靠的軍隊到彼得格拉之時，社會革命黨左翼所支持之中央採用一個動議，即聲稱『羅馬前敵執行委員不反對也不贊成彼得格拉之暴力攻擊，并不相信羅馬前敵的軍隊能夠給克隆斯基以援助』（見革命年鑑第一號一七五頁加爾哥夫[Kharkov]）。這種消極的決定對於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沒有別的影響，只是使他們喪失權力。

如此在一種特別形式之下，前敵的事變即是復演後防的事變。兵士羣衆跟隨多數派，自動地組織起來，以他們數百萬人的力量創造革命，小的與大的資產階級之享有特權者的分子——軍官，職員，醫官——都隨從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起來反對革命了。當革命的時候，這些分子，這些黨派都處於反對方面，以很小羣的抵抗者與數百萬勞動者對立，他們無確定的行動計劃，對事變無明白的覺悟，雖然富有技術的能力，但是缺乏精神的團結與健全的組織。

十月間在各省，大本營GG及前敵之情形

第十一章

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企圖破壞無產階級專政。

當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計算以大本營的援助準備抵抗之時，他們即竭力抓住蘇維埃舊全俄執行委員會，以他為反對蘇維埃政權之工具。他們不承認第二次大會，也不承認由這次大會所選舉之新全俄執行委員會。舊全俄執行委員會拒絕交出他的權力以及他應交給共產黨之款項。他繼續照常開會，并參預指導反對蘇維埃政權之種種企圖。在某一次最緊急的會議中。決定答復加麥業夫之催促——在兩天以內交出一切日常事務，聲稱一切與財產只能移交具有全權之合法的大會以及由這種大會所選舉之執行委員會。十月二十五日所開的第二次大會，已經我們宣布不存在了，

那次會選舉之執行委員會也沒有權利向我們要求任何的利益，這是我們所通知給你們的。舊全俄執行委員會之將來的活動問題，曾經在他的一最緊急的會議中討論過。出席的人都估計他的責任在召集蘇維埃第二次全俄大會，換句話說，就是要攻擊多數派，并企圖以同一的蘇維埃之援助再取得政權。因此，舊全俄執行委員會秘密地討論，決定與一切蘇維埃及一切軍隊委員會發生關係，并將凡屬承認他對於十月革命之抵抗綱領而不承認第二次大會者都集合於他之周圍。參預為憲法會議而鬥爭的問題也提出來了。舊全俄執行委員會派一個代表到社會革命黨所組織之擁護憲法會議大同盟，以為組織示威運動之基礎，總而言之，努力從全俄國集合一切與日趨鞏固的新政權反對的力量。

這些沒有軍隊的將軍之活動一天一天熱烈了，因為當時已經接近憲法會議集會之日期。十二月十四日舉行舊全俄執行委員會書記局，擁護憲法會議大同盟以及農

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之大集會。當時曾經討論參加一月初間由人民委員會所召集之蘇維埃第三次大會問題。有一個演說者認爲『多數派不能召集一個大的大會』，并且『假設能够集合二〇〇或一五〇個代表到會，那末示威運動是很重要的』。經過長的爭論之後，書記局決定召集蘇維埃與軍事組織之代表會議，同時表同情於憲法會議而決定不參加人民委員會所召集的大會。於是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之全俄執行委員會，決定設立一個與蘇維埃第三次大會平行的機關。這就是開始內戰。這次表會議之目的，實際就是集合各民主的組織以擁護憲法會議，并爲憲法會議的權力之原則與完全而鬥爭。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舊全俄執行委員會發表宣言給各工兵代表蘇維埃，各陸海軍委員會以及擁護蘇維埃與執行委員會之組織。這與其說是一個宣言，寧可說是一個控訴狀。這種文件即是勸告決不要參加第三次大會，但是教人出席舊全

俄執行委員會所發起之代表會議。兩個月以內，蘇維埃沒有發生了罪惡呵！『北方與軍隊都爲飢荒所迫，工業停頓，幾百工廠與製造場都停止工作了……。全體人民的志願受強暴之逼迫；宣布於最短期間召集憲法會議之十月強盜，當現在舉行選舉之時，想保持政權而停止憲法會議，并準備解散憲法會議……。』。

社會革命黨想在彼得格拉集合一些力量到憲法會議開會之日能夠行動，同時他們努力建立一個可以與第三次大對會立的機關。舊全俄執行委員會想利用那些力量做那天示威運動所必要的手段。假若那次示威運動有些羣衆，則將變成一個反多數派的騷動。在憲法會議開會之前兩天，社會革命黨組織了一個參謀部担任指導示威運動與行動。這是他們中央委員會一個委員——狄莫菲也夫（Timofiev）所說的：『我們假定那天不能取攻勢來反對多數派，但是我們要集合力量以擁護憲法會議，反對多數派之可能的開覺（并且事實上發生了）。我們也願意集合名單上所列的公民

(示威運動者正式的名單)，以及已經武裝的或可以武裝的，即屬於軍隊的公民。此所以我們要領導這種示威運動到憲法會議。我們以爲如此團結着憲法會議，覺得更安全，更強固，并且我們一點用不着辯駁，你們安置在憲法會議周圍之衛兵也將爲強力所排斥。憲法會議應當自己保護自己。嗣後我們有一個宣言。憲法會議的主席應當要求撤除衛隊。如果衛隊拒絕開走，或者我們要用武力使他離開。或者我們要以屬於我們的衛隊加倍護衛。人們不能預先見到這種事情，并你們用總指揮的名義，知道必須隨地決定方針。我沒有指揮俄國的軍隊；但是我知道必須保護進取并選擇一切具體行動之時機。我們無論如何要求一件事情：『憲法會議爲忠實的公民所圍繞并佈置爲保護他的討論之力量。再遲我們將來幹甚麼呢。或者我們相信有由防禦憲法會議變成攻擊斯莫爾尼之可能，但是我們寧願你們退出斯莫爾尼』。社會革命黨的行動失敗了，因爲羣衆不隨從他們。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這次戰鬥失敗，如

同十月革命以後一切戰鬥都失敗一般。保護祖國與革命委員會構成很大的困難，他們不能集合稍許確定的力量於他之周圍。他們利用大本營的力量之企圖已經流產。農的隊伍奪去了他們腳下之地盤。他們想到用蘇維埃的權力，在舊全俄執行委員會保護之下聯合他們的組織之積極力量以保護憲法會議之最後的企圖，毫無所成。農羣衆在蘇維埃政權中看出他們的權力，於是都拒絕隨從這些小資產階級的黨派。憲法會議自然滅亡了，如同無用的工具一般（憲法會議由人民委員會的命令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十九日）解散，並沒有過些微的抵抗）。

第十一章

無產階級專政之勝利。蘇維埃第三次大會。

十月革命已經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并開始了社會主義的革命，在蘇維埃第二次大會即已很鮮明地表示這次革命之兩重的性質。由這次大會所決定之一切方法，一切布告，都帶有這樣的表示；一方面說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即說明社會主義的革命。在蘇維埃政府最初幾個月所取之一切規律都有同樣的特徵。無產階級與農民在鬥爭中樹立他們的政權之建設，而破壞敵人階級之抵抗。

各種色彩，各種聯盟變化之臨時政府，一直到十月革命，完全維持封建的與貴族的舊俄羅斯。蘇維埃政權應當即刻把他笨重的鐵鎚破壞過去之陳跡。人民委員會

重要的布告之一，就是廢除人民的階級與官爵。大小資產階級的政府，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的政府，沒有力量用立法的行動，批准消滅過去之陳跡。這些陳跡，從二月革命以來，已經變成歷史的陳跡。因此蘇維埃政權即申明資產階級革命之收穫之一：『直到現在存在俄國之一切階級——公民之一切階級的分別——一切階級之特權與限制，一切階級組織與教育，一律廢除，如一切人民的官爵一樣』。

十月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民主的性質，也表現在民族權利之宣言中。這個宣言宣稱：『第一，俄國人民之平等與主權；第二，一切人民之完全的自決權，一直到完全分離并組織獨立的國家；第三，廢除一切民族的，民族信仰的特權以及同一範圍之限制；第四，俄國土地內之弱小民族與人之發展自由。廢除民族的壓迫與人民不平等之布告，純然是資產階級性的，并且無論在十月革命前之任何臨時政府，即頒布有命令，顯然沒有第二條之第二部分——即承認各民族之完全分離權。在這一點，

十月革命之社會主義的性質也說明了，同時給全部命令以新的格調。民族的與宗教的壓迫，民族的不平等，階級的特權，在經濟中（舊的階級之土地私有制）與在道德及司法制度之上部構造中一樣，都是封建貴族的國家之殘餘。因為十月革命處處都形成完全的瓦解。沙皇制度已在二月滅亡，十月間無產階級與農民即拔除了他的根子。但是十月革命之兩重的性質，不獨是表明破壞封建制度之殘餘并肯定為資產階級的革命：社會主義的革命亦復擴大，即肯定了他們的無產階級的精神。

可以在財產問題中看出這種情形。工人監督生產的命令說過：「第六條：工人監督生產機關有監督生產，設立企業規則并研究生產價格之權。——第七條：工人監督生產機關有監督各企業經濟交通之權。如有矯偽情事時，財產主應在法庭前担負責任的。廢除商業的祕密。財產主應將他的帳簿與清算冊，本年與過去年度一樣，都要交給工人監督機關。——第八條：凡屬工人監督機關的決定，一切企業主都

有執行之義務，並且只有工人監督的高級審判之決定才能取消的』。這個命令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頒布的，他只說到監督，并常常提及財產主；但是——這是有可注意的——爲強迫執行工人監督之決定，不久即變監督機關爲管理機關，因此廢除生產方法之私有權。工人監督生產的命令，與民族權利宣言一樣，是走進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之一步；表現在這些規定中之社會主義的傾向，即證明資產階級的革命已經過去了，在建立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命令中即可以看出革命之兩重性質并顯然包含社會主義的成分。

十月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民主的與社會主義的性質密切聯合起來，鞏固前一性質的革命即指出了後一性質的革命；肅清俄國經濟中之大的土地所有權與封建制度的遺跡，即使農村中之小資產階級反對與銀行資本的利益密切聯合之大資產階級與地主，而銀行資本將大俄羅斯的貴族與工業家都牢牢操在他的掌握中。爲土地之鬥爭

，遇着財政資本的抵抗，并與無產階級的鬥爭及經濟組織混合起來了。銀行只因沒收而受了打擊。向社會主義進行的十月革命之兩重性質，縱令沒有把社會主義放在議事日程中，却已引導無產階級與農民採取一種曖昧的態度，一方面破壞資產階級的制度，另一方面又維持他。這即表現在工人監督之命令中，在銀行國有之命令中亦復如是。在那命令中說：『國民經濟之良好的組織與銀行投機事業之堅決的抑制，如同完全解放受銀行家剝削之工人，農民以及一切勞動的平民，要組織俄羅斯共和國之統一的銀行而且真正為最貧苦階級的人民之利益服務。因此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決定：第一，銀行事業變為國家獨占；第二，由股份設立之一切私人銀行與一切財政事務所都與國家銀行合併起來』。這個命令是十二月十四日通過的。

為保護小資產階級之獲得物，蘇維埃開始與財政資本決鬥；為擴大并堅固無產階級之所得，他給資產階級以逐漸嚴重的打擊。為和平鬥爭中，小資產階級為社會

主義之鬥爭，較爲土地之鬥爭更加努力。十月革命之國際性質，即表現這種鬥爭之擴大；但是也可以看出革命之兩種性質密切結合，并且雖有內部的矛盾却已由這一種革命變成那一種革命，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已經變成一種社會主義的革命。在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時，看見農民小資產階級舉起世界革命的旗幟而贊成和平命令，在十一月日見發展之和平鬥爭更可以證明。取消債務，即使農民從應繳給世界資本主義之賦稅中解放出來；這也是向世界資本主義之宣戰；給他的基礎一個直接的打擊，給世界資產階級一個號召，即世界革命之第一次戰爭。十月革命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性質在兩種形式之下漸漸明白表現出來了。一九一七年夏季，列寧說：『滅亡或儘快前進，這是歷史提出的問題』。十月革命即使無產階級了解這個問題，并教他們做一個明白的答復。十月革命的兩種潮流之混合，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實現屬於社會主義的目標，由反對封建殘餘的鬥爭轉到反對資產階級之無產階級的

鬥爭，這都是使必須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平，土地——之農民小資產階級進攻俄國與世界的資產階級，因此以鞏固革命之社會主義的希望，而使那些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關係，只知反對資本之鬥爭而不知其他的人服從革命。

很久以前，無產階級在為本身解放與廢除封建貴族的國家所繼續之鬥爭中取得領導權。他在十月革命後所保持之領導權，使他固結并聯合在困苦戰鬥中所領之無數的羣衆。與農民如此密切的聯盟，使他徹底破壞資產階級的統治機關而開始建設他自己的統治機關，集合於蘇維埃周圍之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之權力，由憲法會議之選舉結果即指示出來了。十月間，許多地方都照以前的名單舉行投票。這次投票即指出俄國各種力量之關係。列寧曾經分析憲法會議的選舉結果。選舉的結果如次票（數以千為單位）：

所獲得的票數

區域	社會革命黨		共產黨(多數黨)		立憲民主範(Cadets)		總計
	絕對數	%	絕對數	%	絕對數	%	
北方……	1,140	38	1,777,2	40	393,	13	2,975,1
工業中心……	1,987,9	38	2,305,6	44	550,2	10	5,242,5
窩爾加……	4,733,9	70	1,115,6	16	267	4	6,741,5
西方……	1,242,1	43	1,282,2	44	48,1	2	2,961
烏拉爾……	1,546,7	43—62	443,2	12	181,3	5	3,583,5
西伯利亞……	2,094,8	75	273,9	10	87,5	3	2,186,7
烏克蘭……	1,878,1	25—77	754	10	277,5	4	7,581,3
陸軍與海軍 =	1,885,4	43	1,671,3	38	51,9	1	4,363,6

這個表是最好不過的教訓。多數派得到全票數百分之三五。社會革命黨與少數

派得百分之六二（社會革命黨左派與右派有共同的名單）。在無產階級的區域以及工業資本所支配的區域，贊成蘇維埃政權之黨徒占多數。北部，中部與西部之工業區域，這都是十月內完成革命并擁護革命的地方，而這些地方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為革命構成一個堅強而永久的堡壘。在這些區域內有堅固的無產階級的核心，而農民小資產階級都跟着他們跑。

無產階級對於農民之影響，由多數派在各地地方與軍隊中所得的票數的比較即表現得更明白。在工業區域及其隣近區域之軍隊中所得的票數特別多。多數派在北方前敵獲得全票數百分之六一，在西方前敵則有百分之六七。當新政府成立之最初幾個月內，因為羣衆都集合於蘇維埃之周圍，使代表勞動平民之偉大羣衆的希望與志願之革命更加鞏固而強大。無產階級在這些羣衆中之領導權，即保證社會主義的傾向之鞏固而實現。這種力量之比較即足以表明社會革命黨與少數派所企圖的行動之

失敗，以及憲法會議之無光榮的告終。多數勞動者都贊成蘇維埃。資產階級的民主之要求既經滿足，於是爲社會主義的轉變之鬥爭一天一天明顯了；爲保護十月之獲得物，對內反對資產階級與對外一樣，急於需要社會主義的方法。與全國資產階級之衝突變成與世界資本主義之衝突，並且爲和平與世界資本主義之鬥爭與反對全國資產階級之鬥爭混合起來了。革命之國際的性質已經表現更明白了。

蘇維埃第三次大會已經指示十月革命之社會主義的傾向之勝利，這次大會。理論上是接連第二次大會的，他將蘇維埃最初十星期所完成的工作做了一個總結，決定并批准這種工作之新的傾向，總而言之，確定了十月之綱領。列寧——人民委員會對大會之報告者——證明工人與農民之親密的聯盟。集合了無數的羣衆并給蘇維埃以非常的勢力；多數派常以工農聯盟建立并實現勞動者政權必要的舉動。他說，「我們以爲惟有工人與最貧苦的農民，以及我們黨綱中所說的小資產階級之聯合，

才能在俄國團結人民之多數并保證政權之安全，這是我們從沒有懷疑過的。從十月二十五日起，我們能够在幾星期內超過一切的困難并穩定政權在這種永續的聯盟之上』（見列寧全集第十五卷七四頁）。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在乎滿足資產階級的民主的要求與無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要求而對抗共同的敵人——資產階級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給他以嚴重的打擊，同時把社會主義放在議事日程中了。列寧說明蘇維埃政權所取的方法之時，即說：『最緊急的方法之一，不僅想驅逐地主於俄國土地之外，而且想根本剷除資產階級的統治以及加於數千百萬勞動者身上之資本束縛之可能；就是要銀行國有化』（見前書同卷八三頁）。

這種方法，即同時滿足十月革命之兩種傾向，并準備走向社會主義之一步。在生產範圍中採取了其他的方法。『我們由工人監督轉到建立國民經濟最高會議……惟有這種方法——列寧在他的報告中特別指明——使我們有開始建設新的社會主義

的經濟之可能，同時不久即施行銀行與鐵道國有化。』(列寧)

總之很明顯的：十月革命的旗幟，集合了千百萬的無產階級與貧農，而貧農爲其資產階級的要求之鬥爭，成爲無產階級之可靠的聯盟者與武裝伙伴，於是他們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破壞資產階級的制度之基礎，并在他們面前提出消滅資產階級并過渡到勞動組織之新的形式問題了。因爲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根據一個唯一的綱領之聯合，于是第三次大會得以明目張膽地說明他的志願，他的綱領。勞動者與被剝削的人民之權利宣言，是大會的宣言，即是他的工作之總賬與最後的鬥爭之綱領。十月革命之世界的，國際的責任，同樣由地方的必要在大會決定了。俄國已經進到爲社會主義鬥爭之道路。并且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要延長過渡的期間：在各中心與各省，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權力歸蘇維埃是以廢除全世界人對人之剝削爲目的。總之，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以世界革命鬥爭爲目的。在這種道路

中走向社會主義之一步，即是工人階級已經消滅俄國資本主義之統治。這就是打擊全世界資本主義。下面即是可紀念的宣言之原文：

工人，兵士，農民與哥札克代表蘇維埃全俄大會決定。

勞動的與剝削的平民之權利宣言：

I

一，俄羅斯宣布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會議）共和國。凡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都屬於蘇維埃。

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係根據自由的民族之自由聯合之基礎，建立為全國蘇維埃共和聯邦。

II

因為決定以廢除人對人之剝削，完全消滅社會階級之區分，無情地消滅剝

削者與建立全國社會之社會主義的組織與社會主義之勝利爲根本任務，所以蘇維埃第三次大會決定：

一，爲實現土地社會化，故廢除土地之私有權，并且根據平等的使用收益權，無任何贖回，將宣布爲人民公共所有之土地全部都交給勞動者。

森林，鑛山與全國重要的水道，以及一切活的與死的所借貸之家畜，一切產業與一切農業的企業，都宣布爲全國的恆產。

二，關於工人監督與國民經濟最高會議之蘇維埃的法律，認定保證勞動者對剝削者之權力，視爲將製造廠，工廠，鑛山，鐵道以及其他生產與運輸機關完全變爲工農蘇維埃共和國之產業之第一步。

蘇維埃第三次大會認定蘇維埃的法律要取消沙皇政府，地主與資產階級之債務爲給銀行資本與國際財政之第一個打擊；第三次大會相信蘇維埃的政權將

在這種道路中堅決進行，一直到對於資本束縛之工人暴動之完全的勝利。

三，將一切銀行歸工農國家所有，是為從資本束縛中解放勞動羣衆之條件之一。

四，為消滅社會與經濟組織之寄生分子，建立一般的強迫勞動。

五，宣告武裝勞動者，組織工人與農民之社會主義的紅軍并完全解除統治階級的武裝，以保證勞動羣衆的權力之完全并排斥恢復剝削者的權力之可能。

III

一，為使人類脫離財政資本及因目前戰爭——一切戰爭之最有罪的——流血滿地之帝國主義之橫暴，蘇維埃第三次大會無條件地贊成蘇維埃權力之政策，即取消一切秘密條約，組織正在交戰的軍隊之工人與農民間之最廣泛的互相觀愛，儘力用革命的方法，得到人民間之民主的和平——無吞併，無賠償，建

立在民族自決的權利之上之和平。

二，爲達到同一的目的，蘇維埃第三次大會主張與資產階級的文化之野蠻政策完全脫離關係，因爲他的政策是在亞洲，一般殖民與完全一切弱小國家的數萬萬人民之勞動者之奴隸地位上建立少數民族的剝削者之幸福。

第三次大會贊成人民委員會的政策，即宣布芬蘭(La Finlande)之完全獨立，開始撤退波斯(La Perse)之俄國軍隊，并宣布亞美尼亞(L'Arménie)之民族自決。

III

蘇維埃第三次大會以如當現在的時候，人民反對他們的剝削者之堅決的鬥爭正在發展，在各權力機關，剝削者不應該有任何的位置。政權應該完全專屬於勞動羣衆及其具有全權的代表——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還爲希望實現俄國各民族的勞動階級之真正自由而願意的，完全而堅固的聯合，第三次大會只是決定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之重要的原則，同時教俄羅斯的工農以及每國的工農注意在他們的蘇維埃大會中自己決定一切而行使全權，假設他們願意（并在如何條付中）參加聯邦以及其他蘇維埃聯邦的組織」。

* * * * *

列寧總結第三次大會的工作的時候，已經很好地指出其重要之點。這次大會指出，因爲無產階級與農民之親密的聯盟，以開始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光明而雄偉的組織爲任務。列寧說：『這次大會有世界的意義。他在世界歷史中開了一個新紀元，并且在世界革命條件中開始表現漸漸進步了。這次大會批准由十月革命所創造的新的團結之組織，如各國勞動者準備全世界中將來社會主義的建設之標準』。

十月革命的工作完成了，并且用不寬恕不反對并不曖昧的解釋而明白確定了。

列寧在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所說的，現在在勞動權利宣言中都確定了：社會革命已經開始，俄國無產階級與農民已經向前進取而從他們的道路中排除俄國的資產階級與其聯盟者以及一切自覺的與不自覺的助手。

(完)